

鸡西文史资料



D643.4

24

70-46557:1

46560





图 片 说 明

鸡东县平阳镇八角楼剧院，建于1924年。建成后每年都有十几个外地剧来这里演出“封神榜”、“杨家将”、“大西厢”连台本戏曲。每逢演戏，楼上包和前排雅座都被土绅、军、警、宪、特们占用，平民百姓只能在劣等座位看戏。日救国军团长苏怀田等人曾在八角楼里以看戏做掩护，进行抗日活动。解放初由延安来的老干部土改工作队队长李尔重同志、副队长张震同志多次在八角楼开群众大会，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成友仁 摄

鸡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鸡西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11月 · 鸡西

前 言

《鸡西文史资料》第四辑出版的时候，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边陲煤城鸡西也和全国全省一样，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可喜成就。现在的鸡西，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解放前的鸡西却远远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鸡西是个什么样子呢？本辑特征集编发了《光复前夕的鸡西》《鸡西行政区域衍变初考》《修复矿山追忆》《解放前夕鸡西教育概况》《光复前夕的鸡西文化》《鸡西铁路的破坏与修复》《伪满“鸡宁国境警察队”简介》等多篇稿件，用大量鲜明生动、翔实可靠的事实，从工业、农业、教育、政法、文化等不同侧面，再现了当时在日寇统治下贫困落后的鸡西面貌。我们希望通过新旧鸡西的对比激励斗志，放眼未来，坚定改革开放的必胜信心，努力克服面临着的困难和问题，为实现四化，振兴鸡西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

目 录

光复前的鸡西·····	罗树忠(1)
鸡西行政区域衍变初考·····	关仁广(11)
恢复矿山往事的追忆·····	马龙图(23)
鸡西铁路的破坏与修复·····	张玉隆(33)
光复前夕鸡西的文化简介·····	李云龙(37)
解放前夕鸡西教育概况·····	王嘉才(42)
伪满“鸡宁国境警察所”简介·····	何崇阁(44)
解放战争中的红星化工厂·····	井翔久(48)
鸡西最早的行政建制——密山府·····	曹旭东(52)
李立三同志来滴道·····	井翔久 纪海峰(56)
陈慕华同志在穆棱煤矿·····	穆棱矿党办(61)
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的回忆·····	薛文轩(64)
难以忘怀的毕勇·····	李丰堂(65)
鸡西戏剧界名流小传·····	市文化局史志办(76)
勃利煤田是如何发展的·····	吴可保(84)
风风雨雨四十年·····	吴述今(92)
来自地狱里的怒吼·····	周笑秋(103)
往事杂忆·····	袁绍山口述 吴玉科整理(109)
一次特殊任务·····	魏殿明口述 于迎春整理(117)
智取保安队·····	陶宜民口述 吴王科整理(120)
中央胡子进街·····	王守德(123)
鸡西日本开拓团的覆灭·····	李宝山(127)

光复前的鸡西

罗树忠

鸡西是一个以煤炭为主体的多资源型工业城市。煤炭储量列东北第一，石墨储量居亚洲之首，硅线石储量属国内少有，石灰石储量排全省前列。鸡西城市因煤而立，鸡西百业因煤而兴，日本帝国主义也因煤而对鸡西这片富饶的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3年1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密山县，把侵略魔爪伸向鸡西（鸡宁）。1935年6月，日本侵略者在滴道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会密山炭矿。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建成恒山、滴道、城子河、麻山四座煤矿后脱离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成立密山炭矿株式会社，年产煤炭250万吨左右，居伪满30多个炭矿株式会社的前列。所生产的焦煤和洗精煤除供鞍山、本溪等钢铁公司外，还运到日本、朝鲜，用于军械生产。

1945年8月12日，苏联第一方面军第35军进驻鸡宁县，同时进驻鸡宁各煤矿。日伪军政企业人员均溃败逃走或躲藏，鸡宁县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鸡宁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从殖民主义者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现将解放前夕鸡宁县的自然状况、县城规模、经济、文化、教育概貌分述如下：

一、自然状况

鸡宁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北的老爷岭，穆棱河沿岸的完达山和张广才岭东南的汇集处。穆棱河横贯全县。东与密山县接壤，南与穆棱县相连，西与林口县毗邻，北与勃利县交界，座落在山区向平原过度的丘陵地带，平均高度在海拔300——500米之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与东北高差150公尺。年平均气温3.5℃，日照时间为2,739小时，降水量546.7毫米，无霜期139天。鸡宁地质是下伏地层，麻山群变质岩中含有石墨、磷灰石、石灰石、硅线石等矿藏。中生代、晚侏罗纪地层中含有丰富的煤田，第三纪地层中含有褐煤层。鸡宁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发展煤炭工业，建立煤矿城市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鸡宁县的主要原因。

二、县城规模

1945年的鸡宁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煤炭工业初步发展的丙级县，隶属于合江省管辖。全县总面积2449.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万余垧，人口145,321人，其中农业人口占70%。煤炭、电力、矿山机械、石墨工业初具规模。还有铁木、被服、皮革、洋铁、钟表、刻字和打棉、酱菜、粮米、编织、土陶、酿酒、豆腐坊等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除日本人经营的半官半商的外，均是个体经营的小摊小店。文化、教育、卫生也有一定的发展。

鸡宁街是伪鸡宁县公署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且成了周围县镇的交通枢纽。

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各个民族人口逐渐增多，1945年年8月15日前，鸡宁县除汉族外，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锡伯族等13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15,254名朝鲜人，2,034名日本人和43名白俄罗斯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3.5%。

三、工 业

煤炭工业：解放前夕，鸡宁县的煤炭工业是全市的主要工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升级，迫切需要钢铁，制铁用的焦炭原料——煤炭也随之激增。到日本投降前夕，鸡宁县有滴道、恒山、城子河、麻山四座煤矿，职工3万多人，总人口4万多人，其中日本人3千多人。煤炭年产量为13万吨，1944年（伪康德十一年）年产量猛增到320万吨，1945年1—8月份，生产煤炭228.67万吨。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侵略者侵占鸡宁14年，共掠夺优质煤炭1,636万吨。

电力工业：随着日本侵略者在鸡宁县掠夺煤炭规模的不断扩大，用于采煤、军事设施的用电量不断增加，原有的滴道发电所、鸡宁发电所1、2号汽轮发电机组所发电量已满足不了需要。1944年又运来了3号锅炉和3号发电机组。到1945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败逃鸡宁县前夕，鸡宁地区的滴道发电所的总容量为2,350千瓦，鸡宁发电所的总容量为3万千瓦，电业职工300余人。

1945年8月初，日本侵略者濒临灭亡，开始撤退。8月7日，伪鸡宁县日本宪兵队长命令鸡宁发电所所长池司带人将配电盘的仪表全部打碎，将窗帘浇上汽油点燃，将主控室烧毁；把主变压器油放出，用火点燃烧毁主变压器；将汽轮机的高压加热器大盖及调速器全部砸坏扔到水里；又将汽轮机润滑油全部放出；还从大仓库运来汽油倒在汽轮机车间地面点燃，焚毁了各种技术资料及图纸。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败北，3号锅炉和3号发电机组安装缓慢，1946年二三月份，苏联红军撤走前，将鸡宁发电所未安装完的3号汽轮发电机组及一些主要设备拆走，运回苏联。

机械工业：1933年冬开始筹建，1936年春建成投产的密山炭矿株式会社鸡宁机械制造所，日本人松尾任所长，细谷长男任工程师。厂房总面积为180多平方米，职工70多人，其中管理人员20多人（大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具体负责指挥与监督工人干活。工作母机最初只有十几台机床，连同其它机械也不过30台左右，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逃离鸡宁前，各类设备共计74台。当时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炭车，同时还经营机械修配和部分机械制造项目。

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败逃鸡宁前，以鸡宁机械制造所所长松尾为首的日本人放火烧掉了所有的厂房和建筑物，破坏了所有的工作母机。全厂只剩下熏黑的断壁瓦砾和烧毁的残缺不全的床身。

石墨工业：1936年满洲株式会社派人到柳毛一带找矿，1937年日本人江川山男首次派人探矿，继续进行槽探剥离、平峒探矿等项工作。同年，日本人丸山虎一从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取得租矿权，正式开发柳毛石墨矿。当时矿上有几十个日本人，雇佣一些中国人和朝鲜人当把头，工人最多时达一千多人。1940年，采矿方式由零星散采变为较集中的开采，共产出矿石2000吨，平均品位在22.34%。同年6月，开始建设第一浮选厂，从日本国内购运机器，到1942年9月开始试生产。同时开始设计第二选矿厂，设计能力日处理矿石200—300吨，招募工人2000多人，1945年4月竣工，但未来得及投产。第一浮选厂于1943年9月正式投产，日处理矿石100吨，质量60—70%，年产石墨1500吨左右，产品主要销往东北地区的大满县业、满洲坩埚厂和运往朝鲜加工后再运到日本。1945年8月15日，柳毛石墨矿的日本人炸塌了坑口，放火烧毁了浮选厂和选矿厂、火药库和新旧房屋11栋。整个矿山变成一片废墟。

手工业：1945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败逃前，鸡宁县手工业

178户，从业人员537人，主要是手工作坊、夫妻厂和师徒小厂，分布在鸡宁街、黄泥河子、滴道街、平阳镇等地。其中，鸡宁街56户，207人；平阳镇54户，171人；黄泥河子30户，66人；滴道街21户，44人。按行业分类，铁木业48户，222人；生产小农具，饮事用具等；被服业21户，63人，从事来料加工和修补；皮革业18户，74人，生产车马辕具和少量皮鞋；钟表刻字业16户，36人；洋铁业7户，生产水壶、水舀子、修补等。此外，还有打棉、酱菜、粮米、编织、豆腐坊等行业，其中比较大的有志诚粮栈、志诚油坊、义源诚粮栈。酿酒工业有同兴泉烧锅、同兴涌烧锅、隆兴泉烧锅、德顺涌烧锅。以及吴尊三办的肥皂厂、韩明德开设的铁工厂，这些规模都不大，生产能力不详。此外还有三个砖厂烧砖、瓦、白灰等。

四、农林牧业

农业：1945年前的鸡宁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农业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70%。全县总面积2449.6平方公里，除山林、道路、市街用地外，可耕地仅有6万来垧，其中日本帝国主义派驻的开拓团和满拓团、密山炭矿、日军用地及其矿山（如柳毛河铅矿、东华金矿）等占去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供10万农民耕种。耕地农民大多是靠租种日、满开拓团的土地耕种的雇农、佃农。由于日伪政府实行粮谷强行出荷政策，并以低价强制收购农民粮食，加之不断地抓劳工，要国兵，贫苦农民疾苦难当，奔走流离，土地荒芜，农业生产日趋下降，耕作面积逐渐缩小。

在农业生产管理上，伪鸡宁县公署设立了开拓科，科内设畜产股、农林股、土地股、开拓股，管理农业生产诸事。

林业：据有关资料考察，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以前，鸡宁地区森林茂密，多为实生阔叶混交林。松树和针叶树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柞、桦、杨等阔叶林大部分在

北部山区和近山地带。日本侵略者侵占鸡宁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在鸡宁开发煤矿以后，在鲸吞我地下宝藏的同时，对我森林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式采伐，使鸡宁林区倍遭破坏。1945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败逃鸡宁县前夕，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对鸡宁县各种资源进行毁灭性的掠夺，乱砍乱伐，放火烧林，使森林资源遭受一场空前的洗劫，成材林所剩无几。

畜牧业：日本侵略者入侵鸡宁后，对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居民强行并屯，大搞“集屯部落”，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大量的牲畜被屠杀，大片的草原被烧毁、破坏。各种畜疫到处流行，牲畜死亡十分惨重；加之饲养粗放和自然繁殖，牲畜的品质明显下降，畜牧业发展缓慢。据调查资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光复之前，鸡宁县仅有牛3,339头、马4,792匹、驴81头、骡661头、羊302只、猪992头、鸡8,394只。

五、财 贸

商业：日本侵略者侵占鸡宁县后，日本商业资本大量涌入鸡宁街，其中商业首户滕井大丸、富士洋行，均属半商半官性质的商业组织，除经营一般商业项目外，还兼营日伪政府规定的配给物资。这些商号资金雄厚，货源充足，直接从日本东京、大坂等地进货，经营商品达3千余种，是鸡宁市场日货的主要来源。当时的鸡宁街已形成了以鸡冠路、详光路、永昌路为中心的商业区。经政府登记注册的工商业达3百多户，其中中国资本的大商号有永和成、信昌泰、隆大号、义源成、德发源、东太德、路东烟草公司等。五金建材商号有广信久、裕长顺。此外，德丰厚鲜货庄、东茂荣食店、永兴当铺等也是比较有名的商号。其中永和成是鸡宁街商业首户，拥有资本超万元（伪币），雇佣店员七、八十人，店主王承三任伪鸡宁县商会副会长，成为鸡宁县商界的头面人物。此外，在平阳镇、黄泥河子等街镇也是比较繁华的商业

区，商业比较发达。

服务业：1945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败逃鸡宁县前，鸡宁县有大小饭店100多家、旅店十几家、照相馆20多家，浴池6家，理发店也有一些。其中，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2户、浴池业3户。此外，在饮食业和理发业中，还有许多走街串巷的叫卖小贩和理发匠。1945年“8·15”光复前，鸡宁街有大小饭店20多家，其中最大的饭店是陈子彦开设的会泉酒社，最小的是庞家开设的夫妻包子铺。当时的饮食服务业多是独资开办的家庭店或夫妻店，有的是几家合资开设的店铺。另外，也有少数店铺依靠日伪反动势力当后台，官商勾结，欺压同行、剥削人民。

六、城锁建设和交通邮电

城镇建设：日伪统治时期，城镇建设陷于自流，市容混乱，环境肮脏。据有关资料记载，鸡宁县全县住宅面积不足14.8万平方米，多为草木结构的简易破旧房屋。在鸡宁街内，二层、三层的楼房仅有五、六栋，大部为日伪机关所用。人民住房简陋不堪，城镇建设混乱，街不成方，土道泥泞。街内集居区为鸡冠路（红军路）两侧（原东沙场，现桥东）一带，其他地区寥寥无几。

铁路：日本侵略者为掠夺鸡宁煤炭资源，于1934年建筑从林口至虎林的铁路，并建鸡西火车站，1935年6月30日车站竣工，7月1日正式通车。随着日本侵略者侵略野心的不断扩大，相继增修了西鸡西编组站、恒山支线，接通了城（下城子）——鸡（鸡西）线，连接了西麻山、滴道、城子河、恒山等部分矿山专用线。

公路：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鸡西公路总里程为627.1公里，其中通车里程不足20公里。县级公路4条，即穆密线、林密线、依鸡线和城东线。桥梁217座，全长1,858.7米，其中木桥193座，全长1,672.7米。日本侵略

者投降后，鸡宁的公路及桥梁均遭到严重破坏。

邮电：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前，鸡宁县仅在平阳镇、鸡宁街、滴道街、恒山街设邮电所。当时的电报、电话均由日本株式会社所控制，虽有电话机数百门，并有通往牡丹江、密山等地的电话线路，但大部份为日伪军、警、宪、特和官僚所专用。

邮政是伪满洲国开办经营的，但邮政通讯工具是人扛马驮。鸡宁街到兴农、哈达一带送邮件，全靠人背、两条腿走，即所谓跑“早班”。送一次邮件往返得四五天。

七、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日伪统治时期，鸡宁县境内较大的村镇，均设国民优级小学（完小）、一般村屯设国民小学（初小）。国民小学规模小，一般不设校长，指定由某人负责。国民优级小学设校长1人，由满族人担任，名义上主持学校工作；主事1人，由日本人担任，负责主管学校事务，校长也受其管辖。学制6年，分国民小学4年、国民优级小学2年。课程设置，国民小学设修身（即思想政治课）、日语、满语、算术、自然、图画、体育、音乐、手工等10科，国民优级小学增设历史（满洲历史）、地理（满洲地理）、军训和实业等课程。日本侵略者在校内极力向师生灌输“大东亚共荣”、“日满一德一心”、“东亚圣战”等所谓建国精神，强制学生背诵伪《国民训》和《回銮诏书》，天天向日本皇宫和伪帝宫遥拜。并大量增加日语课课时，每周达十节以上，体育课大搞军事训练。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鸡宁县共有优级小学22所、国民小学30所；日本学校（称在满洲国民学校）13所，朝鲜族小学8所。全县在校生5,500余人。

中学教育更加落后，1945年2月，伪鸡宁县政府在滴道矿建立了鸡西国民高等学校，学生百余人，教师36人，仅授课半年，

便因鸡宁县光复而停课。

文化：日本侵占鸡宁县后，在鸡宁街内设有一处影院“满洲映馆”，主要上演日本无声片，宣传“大东亚共荣”、“天皇万岁”等反动思想每月演10余场。在滴道街、恒山街设有戏厢，各地设有茶社，供外地说书、艺人演出。

卫生：据有关资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鸡宁县仅有日伪公立医院一家，医护人员30余名，是为日本侵略者和伪官僚、地主阶级效劳的。私人开业比较有名气的医院有牡丹医院、裕民医院、大仁医院、若输医院、同德医院、健生医院、永新医院等7所，只处理门诊患者。

当时的中医多是药房的坐堂先生。据了解，1945年恒山街有西医1家，中药房6处；滴道街有西医1家，中药房7处，城子河有中药房2处，麻山有西医1家，中药房4处。此外，恒山、滴道、麻山、城子河等煤矿，都设有医院或医务所，医护人员多则二十几人，少则十余人。

八、金融财政

金融：日本侵略者侵占鸡宁县后，为了垄断金融、控制货币，日伪统治者先后设立了国有的满洲中央银行和私有的东满银行。由于金融体系和货币信用被日伪统治者所控制，借贷利息高到惊人的程度，月息为分利、5分利、10分利，大加一，最高的达到借一还二，一月之间本利平，劳动人民被高利贷所逼，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财政：日本侵略者为掠夺鸡宁的煤炭资源，1942年9月12日从密山县西部划出部分地块建立鸡宁县，建县初期由密山县划转及国库补助10万元（伪国币，下同），1944年至1945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败逃鸡宁县时，财政收入2,750万元。从收入结构分，以1943年为例，鸦片收入250万元，占总收入的56.9%，捐税收

入123.9万元，占总收入的28.2%，外债收入30万元，占总收入的6.8%，国库补助30万元，占总收入的6.8%，官户收入6万元，占总收入的1.3%。

捐税收入：1943年捐税收入123.9万元（伪国币，下同），1944年猛增到249.1万元，1945年设置“勤劳奉仕特别会计”科目，仅8个月就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钱80万元。

九 伪 警 宪 特

日本侵略者侵占鸡宁县期间，伪警、宪、特遍及城乡。据有关资料记载，伪鸡宁县公署在鸡宁街内设有鸡宁国境警察队，下设特务股、队务股、警务股、警防股、警察警备队和特别搜查班。平阳镇、滴道街、鸡宁街设了3个警察中队。在鸡宁街的警察中队下又设梁家街、新市街、东沙场、鸡冠山4个分队。同时，在恒山街、哈达岗村、城子河村建立小队，其中城子河小队又下设一个八铺炕分队。据1944年统计，鸡宁县的敌伪警察、特务机关共32处，分布在各个地区的警察、特务人员1,298名。比较出名的汉奸特务头子有陈子彦、张百彦、王国彦和李彦年，即所谓鸡宁县有名的“四大彦”。

结 束 语

应《鸡西文史资料》主编之约，写一篇《光复前的鸡西》。其间查阅一些资料，引证了一些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一并表示感谢。

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简要情况也不难看出，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鸡宁县的各个方面无不打上殖民地的烙印，也可以从中品尝出当一个亡国奴的滋味，从而激发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煤城鸡西，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搞活的大潮中去，为建设一个美丽、繁荣的鸡西贡献自己的力量。

鸡西行政区域衍变初考

关 仁 广

行政区域是指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地方。这些地方都设有相应的国家机关，对本地方实行领导和管理的职能并对上级国家机关负责。

每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形成，总是同这一地方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民族与人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现象上考察鸡西行政区域的由来的形成，研究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无疑将有助于了解本地的历史，用以指导现实的行政区域管理、经济管理的。

本文考究的是按现行鸡西市的行政区域进行的，包括鸡东县在内的一县六个区。它的座标是东 经 $130^{\circ}18'$ 至 $131^{\circ}41'$ ；北 纬 $44^{\circ}51'$ 至 $45^{\circ}41'$ ，座落在黑龙江省东部的穆棱河中游 的一块地方，总面积为5402平方公里。

一、古代鸡西区域的归属

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北方最古老的民族，肃慎的先民①，即在穆棱河中上游包括鸡西在内的穆棱县与密山县的一带地方生活。他们建立了许多原始部落，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社会生活。1982年在鸡冠山北面的刀背山西坡发

现的原始社会古墓葬遗址以及在穆棱河、滴道河、牯牛河两岸均发现过距今约4000—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新开流渔猎文化类型的出土文物。这些都可证明这里氏族公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聚与延续，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国家可考的资料。（《黑龙江古代简史》及鸡西市文物站的文物档案。）

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原的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传到这里。1957年在鸡冠山石缝中发现了一把石质仿青铜短剑（存于省博物馆）。1980年又在恒山区张鲜二队居民点出土了更为精制的石质仿青铜短剑（存于市文物站）。证明了这一带肃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生产力水平和中原的交往。

春秋战国时期，（在公元前300年），燕昭王12年时，扩大疆土，得东胡地千余里，设辽东郡。据考证此一时期，在广大东北地区均属辽东郡，鸡西亦在郡管（《史记：匈奴列传》、《文物工作》1986年第4期）。

始皇22年（公元前225年），秦增兵攻燕，公元前222年灭燕。秦在北方建立了右北平、辽东、辽西三郡。鸡西仍属辽东郡治下（《史记：刺客列传》、《秦史稿》）。

公元前二世纪至三世纪，西汉时期，本地出现了原始农业，同时有了定居的居民。1977年在穆棱河右岸，兰岭乡永台村发现了原始社会遗址。如依山建居的“地窖子”，出土有石器、陶器等19件。其中的石刀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汉代的农业生产“刀耕火种”的使用工具。还有石磨、臼、杵等粟谷加工工具。恒山区张鲜村七队也发现过有穿孔的石刀。以上出土器物类似宁安东康遗址出土的器物。（《考古》1982年第1期）

东汉时期肃慎改称挹娄，已出现了私有制，但当未有自己的政权而臣属于西部的夫余国。夫余国则隶属于汉朝的玄菟郡（今沈阳东部）。魏晋之时，挹娄居地扩展，摆脱夫余国，于公元236年直接同魏晋建立隶属关系。他们分布在长白山北，黑龙江、

松花江中下游，种五谷，好养猪，用箭以青石为镞（《黑龙江政权沿革》）。

北朝时，挹娄称勿吉，北朝末期形成了七个部落②。鸡西属于“拂涅部”，其地域包括兴凯湖、穆稜河、松阿察河（即松花江）流域（《黑龙江古代简史》）。

隋唐时，勿吉称靺鞨。红星乡仁和村打井时出土了一组陶器，其技术、器型、陶质均与东宁、绥芬河流域出土的靺鞨遗物相符。同样可资证明这里是靺鞨人的居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靺鞨氏族公社制度逐步瓦解。（《黑龙江政权沿革》第5页）。

在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时，唐初靺鞨人人口增多，地域辽阔。居住在“东至大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除最北部的黑水靺鞨独立外，其余诸部或附于高丽，或臣属于突厥。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在吉林敦化建立了封建性政权。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居住在今牡丹江上游地区的粟末靺鞨酋长 大祚荣征服各部，入唐朝贡被唐册封为“震国王”、“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专称“渤海国”，设忽汗州都督府（今宁安县）东京城，下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鸡西则属于渤海国上京东平府所辖区域。

此时本地居民部落扩大，建有城堡。柳毛乡小四平山、鸡东县永安乡大锅盔山两个古城遗址，经省社会科学院考证，定为渤海时期的古城遗址。公元916年唐末，契丹（辽）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改为东丹国。公元1066年复改国号为辽。辽时鸡西一带在东丹国辖下属东京道，居民为女真人（原靺鞨人）。汉族人此时也逐渐流入黑龙江流域。辽在这里实行封建统治，但有一部分州县仍为奴隶制。辽对渤海遗民大规模西迁（《黑龙江政权沿革》）。

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在辽的统治时期，北部的女真族逐步发展起来。公元1115年完颜部的阿骨打即皇帝位，建立了奴

隶制度的“大金国”。公元1125年金灭辽，翌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经历三十年建立起封建制度的国家。金代行政区域设立五京、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东北地区为上京路，鸡西则属上京路辖下的速频路（一一译为恤品路）。治所在今苏联境内之双城子。（《黑龙江政权沿革》、《中国历史图集》第六册）。

金代，穆棱河流域经济较为繁荣。穆棱河被标为“暮棱水”写于《金史·世纪》中。城子河小城山古城址（周长826米）的建筑以及泥质灰陶布纹砖瓦的出现，更有零星出土的铁箭镞、铁刀、北宋铜币等，说明其既有金代器物，又有北宋的遗物，鸡东县平阳镇东南之金城村也名符其实地发现此类小城遗址。农业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据是铁制农具、工具的发现。在柳毛乡中心村菜地出土过20余种铁制农具。1982年又发现一处已遭破坏的金代居住遗址，出土了铜发簪、车辖和三枚“皇宋重宝”。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特点和水平。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城海铁矿发现了古铁矿井和人工粉碎的铁矿石。铁矿石堆上长出的大榆树，树龄约为500多年，以此可推断本地的冶铁业与金代同期。

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期间，公元1206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灭金国，灭南宋之后统一了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元在东北设置了辽阳行省，设开元路，治所在今之东宁县三岔口附近。鸡西则分属于开元路辖下的胡里改万户府（治所在今依兰）和开元万户府（治所在今东宁）两府管地中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

公元1308年（元代）女真人发现本地（穆棱）有煤可燃。
（《鸡西矿务局志稿》）

公元1368年明灭元建立明朝。

公元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奴尔干都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域。

奴尔干都司下设384个卫,鸡西属于麦兰河卫（即穆稜河流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

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当地居民开始小量挖掘煤炭，用于冬季取暖（《鸡西矿务局志稿》）

公元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北部女真族逐步强大，建州女真贵族首领奴尔哈赤（清太祖）递次征服各个部落，于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明万历44年），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辽阳、沈阳。皇太极（奴尔哈赤之第八子）继位时，统一了东北。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改女真族为满族。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改金为“清”称皇帝。鸡西此时属于清窝集③部下穆稜河流域的木伦卫和尼马察路（在乌苏里江上游，兴凯湖以南，绥芬河以北）。

公元1644年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逐渐统一了中国。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朝设牛录章京驻防宁古塔（今宁安），后升驻昂帮章京，辖区广大，包括鸡西一带地方。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又升为宁古塔将军。

乾隆廿二年（公元1757年），治所移住吉林乌拉，今吉林市，改称吉林将军。管辖东北地区东部，鸡西归吉林将军宁古塔副都统管辖。（《黑龙江政权沿革》《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清兵入关之后，北方满族人口大量南迁入关，清王朝为保护其祖宗的发祥地，在东北设柳条边为界④，禁止流民私入东北狩猎、采参、放牧，以致造成东北大片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荒芜起来，人烟稀少。

二、近代鸡西行政区域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清室衰微，帝国主义从各方入侵，东北在沙俄多次入侵后，迫使清朝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1858年至

1860年，我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于是促使清王朝认识到开发边疆的重要，从公元1880年开始废除封禁，移民实边。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在穆棱河上游设穆棱招垦局开始招民垦荒，开发边疆。垦荒地界局限于穆棱河中上游，今之穆棱、柳毛河一带，现在鸡西以南的大片土地。招垦局属依兰道绥芬厅管辖。

光绪廿五年（公元1899年）在兴凯湖附近之蜂蜜山又设招垦局，垦植今虎林、蜜山（含今鸡冠山一带⑤）等穆棱河中下游两岸的土地。隔年因沙俄再次侵入，招垦未成。光绪廿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在绥芬厅穆棱河街（今穆棱镇）又设招垦局，设分局于凤绵镇（今密山知一）及呢吗口（今虎林）继续放荒。

公元1903年，俄国建成中东铁路，南起大连经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皆可通往俄国以至南北满洲。交通的方便促使东北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华北、辽宁、吉林好多饥民，到北大荒“闯关东”，或垦植荒地，或受雇于地主，人烟逐渐增多，随垦荒自然形成许多村落，农业生产有了一些发展，仍是封建的自然经济状态。

公元1908年，清光绪卅四年，清政府在蜂蜜山设置蜜山府。今之张家街、鸡冠山村、小黄泥河子、平阳镇、城子河以东，以北之地，均属蜜山府管辖。

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设穆棱县，鸡西今之梨树镇、柳毛河、凤山村、吉祥、土顶子、兰岭等地，归该县治。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

公元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改蜜山为蜜山县，属吉林省管辖。鸡西之滴道、城子河、恒山以东之地仍属蜜山。其余地方分属于穆棱县、勃利县（公元1918年设县）管辖。

辽阳人张德利、李光真会同三名老乡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前来投奔蜜山知府胡魁章，领得在鸡冠山以西垦荒的执照。

张定居的地方就叫张家窝棚（今园林路附近）；其老乡梁雨臣定居的地方叫梁家窝棚（今梁家街）。

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以来，滴道、黄泥河子的煤炭，已由民国政府发给执照，准予开采。滴道矿由华侨资本家钟青奚^音开采，后者为蜜西煤矿由袁大章开采。土法采掘，规模不大。

三、现代鸡西行政区域的衍变

公元1921年（民国十年）在张家窝棚成立蜜山县四甲四所，辖鸡冠山以西至梁家窝棚，南至黄泥河，北迄穆棱河。隶属于蜜山第二预备团第六区（即已成为大集镇之平阳镇）第五保。第一任甲长是张德利。

公元1924年吉林省实业厅与俄人谢杰斯签订中俄合办开采梨树沟、小碱场煤矿，叫“穆棱煤炭公司”，年产煤35万吨。

公元1925年3月3日，穆棱铁路（下城子至梨树沟，与中东铁路接通车，本区域有了第一条铁路。穆棱煤矿所生产煤的炭，可以直接装火车，运往各地，以至运往苏联。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成立“满洲国”。同年改蜜山县为密山县，鸡西之滴道以东归密山县管辖。其余地方分属于穆棱、勃利林口县（1939年设县）。

公元1935年林密线铁路通车，在鸡冠山西四甲所附近设“鸡西驿”，即鸡西火车站。鸡西从此得名，鸡西街因之逐渐形成并兴盛起来。12月成立滨江省，密山划归滨江省管辖。公元1937年7月成立牡丹省公署，密山又划归牡丹江省，鸡西仍旧属四县分管。

穆棱煤矿早于1927年即开始发电，是为我市最早的发电所。

公元1938年4月滴道发电所开始发电（6880千瓦能力）。

此时，滴道煤田已经大量开采，叫密山炭矿。

公元1941年鸡西发电所发电。能力为23360千瓦。

公元1941年3月城鸡铁路之梨树镇到鸡西段通车。

林密、鸡城铁路通车与发电能力的增强，使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东满的煤炭、粮食、林木资源成为可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鸡西的煤炭工业、粮食生产向前发展了，产量逐年掠夺式地增加。

公元1939年4月日本开拓团（即日本移民）迁入哈达河和兰岭，农村有了日本居民。同年6月设东安省，治所在东安（今密山）辖密山、虎林、饶河、宝清、林口、勃利等县，鸡西行政区域未变，仍属密山等县分治。

公元1941年8月东安公署改鸡西街为“鸡宁街”。9月伪满皇帝敕令221号在东安省设置“鸡宁县”。将密山的鸡宁街、滴道村、黄泥村、哈达河村、哈达岗村、新平村、平阳镇及曲河之区域设置鸡宁县（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198号）。县长为久保田丰，管辖两万多户居民。从此鸡西有了正规县的建制和县的行政区域。县公署设在鸡宁街。该时今之梨树镇、平岗、吉祥、土顶子尚属穆稜县管，西麻山归林口。

公元1945年5月伪满洲国将牡丹江省与东安省合并，设置东满总省，鸡宁归东满总省管辖。

四、解放后的鸡西行政区域

公元（以下省略公元）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鸡宁县光复。8月12日苏联红军进入鸡宁县，设红军司令部，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鸡西处于“乱麻地”的无政府状态，各种“军”、“会”相继出现。土匪及“中央胡子”与伪警、宪、特相勾结，他们成立“维持会”与临时县政府，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军来接收。这年十月共产党员陶宜民等成立了东进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夺取鸡宁的武装与政权的斗争。

1946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支队的十七团与警卫团进驻鸡西，并东进剿匪，社会秩序日趋安定。

5月12日鸡宁县临时民主政府改组，共产党员张凤阳为县长。建立了鸡宁县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机关，归合江省领导。

1947年4月合江省定设永安县，将今之东海、永安、下亮子、半截河划归永安县。同年7月又撤销永安县，上述四乡仍归鸡宁。

1949年8月19日经松江省政府报请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改鸡宁为鸡西县，归松江省管辖。

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鸡西县划归黑龙江省管辖。

1956年12月1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鸡西县建立鸡西市的决定》。

1957年1月22日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鸡西县设置鸡西市的决定》。建市的原因是①有利于鸡西煤矿工业大发展的需要（年产量为668万吨），解决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不一致（一个鸡西煤矿被鸡、穆、林三县分割，政权机关搞农业不能很好为煤矿服务。）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不协调的问题。②当时鸡西已经具备建立煤炭工业城市的条件，但是政权组织体制与煤炭生产不相适应；③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多（将近30万人）要求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统筹兼顾，合理布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不建市不能统一规划。建市的行政区域为：原鸡西县的鸡西镇、恒山镇、滴道镇和红星、丰乐、城子河、梁家街、兰岭、柳毛、胜利、团山子、大通沟等9个乡，穆棱县的梨树镇，林口县的麻山乡和奎山乡的太和村。原属鸡西县的银峰、得胜、鸡林、新城、前进、永安、永和、金城、下亮子、综合、友好、东海、兴隆、哈达等14个乡和平阳镇划给密山县。兴农、安平河、哈达碛子等三个乡划给勃利县。

市人民委员会设于原鸡西镇。市内设置鸡冠、恒山、滴道、梨树、麻山等五个区，划市郊为十个乡，分别归各区领导。

1957年3月7日，鸡西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市长、副市长和十八名委员组成的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市政权机关正式对外办公。1957年3月7日这一天，经1986年5月6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为建市纪念日。

1960年随着煤矿的向东向北方向开采，鸡西矿务局所属的统配煤矿已深入到密山县境内，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银峰、哈达两个公社11个大队从密山县治中划给鸡西市。银峰改称平阳公社。哈达公社的另13个大队归密山县管，设立东海公社。

1964年6月5日国务院决定设置鸡东县。8月6日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鸡西市所辖的哈达、平阳公社、张家生产大队和密山所辖的鸡林、下亮子、平阳镇、永安、综合、东海、兴隆、向阳、永和、明德公社划归鸡东县行政区。

同年11月6日省人民委员会决定设鸡东镇为鸡东县人民委员会的驻地。

同年12月3日省决定将勃利县所辖的兴农公社划归鸡东县。

1965年1月1日鸡东县正式成立，辖一个镇十四个乡。

同年省又将密山县兴垦区即8510农场居民区划归鸡东县管。

1970年鸡西市设置城子河区。

1983年9月根据市管县的体制改革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将鸡东县划给鸡西市管辖。

1983年10月18日国务院国函字（83）181号批复，省发黑政函（1983）38号文，通知鸡西，将鸡东县划归鸡西市。牡丹江专署与鸡西市在鸡东县所在地鸡东镇举行正式移交大会。自此以后鸡东县隶属于鸡西市管辖。

1986年省政府批准鸡东县之永安、向阳、平阳镇三个乡改为三个镇。到1988年11月鸡东县的辖区为四个镇，十一个乡。

到1988年11月鸡西市辖区仍为一县六区。即鸡东县，鸡冠、恒山、滴道、城子河、麻山、梨树等六个区。

五、鸡西行政区域发展的展望

纵观鸡西行政区域的衍变，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发展历史，之所以成为现行行政区域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发展变化之规律。如归属的变动、分与合、扩大与缩小的基本规律。用现代的观点看，行政区域的确定与改变，总的方向应当是为了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生产与现代化经济建设，获得长足发展的经济环境而不是束缚它；有利于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国防建设和方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现在的鸡西市已经是牡丹江以东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它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充足的能源，雄厚的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基础。以煤炭为主以机械、建材、冶金、化工、电力、食品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随着煤炭、石墨、硅线石等资源的开发与深度加工，东部三江平原开发后的经济往来与中苏边境贸易的开发与兴隆，使它必然发展为具有更加雄厚经济实力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展示它的无限美好的前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行政区域的衍变也将相适应的为其服务而进行不断地调整。变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将来如何变化，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文材料由市政府办、市志办、档案局、市文物站提供，在此表示感谢。文中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敬希知情者给予批评指正。）

注：

①肃慎，古族名，亦作息肃、稷慎。商周时居长白山北，东滨大海。秦汉以后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和它有渊源关系

（《辞海》）。

②这七个部落是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等（《辞海》）

③窝集：满语，意为森林覆盖的山。（《鸡西市志稿》）

④柳条边：为清顺治至康熙时修成的一条柳条篱笆，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南起凤城至开原又折向西南至山海关，是为“老边”。自开原至吉林市北，名为“新边”

⑤蜜山：因蜂蜜山而得名。1931年以前的蜜山府、蜜山县，皆从“蜜”。1931年伪满洲国改为密山县，以后皆从“密”。（《辞海》1026页）

恢复矿山往事的追忆

(1945——1947)

马 龙 图

今日鸡西矿区，即伪满时代的密山炭矿股份公司。在光复前是由滴道煤矿、城子河煤矿、恒山煤矿三个生产矿和一个建设中的麻山煤矿所组成，年产量约200万吨。

我于1942年7月由隆昌矿山来到密山炭矿，在矿务科任职员，后在技术员养成所当教员。

1945年8月9日，苏联飞机侦察和轰炸了西鸡西编组车站，继而对日宣战，苏军进入东北，不到几天的时间，日军便土崩瓦解，密山炭矿亦随之破坏而停产。8月15日东北光复而解放。

祖国光复了，人人拍手称快，莫不欢欣鼓舞。但矿山遭到破坏，工人生活无着。光复后到1947年，我亲自经历了几件事，回忆如下：

一

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时，我家住在滴道煤矿小半道。当时那里只有孤零零的四栋房子。由于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秩序相当紊乱，烧杀抢掠日有所闻，大家都感到害怕。在徐成山的号召下（徐是搞采煤的，当时是居民组长），利用附近菜窖折下来的木板和钉子，把四栋房子圈成一个小院落，中间设个岗楼，大家轮流打更，这个主意获得一致赞成，在8月下旬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此每到晚饭后，大家到岗楼内闲读每日见闻。

一天晚饭后，有于学孟（测量）、李凤岐（土建）、庄文普（劳务）、范晦（采煤）、崔连仁（机电）、李耀北（财务）和我等人，大家一起闲谈。徐成山最后也来了，在闲谈中徐成山建议：现在祖国光复了，我们大家都没有事干，这里什么人材都有，应该了解一下日本人退却时对煤矿破坏的情况。如果早日了解清楚，恢复起来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早日恢复矿山生活才能有着落。他还说：现在祖国光复了，是给我们自己干事了，不然将来国家来接收，问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是要责怪我们的。他说完，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得到一致赞同。但并未有具体组织谁负什么责任。

在这之后，九月初有一天，徐成山约我和于学孟到滴道矿河北三坑一斜看了一下。办公室被烧，绞车房被炸毁，火药库、矿本部房子都被炸，资料全部烧毁。看来看去，我只在防空洞旁拣了两张生产月报表。又过几天，趁有去恒山矿木炭灰汽车，我们三人借便去恒山矿山南一趟。山南的工人们说：在日本人退却要破坏时，炸药交给了工人，结果没有破坏，现在有两个坑口可以生产。知道这些情况后即返回。路过西鸡西，车突然坏了，在冻饿中修车，回到家已是晚十点钟了。

由于冬天的到来，个人生活无着，粮菜如何解决都成了问题，因此调查矿山的热情逐渐消失，都自讨方便为暂时生活奔波去了。殊不知此事竟成了在恒山煤矿1947年“七·七”大会挨斗的史料。

二

1945年12月15日，苏军委托中长铁路代管滴道煤矿，派了俄人矿长及随员20余人，到矿主持运煤和生产恢复工作。同时召集我们参加并分配了工作，徐成山管暖泉地区坑口恢复工作；我负责河北三坑、六坑恢复工作；范晦主管河北四坑；李凤岐主管土

建恢复工作；崔连仁主管机电工作；其他人也分配适当工作。

可是这时土匪蜂起，劫道行抢每日发生，器材无法供应，资金来源拮据，因而时作时停，进度不大。

1946年5月8日深夜，我们正在熟睡之际，忽听一群土匪由北面越板墙而过进入院内，砰砰啪啪叩门。当我打开门后即蜂拥而进，立时把我绑上，吓得孩子号淘大哭。土匪把我拉到院内，我问道：“我们有冤没有？有冤来痛快的。”土匪说：“没有冤，我们和你们要钱。”我说没有钱，有钱早就不在这儿住了，东西物品可以随便拿。土匪说：“我知道你是穷的，但是我们让你这几家给我们凑两万块钱，候几天我们来取”。另一个土匪说：“把他放了吧，但是这事一定要办。”于是解了绑，只顾抢东西去了。

事后检查，把衣物抢劫一空。于是第二天我即陆续搬到滴道街里去了。从此矿山恢复工作全部停工。

据说这次抢劫是在预谋行抢矿上俄人枪支去到本部未果，回头抢了我们。

自从搬入滴道街里去住，接触了滴道街里一些事情。刚来不久的滴道工作团是四月间进入滴道的，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农村土改工作，街头上写满了标语口号，都是宣传党的主张的。我看后感到和我思想是合拍的，于是主动地到工作团去汇报矿山情况并问今后矿山怎办。我还向他们借阅报纸和书刊，从而知道了国民党内幕腐败无能，四大家族买办资产阶级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使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获益匪浅。

虽然与工作团同志有些往来，有些了解，但毕竟是初步的。据工作团的布署，在居民组中开展明确好坏人活动，好人公布在红榜，有问题的人列为黑榜。当我看到我被列入黑榜时，我即找工作团团长孙平同志说：“根据什么把我列入黑榜？请告诉我。”当时他说：“不要着急，过两天告诉你”。果然，过了两天把

我从黑榜内消除而改入红榜了。再次见到团长孙平同志谈话时，议论煤矿如何办，孙平同志介绍说：“你可以到鸡宁县地方工作委员会去问，看看如何。”

三

与滴道工作团团长孙平同志谈话后，我即动员了徐成山、于学孟、李凤岐等三人，于6月间的一天找到鸡宁县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张凤扬同志，他主动接见了我们。我们说明了来意，要求很快接收矿山。首先我们汇报了矿山基本情况，其次讲了日本人退却时对矿山的破坏情况，现在工人失业，生活无着。我说：“我们用十四年亡国奴的痛苦，换来的矿山，不能再让它继续破坏下去，于国家无益，于人民无益，只有早日恢复生产，才能解决各类矛盾、各类问题。”

我们汇报之后，主任张凤扬同志表示说：“我们欢迎你们来汇报矿山各种情况。但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建立各级政权，我们没有搞恢复矿山的任务。不过我可将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你们听消息吧。”就这样，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无可奈何地回家了。

1946年10月初我自己来到鸡宁县。途中碰到了冷冰天同志，知道了原工商局已被新的东北工矿处接收，东北工矿处的副处长是孙然同志。聆听之下，欣喜若狂，打听东北工矿处的所在地点，即直奔而去。进屋后看到警卫员，我说：“请回报一下，有滴道矿工程师马龙图求见，谈谈有关滴道矿的一些事宜。”待让我走进处长办公室，刚入门站稳，我便毛遂自荐地说：“我是滴道矿工程师名叫马龙图，听说东北工矿处来鸡西恢复矿山，我是来请示对滴道矿何时接收？”我虽然说了这些，副处长孙然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由头看到足下，再由足下看到头上，往复多次，看了足有一两分钟。当时虽处于这种情况，可是我内心的要求是坚

决的，所以我毫不介意地说了下去，从伪满的矿山的情况，日本人退却破坏的情况，一直谈到矿山全部停止生产，现在工人生计无着，愿工矿处早日接收，以利国利民。汇报之后，孙然同志态度缓和了，面带着笑容，开始问这问那，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矿山是国家的矿山，人民的矿山，我们要爱护，将来是要接收的，回去告诉工人同志们，不要再破坏了。”我说：“这不行。我说他们不听。”原来，一次在水洗厂看到有人拆下电动机，我说：“这是国家财产，不要再拆。”那人说：“谁不让拆，打断他的腿。”我对孙处长说：“这样我怎能制止得了。处长你去，我可以给你召集一次会，你在会上讲讲，可能效果大，他们能听你的。”

后来孙处长果真去矿开了一个会，收到了些效果。从此以后，工矿处的老同志，如杨剑平、卜凡、张珍、郝希英、李华楫等人常去滴道矿视察，都事先通知我，我做了他们调查的响导。

当我第二次同于学孟同志到工矿处去时，还奖励了我们二人每人2000元钱。带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情接受了，增进了互相来往和情谊。

四

东北局领导李立三同志于1946年12月16日，由东北工矿处处长刘向三同志陪同，在视查恒山矿之后来到滴道矿。当时东北工矿处副处长孙然通知我，让我向李立三同志汇报矿山情况，同时并谈谈恢复生产还有何困难。中午时间，经孙然的介绍，我向李立三同志汇报。我说：现在白俄矿长带的20几人只知运煤，恢复生产只是样子，不能给工人按时开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一、国家赶紧接收矿山，不然还在继续破坏；二、恢复急需一些器材要解决。例如井下作业，连灯都没有，缺少火碱，就是简单的电石灯也都没有。汇报之后，李立三同志即宣布到当时矿本部办公室开全体

中、俄人员会议。

会议马上召开了。先听苏俄矿长汇报，有一姓张的给翻译。后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发言，向苏俄矿长提意见，提出只运煤而不注意恢复，只有中国人管各坑恢复，你们都不下井，而且矿上无器材供应组织工作，这样怎能加快矿山恢复呢？白俄矿长只能做支吾的回答。

最后由李立三同志用俄语与那个矿长对话。有时说到生气时还拍桌子。白俄矿长开始很硬气，后来李立三批驳了他，他才老老实实地坐下不吱声了。

李立三同志说：“这个矿是中国人民的财产，不属于中长铁路。我们要接收矿山，你们要退出这个矿。”苏俄矿长说：“我是奉中长铁路之命来矿的，没有命令不能走。”李立三同志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也是中长铁路的中方代表，中长铁路在我管辖之内。我来时已同红军司令部开了会，我问过，他们不承认派你们来。我命令你们退出去，我给你们三个月办移交，并把拖欠工资补齐。”白俄矿长只好答应下来。

这个会开到晚8、9点钟才散。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会开得好，等待接收矿山吧！

五

1946年12月下旬，鸡西东北工矿处副处长孙然同志以电话通知我，他说：“我们首先接收恒山矿，希望你首先参加我们接收工作。”我说：“我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他说：“你无妨先到恒山去看看。”于是第三天我坐了装煤的敞车，到了恒山矿。本部当时在鸡西区，我会见了当时矿长扬剑平、工务科长李华楫、总务科长吴良俊、原副矿长陶树柏同志等人，他们一致欢迎我到恒山去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我深受感动，也坚定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心。晚间下榻于吴良俊同志家里。

1946年元旦过后，我即雇了一辆马车，装上家具，带着家小，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当天寒风凛冽，扑面刺骨，车行至柳毛沟塘时，把孩子冻得号淘大哭，大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关马不前”之势，心里感到一阵难过。但是自己能参加革命，眼前的困难也就被冲破了。约在下午三时许到了恒山矿。当时一家四口人住在警卫连院内不足十平方米的一个小屋里。次日即行上班，被杨剑平矿长宣布我为采煤股长，具体管理山南和长生采煤区的恢复和生产工作。下半年又被任命为计划股长兼测绘股长。从此开展了全矿恢复和生产工作

日本人退却时对矿山的设施破坏严重，没有遗留下任何技术资料，生产恢复陷于重重困难。面对往种情况，我组织人力克服困难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1、没有矿图指挥恢复生产是困难的。我们组织人力进行了草图的绘制，虽不准确，但亦可有所依据。同时我献出了在市场购买的挂罗盘一台。

2、我对全矿各坑口志进行了全面调查，根据不同情况做了不同的恢复方案，尽量防止了盲目性。

3、根据生产的需要，提出了采煤与掘进必须保平衡。为着产量增长的需要，明确掘进工作必须重于采煤。

4、建立生产管理日报制。每天要知道产量多少，哪儿在采煤，哪儿在掘进，以及恢复的进度、出勤的人数、消耗定额、劳动生产率等，从而加强了管理工作。

5、初步建立计划制度。于十二月间编制第二年度生产计划中的各项计划，为计划管理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培养了计划人员和工作的计划性。

在阶级教育、物质献纳运动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年计划任务，也是我在恒山矿一年的工作。

六

1947年7月7日在恒山煤矿俱乐部内召开一次全矿区规模最大的初次劳模大会。会议目的，是布置下半年完成60万吨煤生产任务。会议前三天讨论如何完成生产任务。会议第四天转变了为民主改革反霸斗争。这次会我参加了。当要进入第四天反霸斗争之前，吴良俊同志找我谈话，动员我在会上坦白，他说：“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哪能没有些错误（指的是敲诈勒索、欺压群众等），如有要坦白，可以从轻处理。你应先向我说说，想想办法。”我果断地回答：“我没欺侮过人的事，也没有敲诈勒索过任何人。在反覆几次动员之后，我坚持地说：“根本没有”。他最后无可奈何地说：“我已尽到我的同志间的责任了，今后有否，只有你自己负责了。”第四天大会之前的早晨，李华楫同志又来劝告我，和吴良俊同志同样方式谈起来了，动员我坦白所做的坏事。我坚决地回答：“没有。”最后李华楫说：“那末如果出了事只有你自己负责了。”

第四天大会我照样参加了。但是一进会场气氛紧张，人群熙熙攘攘，有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时又高呼口号：

“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欠债还钱！打倒恶霸、把头、汉奸、走狗！”大会首先宣布由马龙图自动坦白。让我离座站在会场中央，继而围上一群工人，手持电缆、钢丝绳、棍子，情绪非常紧张。有人说：“马龙图你要老实坦白，不然饶不了你的。”我说：“我没有作对不起人的事，我坦白什么？”又有人要求说：“你说说对共产党的认识。”我答：“过去听过敌伪宣传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八路是抓铁路的……”未等说完，又有人提出：“谁让你说这个，让你说你做的坏事！”我说：“我未作过坏事。”有个人说：“一、你给国民党送图。二、你一架棚子剥削5元钱。三、你打死过人。这些事你怎么不坦白交代呢？快说！”

我答：“给国民党送图是徐成山干的。我光复后从未离开过鸡西，怎能送图呢！二、一架棚子剥削五元钱，我伪满当职员和教员，没在井下管过事，怎去剥削呢？三、打死过人，实无其事。你说打死过谁？姓什么，叫什么名，在哪儿？为什么打死”？听我这样一说，那人立即怒发冲冠，挥舞棍棒说：“你这小子，不打你，你是不会承认的。”于是扬起鞭子要打。在这紧要关头，主持会场的麻山工会主席刘柱同志扬起手来说：“同志们，大家静一静！方才揭露马龙图的坏事恐怕不止这些，可能还有大的问题，对他我们决不会轻易放过，一时闹不清，我建议先把他押起来，弄清时向大家交代再处理。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同意。”话语一落，再把我推到侧面去了。

会议继续往下开。斗了麻山矿霍启文等人，最后抢毙了城子河矿六坑工程队长（把头）外号南霸天的金子明。

大会之后把我押送到矿警卫连笆篱子里。两个月里，白天下坑生产，晚上交代。

在板房反省期间，杨剑平矿长、吴良俊科长曾访问过我。我当他们发过怨言说：“你们欢迎我到恒山工作，是为着整我。你们是毛主席的信徒，应该实事求是，不希望你们袒护。”他们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你应当相信。”

两个月之后，9矿中旬，警卫连宣布我解放。

次日我见到了李华楫同志。我向他提出问题：“一为什么我次要整我，二我已经出来了，你们不能再用我，我要走了。”他答：“一个人打算进步，参加革命是光荣的。但是革命的征途上，没有平坦的大道。我们都是受过严格审查和考验的，这次挨斗，对你是有好处的。没有这次批斗，谁知道你马龙图是个好人呢！这是革命的考验，革命的需要，因为你过去当过高等亡国奴，与工人距离好远，他们对你没有隔阂吗？现的哪也不能去，

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好务，才是你的光荣职责。”

这一席话，使我深知是革命的考验，遂将怒气变成勇气了。

通过革家的考验，我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要想为人民服好务，必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在恒山矿一年的工作中做到了：

（1）深入矿井调查，编否恢复计划；（2）提出增产必须掘进先行，否则即要失调；（3）建立生产日报及月报计划制度，使之每日知道产量、人数、效率、耗定额；（4）克服困难，无图纸暂作草图，指挥生产。就这样，在革命征途上度过了一九四七年。

鸡西铁路的破坏与修复

张 玉 隆

鸡西铁路的大破坏

鸡西境内的铁路是林——密线的东段，始建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这条铁路是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资源，用骗招和抓浮浪的方法集聚中国工人的血汗修成的。鸡西火车站退休老装卸工人张连祯说：我十九岁从河北省南皮县被骗招劳工来到奉海路修铁路，一九三五年冬经林口到滴道来鸡西修铁路。那时，每天吃包米面、大咸菜，搭配橡子面。凌晨三点就得起来挖土方、修路基、抬枕木、装钢轨，晚上九点才收工。就这样拚死拚活地干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通车。

铁路开通以后，乌黑的煤炭、金黄的大豆、雪白的大米、优质的木材……被一列又一列火车运往日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濒于灭亡的日寇开始撤离国境线，同时，组织破坏队，对工厂、矿山、铁路进行了疯狂的破坏。他们烧毁了当时称为鸡宁火车站前的日本高级军官旅馆大楼，烧毁了恒山火车站房舍。火车从恒山——鸡西间十公里大桥通过后，又将大桥点着。待恒山矿山日本人破坏各坑口所有设备后，乘火车去鸡西过大桥时，已熊熊烈火燃起，结果一台机车两辆货车掉到桥下，当即车毁人亡。日本人组织的破坏队和一百多名关东军乘四辆棚车从林口去奎山破坏火车站和山洞，并准备洗劫奎山屯。结果，当列车行至奎山山洞时，即被苏联飞机炸得粉身碎骨。日本人在密山县城各处早已安上地雷通上电线，企图炸毁密山县城。

那天，密山以东的日本人逃难列车中的最后一列正在密山待发，密山西的日本人误认为列车已从密山发出，即拉开地雷电线开关，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火车站内炸出一个三米多深大坑，将车炸翻，乘车日本人也自吃苦果，葬身异国。因为县城内各处地雷线早被当地居民发现切断，密山的县城才幸免于难。

向牡丹江方面逃跑的日本人在苏联红军布下天罗地网中，也成为瓮中之鳖。据西鸡西铁路养路工区养路工人现离休干部刘明星说：日本人的逃难列车在西鸡西火车站还没发出，即被苏联飞机轰炸了，炸得南四道、六道有十几米大坑，炸坏两组道岔，两根钢轨炸飞起来又扎到地里。从密山驶来日本人逃难列车开到鸡西火车站东道口，机车被苏联飞机炸坏，站内炸了三个大坑。据东海铁路养路工区养路工人白贵福（现鸡西铁路工务段长，已离休）说：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凌晨2点左右，我亲眼见到了苏联飞机炸平阳站（现鸡东火车站）的情形。日本人养路工长牛赛还说，这是航空演习。六时许，从密山方面开来一列日本人逃难的列车。伪东海警察署日本人署长往火车站来抓车要跑，我们中国养路工人对牛赛说，苦桥桑（工务段长）、角牙苦桑（养路监工员）都要走。牛赛也慌忙抓上车门跑了。车开到站外113公里处，遭到苏联飞机轰炸，把崔家大院房后的铁路旁边炸成个直径有十米左右、七、八米深的大坑，车翻后堵塞了线路，后边驶进东海火车站东头进站信号机外的一列车也被苏联飞机炸毁，日本人大部死亡，剩下的拉着队伍，头戴树枝作掩护往北向西跑去，跑到大于家沟岭后集体自杀。据说东海火车站两列、密山火车站一列，是日本逃难列车中的最后三列，实际上一列也没跑掉。滴道穆棱河铁路大桥也遭到了轰炸。

鸡西铁路的修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铁路回到了

人民的手中。为恢复通车,东海铁路养路工人积极抢修铁路线路,三十多人不怕劳累,用肩扛一辆一辆的把五十多辆车从区间一公里多远的地方,推到东海火车站内侧线。为使一百七十一公里的林密铁路全线通车,鸡西铁路地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组织了抢修队。这个队人员的组成是,车务部门:马玉忠、郭桐海、伊广仁、鞠永富等二十多人;机务部门、邹天庆、吕桐、李占成;司机:张肇奎、李树琦、肖永生、李庆茂、李忠建、朱耀清等十几人;工务部门:李树田、刘明星、奚才、杨树发、龙占海、杨春山、周永林等三十多人;电务部门:贾忠、赵长彩、赵青山、周洪顺等五人;车辆部门:张太祥、王庆、尹玉贵等十几个人,总计七十多人。列车组成有三辆客车作宿营车,两辆棚车装灶具、米面、油盐酱醋,五辆货车装路料、通讯器材、携带电话机等,两辆平车装钢轨、枕木,两台7 5 6型(日本话叫米加叩)机车前拉后推。马玉忠同志指挥行车,邹天庆、吕桐作苏联红军翻译,伊广仁管伙食。抢修队从西鸡西火车站出发去林口,到奎山火车站时,听当地居民说,山洞里铁道上有地雷,日本人还没来得及破坏。列车停在奎山站内,工务部门的养路监工员(苏联话叫麻线)李树田说:你们随抢修列车在站内等着,我一个人去,遇有问题,豁出我一个人死。李树田一个人来到洞口处,见有半方土把钢轨埋着,李树田小心翼翼地把土撮出洞外,却没发现地雷。看来日本强盗还没来得及放地雷就逃跑了。抢修队列车通行过山洞,拐过山头即是磨牛火车站(当时是小车站)。站内有四辆被炸毁的棚车翻在铁道上,一组道岔和部分钢轨也炸坏了。李树田和抢修队的同志们用护轮轨帮道岔的办法修好了道岔,整修钢轨,把破车推下线路,干了两天一夜修复了线路。奎山屯居民高兴得给抢修队送来两口大肥猪。抢修队到林口火车站时看见也有被破坏的车辆,站内有的线路堵塞,马玉忠上信号楼指挥调车。苏联红军想去佳木斯,打开了仓库,让去二十人扛来白面,给

抢修队伙食用，每人还给了一件军用大衣。实际上，抢修队并没去佳木斯，而是向鸡西开来。车到麻山，需要给机车上水，但给水设备已经被日本人破坏了，经李树田提议，到当地居民家借水桶，去水沟担水给机车水箱上满了水。抢修队返回西鸡西火车站时，苏联红军的摩托车追上，责问为什么不去佳木斯。抢修队说抢修队的任务是抢修林密线，密山方面还没抢修。苏联红军同意后，抢修队在鸡西休息了两天，又增加了人力，总人数达一百多人，还有六、七名苏联红军押车，其中有一位中尉。从西鸡西火车站出发去密山，沿途修复了张家路段的线路，排除了哈达河火车站（当时是小车站）上翻倒的棚车和113公里被炸毁的车辆等堵塞。抢修队到密山时，仍能看见火车站里日本人用地雷爆毁的军用列车，上面的尸体都臭了。抢修队从密山返回西鸡西火车站，又修复了南四道、六道的线路。被炸飞的钢轨扎在土里，人力拔不动，李树田想出一个办法：拴上绳用机车拉。抢修队苦干了十多天修通了林密线。自那时起，鸡西地区的列车又畅行无阻了！

光复前夕鸡西的文化简介

李云龙

日伪统治时期，鸡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饱受摧残，历尽苦难。当时的戏院、影院、茶社等娱乐场所只是集中在鸡西市区、恒山、城子河、滴道、梨树镇、平阳镇等几个商业密集人口较多的城镇内。据健在的老人们介绍，平阳镇在1918年建筑了八角戏楼，是由商务会长陶玉亭和惠海亭、倪兰延三人发起费时一年另八个月建成的。该戏楼是模仿哈尔滨市“新舞台”的构造样式，全楼为木质结构呈八角形，外观极为典雅，内部为伸出式舞台，可容纳观众一千余人，极适合戏曲演出。经过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八角戏楼现今仍屹立在平阳街里，为全省最早建成硕果仅存的娱乐场所，有很大的文物参考价值。戏楼接来金灵芝、碧玉婵、云凤光和肖淑兰等京剧、梆子、评剧演员，演出过京剧“封神榜”、“杨家将”、“狸猫换太子”、“红娘”，河北梆子“妻党同恶报”、“卖子哭街”，评剧“花为媒”、“茶瓶计”等剧目。恒山（黄泥河子）街里由大特务徐威浩为业主开了一个戏园子，有老艺人刘瑞轩、郎少山、云铁凤、俞月楼、花丽芳、孙艳琴（即梅笑兰，原市京剧团主演，退休后担任京剧艺校教师）等演出京剧、评剧。鸡西街里北大河附近有一长筒子形的戏院，由一些爱好戏曲的票友进行演出活动。有时也接来一些艺人演出。徐富玲和孙殿奎、孙殿琴、孙艳秋父女即在此剧院演出过“盘丝洞”、“八宝公主”等剧目。1926年梨树镇街里也出现戏园，邀

请外地戏曲演员演出，时有本地戏曲爱好者票戏。据梨树区史志办介绍，1940后，有柏文起，柴玉久等人组织话剧团演出过话剧。穆棱矿在解放前也经常有戏曲演出活动，场所是白俄人建矿时盖的一所宽阔的平房，可做跳舞厅和戏剧演出的场地。鸡东县的向阳镇（半截河）约在1929年时有一可容500人的戏园，时断时续地有戏曲演出，大多是到密山、梨树、平阳等地演出的艺人路过向阳站脚、打短，演出过“白蛇传”、“西厢记”、“包公”等戏。除了戏曲演出之外，还有书曲和地方戏、二人转的演出活动。现在鸡东县下亮子居住年近八旬的二人转老艺人朱云贵（艺名金香水）于伪满时代就曾在八面通、黄泥河子、林口、密山等地演出二人转、地方戏。在平阳、鸡西、恒山等地的戏院经常是京、评、梆子、地方戏同台合演（旧称四下锅）。又据79岁的老人芦守纪同志（市京剧团退休工人）介绍：日伪时期鸡西、恒山、城子河都有说书馆，那时在北大河南岸的市场里（现26中）就有两个茶社演出书曲。书曲艺人张相林演出大鼓书“杨家将”、“呼家将”，周少红、于少卿两个西河大鼓女艺人演出过“大隋唐”、“西厢记”，评书艺人杨宝森演说“三侠剑”等书曲节目。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煤炭资源，从关内和南满等处抓来大批苦力强迫他们下井创煤充当廉价劳力，其中就有艺人和文化人。原京剧团老演员李艳樵（1977年去世）就是从天津被抓来到滴道采炭所下坑。他和张春光同志（市艺术馆退休干部）就曾组织一些京剧爱好者在业余时苦中求乐。张春光善于拉京胡、会唱青衣，李艳樵则是生旦净丑无所不能，他们经常在滴道中暖、大半道等地进行清唱、票戏来进行自我慰慰。其它象城子河、麻山、恒山等矿也有一些爱好者进行业余戏曲活动。敌伪时期，恒山矿、滴道矿、城子河矿已有了小型的电影院。鸡西街里有一文化院（县中兴影剧院）放映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国华”、“艺华”影片公司和伪“满映”拍摄的影片。文化汉奸张

善琨主持的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碧玉簪”等一大批插进“流行歌曲”的古装电影和“满映”出品的“黑脸贼”、“黑手盗”等影片都在鸡西地区上映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了达到反对英美宣传的目的，由伪“满映”和伪“上影”联合摄制大型影片“万世流芳”（即林则徐）也曾在鸡西上映。以明星面目出现的日本特务李香兰在片中扮演卖糖姑娘大唱“卖糖歌”。一些消磨人们意志，腐蚀人们灵魂的歌曲一时很为流行。如今年近六旬的一些老人对“柳叶儿青又青、妹在马上哥步行……”（千里送京娘插曲、李丽华演唱）、“鸟儿拚命的唱，花儿拚命的开……”（影片渔家女插曲，周旋演唱）和“烟盘儿富丽烟泡儿黄，烟斗儿精制烟味儿香……”（影片“万世流芳”插曲，李香兰演唱）的曲调和唱词仍有印象。同时录有用中文和日文两种语言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满洲姑娘”的唱片不时的在街头巷尾反复播放，用靡靡之音麻醉人们的精神意志。

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吞并世界的野心随着侵略战争的失败而破灭，更变本加厉的抢夺煤炭资源和压榨奴役中国人民。日寇汉奸花天酒地，劳动人民只能以橡子面来果腹。广大艺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汉奸特务把他（她）们当做茶余酒后开怀取乐的玩物而肆意摧残。以下的几个例子，可以做为挣扎在深渊里的艺人生活之写照。

梅笑兰老师是艺人世家，十几岁登台献艺。她们一家由于吃大米成了经济犯被迫从牡丹江逃来恒山演戏。戏院业主是大特务徐威浩，徐的儿子在日本宪兵队供职。徐威浩仗势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众多艺人吃的是代壳的红高粱和橡子面，大锅菜是不削皮的烂土豆和青白菜帮子，住的是八面透风的大工房，土炕上连炕席都没有，用破砖头作枕头。艺人们挨冻受饿一个个面黄饥瘦，身体衰弱，还要一天唱两场戏给徐威浩卖命。戏院就是鬼门关，进

来的就别想出去。想另投生路的人都要受到徐威浩的无情迫害。梅笑兰同志介绍说：“当时有一个唱小花脸的艺人叫孟凡德，实在熬不了这非人的苦难，趁机逃跑到了鸡西，不幸被徐的狗腿子抓住押回恒山，吊在戏院的舞台上，被徐威浩用大马棒打的死去活来险些丧命”。徐用敲山震虎的手段来威胁艺人给他唱戏，他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而艺人们则忍气吞声的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梅老师无限感慨的对笔者说：“这会儿的年青人，哪儿见过那样的苦日子？想起来我的心都揪起来啦！眼下虽然物价高些，可吃什么有什么！和那会儿比真是天上地下呀”！

原京剧团老演员李艳樵在生前诉说过他在滴道当苦力的惨状：李从天津被抓到中暖采煤，一个演员怎能承受住一天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他趁一个风雪黑夜下工之机偷偷地趴在地下，躲过把头和矿警的耳目逃奔林口方向。可叹他人生地不熟，没走到麻山就被人发现，再次被抓送回中暖。凶残的日本人用刺刀把他的腿肚子挑开半尺长的口子，又用炉灰往血淋淋的伤口里揉，疼的他昏死过去。鬼子把他扔进万人坑，多亏烧锅炉的工人石德玉（原鸡西浴池工人）把他救起才拣了一条命。李艳樵躲在锅炉房里大半年，身上一丝不挂。石德玉用煤渣换来大煎饼给他充饥度命，因此二人成为生死之交，解放后二人来往密切，时常追忆往事共庆新生。

现年79岁的芦守纪老人说：那时北大河旁的市场有两个说书馆，一个是特务田顺开的用席棚搭的茶馆，请来张相林来说大鼓书。后来大特务孙华轩又开了一个大茶馆，芦守纪老人就在这个茶馆照坐。从外地请来周玉红、于少卿两个书曲女艺人唱西河大鼓。因这两个女艺人年轻貌美、嗓子好听、说唱有味很受观众欢迎，遭到警察汉奸们的嫉妒，经常到茶社开搅、捣乱和调戏女艺人，鸡西警察队有一个日本队长更是凶恶无比。他经常带着一群警察到处横行霸道，对老百姓和生意人肆意打骂。一个做冰激凌

的小贩，刚做好一桶还没有外卖，日本警察队长就把盖子打开摔了一大把砂子哗的一下倒进桶里。于少卿可能因应酬不到得罪了警察队，日本队长带着打手闯进茶馆一顿乱砸，摔碎了茶壶茶碗，把挂在茶社里许多帐子扯下来撕烂，把大鼓和鼓架子一古脑儿扔进北大河里，把于少卿吓出一场病，把茶馆也给搅黄了。这就是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和艺人们遭受的压迫和痛苦，直盼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才得到翻身解放。笔者采访过的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不受欺压，过着幸福的生活。”

解放前夕鸡西教育概况

王 嘉 才

1932年东北沦陷，日本军国主义者扶植溥仪做了傀儡皇帝，建立伪满洲帝国。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培养效忠日伪的奴仆，他们在东北极力推行奴化教育。

鸡西地区原隶属密山，1941年（伪康德八年）设置鸡宁县。全县在沦陷前，只有小学3处，在校生仅240人。至1945年，14年间一般村、屯都建有学校。人口比较多的村、镇为国民优级小学，余为国民小学。国民小学为初级小学，学生在校学习四年。国民优级小学分初小、高小（称优级学制二年）两个阶段。全县共有中心学67所。其中：中学1所，国民优级小学22所，国民小学30所；日本籍小学13所（分“一般地在满国民小学”和“开拓地在满国民小学”两种，俄国侨民学校1所。在校生5500余人。

日伪政权实施愚民政策，加紧文化侵略步伐，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学校，他们极力向师生灌输“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日满一心一德”等思想，强制师生天天背“国民训”和“回銮诏书”。天天向日本“皇宫”和伪“帝宫”遥拜天皇和皇帝。节日要师生列队到“神社”和“忠魂塔”祭扫、默哀，此活动有固定的程序，繁文褥节，不许有少许差池。严禁师生谈论国事、政事，极力进行反共、反苏教育，师生的言论，稍有忤逆，律为国事犯，遭严厉惩处。

伪满学校里民族意识和等级观念极强。他们宣扬“大和民

族”为优等民族，理应主宰一切。各校校长名义上由“满洲”国人担任，实质上一切事物的处理，均要听命于日本知事。日本妄图借助朝鲜族人巩固其统治地位，对朝鲜族学校统治尤甚，施以严格训练，在校期间，师生一律改称日本姓名。

为奴化教育的需要，安排课程和教学内容。伪满国民小学，设有修身（即思想政治课）、日语、满语（即语文）、算术、珠算、自然、图画、体育、音乐、手工等十科。国民优级小学除上述课程外，增设历史、地理、军训和实业课。强制师生学习日语，不准学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解放当时，全县教员约160人。分为教谕（分二、二、三种，即三个等级）、教导、教辅（相当于现代课教员）。中、小学教员属文官职，由县政府发委任状，一般为乙种委任官或委任官士补。教师每月除薪奉（工资）外，分有职务津贴（日本人分有勤务地津贴），国境津贴（林口以东均为国境）、炉火津贴（相当于取暖费）、年终有本人薪奉的14至18成年终赏余（相当于包干节余奖）日语经考试，按程度发给语学津贴，康德八年又增强家属津贴。每个教师发给一本甲种通帐（相当于购货证），凭证可买到市场上没有的物品。一个教员的收入相当于三、四个体力劳动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宣告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帝国”随之垮台，十四年的奴化教育，终于结束了。现在时隔四十多年，我们亦不应忘记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振奋精神，发展鸡西的教育事业。

伪满“鸡宁国境警察队”简介

何 崇 阁

鸡西位于祖国东北边陲，南端约50公里即与苏联接壤。早在1931年9月18日前，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是密山县管辖内的一个农业地区和煤田。日寇侵占后就设立密山县警务局，后改警务科、哈达河警察署、滴道分驻所等。于1938年将分驻所改为滴道警察署，内分警务、保安、司法、特务等四个系，同时成立鸡宁派出所、城子河分驻所、恒山分驻所。均属滴道警察署领导。

为了适应与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加强国境监视的需要，于1938年把警察机构改为国境警察队制度。滴道警察署改为滴道国境警察中队，鸡宁、城子河、黄泥河（现恒山区）分驻所改为警察小队。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量掠夺鸡西地下的煤炭（伪满称之为“密山煤田”）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满抗日爱国活动，以及为侵略苏联作好准备之目的，在所谓“北边振兴”工作计划的名目欺骗下，于1941年9月1日从密山县境内分割而成立了鸡宁县。随着鸡宁县制的建立，设置了伪鸡宁国境警察队本队，是伪鸡宁县公署的组成部分。本队下设：特务、队务、警务、警防等四个股和警察警备队特别搜查班。管辖鸡宁、滴道、平阳镇等三个国境警察中队，若干个警察小队和分队，共有警察约750余名。1945年3月伪鸡宁国境警察本队，迁出伪鸡宁县公署，与鸡宁警察中队合并（地址在现红旗铁工厂处）改名为鸡宁国境警察队。

撤销了原鸡宁中队，设立了直辖哈达岗、城子河、恒山等三个小队、滴道中队、平阳镇中队，还有四个直辖分队，即：梁家分队、新市街分队、东砂场分队、鸡冠山分队。鸡宁县国境警察队本身除设四个股外，还设有二个室：督察室、兵事室。

伪国境警察队是为对付苏联和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各种需要，要求警察机构能够起到军事行动的补助作用，实行军事性质的制度。其任务：在所谓“依法受执行警察业务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名目下（1）封锁国境，加强警戒，侦察、逮捕自苏联潜入的谍报人员，镇压鸡西煤田工人的反满抗日破坏及我抗日爱国的地下工作人员等。（2）各种情报的蒐集，外国人动向查察、劳动者动向查察，“要视查人”查察，国境地带居住、迁移、旅行管理、思想对策，侦察逮捕、特别搜查、特种营业管理等。（3）对所谓刑事犯罪搜查、逮捕，审讯向法院起诉移交、保安、卫生监督、经济犯罪搜查检举等事项，此外还有防空监视，防空训练和奉公队训练等项。

其罪恶活动是：

第一，把国境完全封锁起来。1937年伪满洲国牡丹江省制定了“国境地带法”规定在甲号地居住的年满14岁以上的男女国民都必须有“良民证明书”。因此，鸡宁国境警察本队，根据鸡西地里环境位于中苏国境接壤，把鸡西划为第一号国境地区，限制中国人民（当时叫满洲人）的自由行动，在警察本队特务股设有“居住证明书室”，各中队、分队、小队也均有专人负责发放和管理国境地带“居住证明书”。从中注意发现通苏及反满抗日的地工人员。伪满鸡宁县曾两次发放居住证明书，约为162,000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中国人就是有了“良民证”如遇有外出探亲访友时，也必须经警察中队特务系批准，发给旅行证明，同时还必须按着旅行的目的地址、规定时间、经由路线旅行。否则除禁止旅行外并要拘留审查。

第二，大量发展使用密探，设立情报点。鸡宁国境警察队本队特务股下设特务系，居住证明书室，内、外分室，三个中队还有三个特务系。各小队也均有专门做特务工作的职业特务，并且还大量的发展使用密探分子也叫特务腿子。本队特务股在鸡西街北河沿处对外称“兴亚疗”，有八名职业特务专门从事镇压反满抗日爱国活动，设有秘密监狱一处，专门拘禁所谓政治犯，在1945年8月东北解放，日寇溃退前夕，将监狱被拘押的爱国志士全部秘密杀害了。鸡宁国境警察中队从1942年9月至1944年4月，就在鸡西街内各种社会团体、组合、会社等各行业中设立情报网点58处。还有许多密探分子。1943年为强化防谍团体而成立了在警察队长领导下的由各社会团体、组合、会社以各种行业的负责人参加的所谓“土耀会”组织，并规定星期六集合在一起，汇报与研究各机关的防谍工作。还把鸡西街饭店、妓院、旅店及各种会社职工集合起来，在电影院收听无线电广播。施以对苏联的诽谤宣传，号召汉奸特务爪牙等检举通苏及反满抗日爱国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密探，加强了特务活动，残害中国人民。

第三，镇压鸡西煤田(伪满称密山煤田)工人的反满抗日破坏活动及抗日爱国地下工作人员。警察中队在滴道煤矿、城子河煤矿、黄泥河子煤矿等处设立警察小队，每小队10人左右，重点调查工人反满抗日的思想动态及防止工人暴动逃跑等。在1943年9月鸡宁国境警察队特务系主任逮捕了由华北派来滴道煤矿进行活动的我地下工作者谢××，企图逆用，但谢某不甘为日寇效力，被特务股长将谢某诱至伪鸡宁县公署东边约三公里的地方秘密杀害。1943年5月在城子河“矫正院”拘押我被俘武装人员60名，因集体逃跑未果，被枪杀6名，被捕4名，其下落不明。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对物质的掠夺极为重视，特别是掠夺鸡西这块地下资源——煤炭，而深感劳力不足，

仅在1942年9月至1943年秋就在鸡宁街捕抓了575名中国人，所谓“浮浪”劳工，送往煤矿挖煤。在同一时期伪奉天省（现辽宁省）警务厅抓了150名中国人送往城子河煤矿强制劳动，为日寇掠夺生产煤炭至祖国光复时，其中有部分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下丧生于九泉之下。

一九四五年八月，这个日伪爪牙组织机构才彻底瓦解。

解放战争中的红星化工厂

井翔中 整理

东北红星化学工厂，简称“红星化工厂”。1946年该厂初建
在鸡西，1947年春又选址重建在东北工矿处滴道矿务局的河北地
区。

1945年鸡西地区光复后，矿区着手恢复煤炭生产，遭受日本
帝国主义逃走时的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机械设备十分简陋；而
且生产所必须的物资及一切原材料极度缺乏，一片废墟似的，给
该山的恢复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虽然那时缺乏的设备及材
料，由工矿处材料供应科到外地组织进货；但是煤炭生产所必须
的导火线、火药和雷管，以及军用、民用火柴，都非常奇缺。特
别是导火线、火药和雷管，严重威胁着矿山恢复和煤炭生产。因
为，时值光复后不久，各地均尚未生产上述产品。立即解决这些
当务之急的物资供应，在解放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为首先解决军用和民用火柴的困难，在东北工矿处处长刘向
三指示下，由搞过军工的韩时针同志，带领我军战士接收了阿城
明远火柴厂。然而，接收后的火柴厂早已被破坏得空空，仅剩下
了六间草房子。韩时针同志只好到呼兰火柴厂去绘制制造火柴的
机械图纸，又到哈尔滨加工和修补了机械零件。于1946年11月，
韩时针押着八火车皮破烂机器，并带领着技工人员及家属，来到
鸡西。当时鸡西工矿处处长孙然同志，决定在鸡西街靠河边的两
座木制的妓女楼上，安装机械生产火柴；但是安装后，楼板承受

不住机械的重压，楼板被压弯了；这才决定了在滴道矿区选择厂址，重新建立火柴厂。

迅速建立火柴厂，是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的。因为，当时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在每个接收后的地区，均由统一机构管理工作。就是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组织机构。如恢复时期的滴道煤矿，党政组织除抓矿井恢复和煤炭生产而外，还要管矿区的粮食供应、日杂百货、以及公安、街道等工作。即所有部门，均为当时本矿的组成部分，由矿统一领导矿区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生产和生活两大项。

1946年末，韩时针曾经找到滴道发电厂对面的原日本陆军兵营，觉得那里的条件不合适，建火柴厂并不方便；最后才找到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时建的河北旧灯房子。决定除旧灯房子而外，再占用几栋小平房。就这样，于1947年春天，从鸡西搬来机械设备等，建起了火柴厂，并投入了生产。

火柴厂的厂长由韩时针担任，下有管理员、会计、采购员、技术员、机修段长、生产工人70余人。不久，韩时针和张定一等人，又在灯房子北面几百米的地方，办起了火药雷管厂；并于47年六月份正式投入生产。火药雷管厂由尹学瑞任厂长，这个厂共36人。

火柴厂也生产导火线；火药厂生产火药、雷管。火柴、导火线、火药和雷管的生产，是红星化工厂的主要产品，也是历史赋予该厂的光荣任务和职责。

那时创建东北红星化学工厂，没有懂行的人。东北工矿处派了张珍、王勋两名同志来滴道。王勋同志在延安是搞火柴的，张珍在延安是搞军工的。在他们的指导和带领下，红星化工厂投入了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原料特别缺，尤其是黄色炸药。韩时针组织工人，在矿区各地换炮弹，就是发动人民群众找炮弹并付给报酬性的产品，如火柴。他们把炮弹里的药抠出来，再和硝磺混合在一

起，制造的火药效果很好。

引火线（导火线）是用纸把药包上，外面缠上纸绳子，再包一层牛皮纸，牛皮纸外面涂沥清，沥清外再包纸；他们没有制造导火线的机器，就用木材自己做了一架机器。导火线的燃烧速度，达到一公分长的导火线一秒钟燃烧完。

张珍同志指导韩时针厂长学会了做雷管。雷管外皮是用牛皮纸卷起来的，里面夹上铁帽。

黑色火药、黄色炸药、以及制造雷管所需的汞、硫酸、水银等，大部分原材料来源于辽宁省抚顺火药厂。生产火柴所用的磺磷等大批材料，来自哈尔滨和阿城；其它的材料在各地还容易买到。生产火柴自己加工火柴杆。做火柴用的木柴是矿上的坑木。化工厂有排杆机、旋片机、切片机、划印机、卸杆机。火柴盒的商标纸皮，是在哈尔滨印刷厂切印的，拿回厂糊在火柴盒上，全是手工操作。火柴头比较安全，三年之内不能自燃；内加防潮药，火柴头沾腊，烘干、装盒、封包、装箱，每箱240包，每包10盒，每盒100根。徐秋凤、孟秀兰等三个姑娘，跟韩时针配药、化水胶、化磺磷，她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做火柴需要湘粉、玻璃粉、硫酸锌、碳酸钙、氯酸钾、盐酸、防潮剂等，计八种原料。为此，工矿处总务科科长尤金同志，经常跑夹皮沟。他把金子围在腰上往哈尔滨带，为化学工厂跑原材料，协助丁芒同志采购和推销。火柴的销路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有个警卫员小刘，当年仅十三、四岁的年令，长着两颗大牙，大眼睛，精神能干。他专跑这几个城市，把销售火柴的钱收回来，而且还负责把货发出去。发货是用马车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各地。雷管和火药主要是供给鸡西矿区的恒山煤矿、滴道煤矿、麻山煤矿、城子河煤矿——这是那时期的四个大矿。

东北红星化学工厂是很挣钱的，鸡西办事处（鸡西是东北工矿处的一个办事处）发不出去工资，孙然多次向该厂调钱，因为从

哈尔滨调款不及时。就这一点，也对鸡西的煤炭生产起了很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李立三、陈郁、徐宏文等同志，都曾经到过这个化学工厂。因为这个厂很重要，名声也很响。他们不仅来这个厂看，而且还作了指示，促进了化工生产。

然而，红星化学工厂的生产，一直面临着化工原料及其产品易燃易爆的极大危险。火柴、导火线是易燃品；雷管、火药是容易引起爆炸的物品，这是人人皆知的；但是，这个厂的领导和工人们，为支援煤炭生产和人民生活，为支援解放战争，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很高。

虽然火柴厂和火药厂，在行政领导上是两个厂，但是却在一个厂生产，统一称东北红星化学工厂。生产设备全是土法上马，易燃易爆物品混合在一起，每时每刻对全厂职工和河北地区居民，都有严重的威胁。但是为了支援全国解放，全厂100多人，在无法摆脱的困境中坚持了生产。

1948年5月，韩时针调往阜新总机厂任厂长，刘秉臣和尹学瑞接任化工厂领导工作。当年，化工厂发生了一次骇人的爆炸。损失两吨火药和两栋房子。后来经过追查，枪毙了安放定时炸弹的一个姓郝的特务。1948年末，化工厂又发生了一次火灾，引爆了原材料及产品若干，也炸毁了机械设备和器材。因为这时全国已有了许多处生产同类化工产品的工厂，所以，红星化学工厂终止了生产。

东北红星化学工厂，两年中为鸡西矿区的煤炭生产和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它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史料来源于鸡西矿务局史志办。）

鸡西最早的行政建制——密山府

曹 旭 东

鸡西密山一带，最早的行政建制是密山府。密山府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改县，历时五年。

密 山 府 的 建 立

清朝末年，松花江以南至俄界是吉林省辖地。吉林省东部穆稜河流域平原千里，土质肥沃，资源丰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吉林将军长顺奏准在这里建立蜂密山招垦局，放荒招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帝俄侵扰焚烧，垦户多逃亡，招垦局撤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建立穆稜河招垦局在农旺镇（龙王庙）建招垦分局，放荒招垦，这一带有了相应的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吉林巡抚朱家宝奏准建立密山府。

当初密山府境，西从青沟岭，东至松阿察河乌苏里江，南从兴凯湖俄界，北到挠力河。东西长八百里，南北宽三、四百里，包括现在的鸡西市、鸡东县、密山县、虎林县、饶河县、宝清县全境。宣统元年，建立饶河县，宝清州，虎林厅，三地从密山府析出。

密山府知府衙门，设知府一人，经历一人，负责行政及司法事务。知府魁福，当年五十四岁，盛京（沈阳）满洲镶白旗人，

光绪十四年（1888年）乡试为举人，在清政靖边和剿办马贼（即土匪）中立过功出过力，他老成谙练，朴实耐劳，以之试署密山府知府，一年后实署。经历，清朝官名，隶于知府，协助知府掌管财粮事务，谁人任密山府经历，笔者不详。

府设城乡巡警局，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巡警局下设四个分局，有员办2人，乘马巡查6人，徒步巡查17人，共25人，府还设有护垦步队一营240人，由垦户纳税，负责保护垦民。分驻在穆棱河起点20人，亮子河60人，石头河子60人，水曲流河20人，密山府60人，呢吗河口20人，

府址设蜂蜜镇也叫蜂蜜山子，可能是现在的知一。当年的蜂蜜镇有30户人家480口人，多数是从山东移民为垦荒而来的。

当初府下设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四个乡下共有二十六个村。宣统元年（1909年）统计，共有1520余户，11,020余人。我市的恒山当年叫黄泥河子，是西乡的一个村。密山府后来又划为裴德乡、松明乡、怀远乡、蒋花乡、石头乡、哈达乡。那时我市的鸡冠山、黄泥河子属石头乡，城子河、滴道河，小穆棱河属哈达乡。

密山府于光绪末年建立，宣统年间仍称旧制，民国二年三月奉大总统“画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统改为县。

密 山 府 的 经 济

密山府地广人稀，为实边守土建立府治，那时主要的经济活动是放荒招垦，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放荒招垦。经过向东三省总督请愿，已获准除由官费开垦之外，根据商民开垦法，亦可共同开垦。

开垦方法大体为三种：

1、官垦。开头几年，由官府拿出三十万吊，着重于开通道路及派兵护垦，并招募垦丁二千人。

2、商垦。实际是官商联合共同合股。官府五万股，商民十五万股，合计二十万，只开垦指定的土地，而不缴纳地价。垦熟的田地，二成归官府，八成作为股金公平分配。

3、民垦总局成立以后，招募贫民令其按规定缴纳保证金（每十亩四吊），由其自行垦种。

这样上等荒地大多被富豪所独占，贫困农民所得土地不是低洼地，就是涝洼地，到宣统元年，就已开垦4,500垧，这里有可开荒地267,326垧，主要是种植大豆、玉米、高粱、水稻、小麦、谷子等等，粮食自给有余。东部就从档壁镇，呢吗口（虎林）西部就从梨树镇运销俄国。

那时饲养和采捕也很兴旺，据宣统元年统计，1,500户农家副业，养马1,250匹，牛1,210头，骡110头，驴120头，猪1,500头，鸡2,000多只。山产品也很丰富，木材、木耳、人参、鹿茸、狗皮、虎皮、元蘑、花蘑，时令季节经常可以采到，是农家的一笔重要收入。

初建密山府时，铜、铁、煤都有发现。在二人班的老黑山发现铁矿。凉水泉，发现金矿，在同治年间曾有人开采，兴旺时每天有上千人采金。在鸡冠山、滴道河、城子河一带发现有露头煤。

密山府的交通，主要道路能通往穆稜县、依兰府、虎林厅、档壁镇、龙王庙和临江。交通工具主要是大车牛车和冬季使用的大小爬犁。那时有大车五十辆，牛车三十辆。

人民生活 and 交换的需要，商业加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那时蜂密镇有商铺8户，木匠铺3户，饭馆3户，磨房8户，洗澡塘1户。人们生活用品，是商人从营口、哈尔滨经由牡丹江、绥芬河铁路和穆稜河运进来的，从呢吗河口（虎林）俄国也输入一部分。

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通用俄国货币、吉林官帖和铜钱。

俄国一卢布可兑换吉林官帖四吊四百文。银元一元兑换三吊二百五十文。

府内还有烧锅二家，每年约产酒二万四千斤。油房二家，一家每日轧豆油四十斤，豆饼十块，一年产豆油一万二千多斤。石灰窑一家，冬天生产，一年约产五万斤，砖窑二家，年产砖四十万块，木炭窑二家，年产四万斤，这些产品主要是就地消耗。

燃料比较丰富，主要是木头和木炭，其它也有谷秸杂草。劈柴半，一丈长五尺高二尺二寸宽的一堆木半，值八吊至十吊钱，其种类多数是柞木、杨木、椴木。

那时，由山东、吉林、内蒙、黑龙江来的垦户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共同劳作在这块丰盛的大地上，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过着“棒打獐狼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生活。密山府真是一个天府。

李立三同志来滴道

井翔九 纪海峰

1946年12月15日清晨，一列专列停在滴道洗煤厂的专用线上，担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等职的李立三同志，迎着天上飘零的雪花，来到了边陲鸡西滴道煤矿。同来的有东北工矿处处长刘向三、哈尔滨市市长刘成栋，和十几个警卫人员。

李立三是根据东北局李富春的意见，和刘向三“关于接收矿山是否有必要”的意见来作调查的。当时天气凉了，他们都穿着缴获日寇的军大衣，很朴素。

李立三和刘向三等同志，除了步行走访河北工农总会20岁的会长陈子章等人，还看了住“大房子”工人们的生活；并先后召开了有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参加的会议，调查了解了日伪统治时期和无政府时期滴道煤矿的各方面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时许，李立三在专列上召集了一个有煤矿各行各业代表参加的20多人的群众会议。其中有当时担任民主政权的工农总会会长陈子章、副会长兼党小组组长郝金安，还有煤矿的测量采矿人员和土木技术员。

与李立三同志同来的一名干部主持会议，他说：“中央领导要听听你们大家的意见。”让人们围绕三个问题畅怀谈谈：

- 一、滴道煤矿是不是中长铁路的；
- 二、白俄矿长乌洛维赤来到这个矿，干了哪些好事和坏事；

三、你们大家对这个矿的看法。

代表们向李立三同志反映和汇报了三个问题：

一、滴道煤矿不属于中长铁路。测量技术员于学孟慷慨激昂地说：“中长铁路只通到穆棱，有地图和文件为证。不信，我回去拿地图！”李立三微笑着让他坐下，示意他不必取地图。

二、俄商是打着苏军司令部和中长铁路的招牌来接收矿山的。他们来，不是恢复煤炭生产的。大家纷纷对李立三说：1945年12月15日，一个叫郭洛郭夫的苏联人，自称是中长铁路煤木处处长，打着苏联红军司令部旗号，来接收滴道矿，并从穆棱矿调来一个外号叫“大马贼”本名叫乌洛维奇（他为了表示自己靠近红军，将名字末尾的“奇”字改为“赤”字）的俄商来当矿长。他原来是伪满穆棱煤矿的矿长。乌洛维赤来了以后，说：“哈尔滨红军司令部没有煤，都快冻成冰棍了，人民也快冻死了！”他这样宣传煤的重要，并用包工的形式往外运滴道的煤炭。

他们又派来了一个搞机电的苏联工程师龙茂斯基，还有10多个管理财务的人员，把持了矿山的一切权利。乌洛维赤口头上说要恢复井口，实际上，只是二井、三井进行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改造，其它井口一概未动。

他除了往外运日本军国主义掠夺剩下的落地煤，还运煤矸石。当时，滴道矿有一座矸石堆，从洗煤厂向东起伏约400米长、50米宽、平均高度10米，煤堆与现在的三号煤相等，约40~50万吨。平均每天用火车运走四趟，每列13~14节车皮，一个车皮约装载50~60吨，已经运了一年多。为了使运煤的苏式机车畅通无阻，从1945年10月起，乌洛维赤趁当时矿山混乱之机，把原来的铁道加宽了一轨。后来，每天运走贮煤4000吨左右。

乌洛维赤还叫人拆卸了洗煤厂、河北小发电所、滴道发电厂的电机等机械设备，还把一些大木头、电柱、钢板，甚至房子的门窗，都运往穆棱矿。在这段时间里，郭洛郭夫也来滴道矿几

次，每次来都宣扬要在这个矿搞共产主义。他用吉普车拉着工农总会的干部陈子章、郝金安，及武装委员、民兵基干队队长杨玉林，还有这里的土改工作组组长胡炳岩，在矿区里转游。郭洛郭夫指示他们，要按他指定的地方盖上大俱乐部、食堂、托儿所……他说：“都要发展起来！”他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给拨款。

三、乌洛维赤不给工人开工资。

参加会议的人，纷纷向李立三反映不开工资的问题。1946年以来，工人们有三、四个月没领到工资。工资开法不一样，被任用的职员，给的是苏联红军票。有些工人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只能领到30斤高粱或玉米。工人们为了吃饭，一些人把大半道地区的房子拆着卖了，有的人自己去开小煤窑，也有一些人当了胡子……矿工们也曾找过乌洛维赤，问他把煤运到哪里去了？卖了多少钱？为什么不恢复井口生产？乌洛维赤搪塞工人，要他们去告状。然而，代表群众去哈尔滨告状的徐成山等人也没找到讲理的地方。无奈，工农总会决定由民兵基干队，将乌洛维赤的一个姓栾的中国翻译扣押起来。

群众代表向李立三反映了上述情况后，要求中共中央民主政府接收自己的矿山，自己管理。工人们说：“这个矿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和乌洛维赤破坏的很厉害，如果再不接过来，矿山就无法恢复了！”李立三同志试探地问：“你们能管得了吗？”群众回答说：“能管好，能干好。”李立三同志说了一声：“好！”便当即通知下午五点钟到乌洛维赤办公室开会。

这次在专列上召开的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下午五点钟左右，李立三在守山寮二楼“矿长”办公室开始与乌洛维赤交涉。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40多人。下午在专列上开会的群众代表，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办公室容纳不下，一些人就呆在走廊

里，等待交涉会上的李立三同志随时向他们询问有关情况。

李立三是用俄语与乌洛维赤交涉的。说到气愤的地方李立三同志发了脾气，还拍桌子，说话象打雷。乌洛维赤开始和李立三争辩的很硬气，后来坐在小方凳上无话可说，低着头象个瘪茄子。

李立三用汉语对参加会议的人们说：“我刚才和他谈的内容，大意是中长铁路问题。滴道不是中长铁路的！”

李立三同志来滴道，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中央来的一位大人物。当于学孟问了李立三的秘书，才知道他是李立三同志。又通过他的秘书人们也才得知，李立三用俄语和乌洛维赤交涉中辩论了三个问题：

一、滴道不属于中长铁路。

二、关于中国人民自己的财产权。

三、关于乌洛维赤拖欠工人的工资。

双方争论的情况和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李立三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要接收矿山，我要你退出滴道煤矿。”

乌洛维赤说：“我不是资本家，是代表中长铁路红军司令部来的，是他们派我来的！我可以回去，不过，我得等中长铁路红军司令部的通知才能走。你们和中长铁路交涉吧！”

李立三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也是中长铁路的中方代表，中长铁路在我的管辖之内。我来的时候，已经召集红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开了会，都问过，他们不承认有人派你来。我命令你退出去！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准备移交。”

乌洛维赤这才答应走了，也答应了作好移交。

李立三说：“凡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不准你再运走！”

乌洛维赤说：“那是我们的战利品。”

李立三说：“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是尽国际义务，不是占领。你是俄商，可不能打着苏联红军旗号来掠夺。”

乌洛维赤无言以对。

李立三又说：“我代表工人阶级，命令你把拖欠他们的工资，一律补发了再走！”

李立三一只脚踏在小方凳上，面对“矿长”据理力争地交涉，“矿长”耷拉着头，再也无话可说了。会议到晚八点才结束。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李立三等同志一起到了当时的村政府——河北工农总会。他与陈子章、郝金安、胡炳岩等人，随便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吩咐工农总会释放姓栾的翻译；还叫宽恕一个为洋人干事的财会人员，不要枪毙他。他说：“把知识分子留着，将来全国解放后有用。”然后，李立三与他们一一握别。

陈子章和郝金安把李立三等人送上了专列，李立三又与他俩握手告别。

李立三同志走后不久，哈尔滨铁路局派鲁陆宜等两名同志，作为东北民主政府接收矿山的先遣队来到了滴道矿。接着，东北局又派唐南屏等一些干部，来滴道矿任职。

1947年2月1日，滴道正式成立了“东北工矿处滴道矿务局”。半年后才改称“滴道煤矿”。

盛产主焦煤的鸡西滴道煤矿，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11年的血腥统治和掠夺，又经历了一个冒牌“红军代表”的抢占和破坏，最终，由党的优秀儿女、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同志，亲自把它收归国有，回到鸡西人民手中。

注：这篇《李立三同志来滴道》是经杨玉林（滴道煤矿副矿长）、于学孟（大雁高级工程师）、郝金安（当年党小组长，现年77岁）等同志的追忆回述写成的。他们为搞清楚这段值得记载的历史，曾积极协助作者长期调查补充资料。

陈慕华同志在穆棱煤矿

穆棱矿党委办公室

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穆棱矿只停产两三天就恢复生产。当时由苏联红军接管，矿上下层的职能部门及其管理人员仍是原班人马，白俄人员。一九四六年十月，党派陈慕华、钟毅二位同志任党、军代表，正式接管穆棱矿。此时穆棱矿列为中长铁路的直属企业。党、军代表来矿区，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工作踏踏实实，能接近群众、依靠群众，深受群众的拥护。首先把过去的所、股长体制改为矿、科体制。并提拔重用有专长的中方的老职工为科、井长和管理干部。当时的秘书科副科长是金玉声，矿务科副科长是潘子光，机械科副科长是程科首、工程科副科长是国芳茂、运输科副科长是乔聃堂、材料厂负责人是郑文治。各井负责人如下：一井刘士启、二井矫宏业、三井戴洪勋、四井封继卿、发电厂史天甲。改变了党、军代表来矿之前那种凡生产、技术、行政等权力全操纵在白俄分子手中的状况。陈慕华、钟毅积极领导矿工和满泰把头、大拒和劳务系作斗争，废除了把头制，矿工从此不受剥削和压迫，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为以后的矿山恢复、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陈慕华还亲自筹备组织矿总工会，召开了穆棱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矿工代表大会，选举了矿总工会主席等十三名委员。各井科相继成立了八个分工会。陈慕华、钟毅看到矿工井下劳动强度大，提议并经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把过去一天十二小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陈慕华、钟毅在矿期间，非常关心职工生活，具体帮助工会为群众谋福利。当时矿区缺粮，特别是吃不上白面，他们派矿工会福利委员米振江和区德泰油房刘经理一同去佳木斯买粮。由于刘是伪警察出身，在佳木斯搞女人，还大吃大喝、任意挥霍，而且要把他挥霍的钱加在粮价上叫矿工负担，米振江反对，引起刘的不满，从佳木斯返回矿后，米把刘的做为反映给群众，引起群众强烈反感。刘对米抱有恶意，曾两次找米单独到德泰油房去，米恐刘下毒手，几次都叫别人同他一起去，因有人陪同，刘却说没事就让米回去了。过些天，陈慕华召集会议，有区长孟广祖、德泰油房刘经理、矿工会主席姜培功、封继卿和米振江。当米一进屋看到刘气势汹汹，就认为刘要对他下毒手，米即刻拿起大枪向刘打了两枪，当场将刘打死，区长警卫员掏枪欲还击，陈慕华立即制止说：“不要打了，已经打死一个了，还要再死一个吗？这件事由组织处理。”当时陈慕华同志表现的非常冷静、沉着，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使事态扩大。事后，由于全矿职工联名写信保米振江，组织上查清刘的问题属实，得知其人民愤极大。并鉴于刘虽然有错误，但米也无权随便毙人的情况，对米判处五年徒刑，去凤山劳改队。

为了方便职工生活，陈慕华同志首先倡导成立了矿工生活消费合作社（地址在现东山兰球场，原房已扒掉），号召职工利用一个星期天劳动所得工资入股，在她的带领下，工人们积极入了献工集资成立生活消费合作社的热潮中。合作社成立后负责供给职工生活日常用品，受到广大职工和家属的欢迎。使那些二道贩子卖高价日用品的现象消除了。

陈慕华、钟毅非常注重矿区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当时矿区文化落后，只有小学四年学校，校舍简陋，没有操场，他们发动并亲自带领职工群众几百人利用星期日献工平整操场，改变了校容校貌，为职工子弟学习创造了条件。

陈慕华同志对矿山妇女工作尤为重视，她发动矿工家属和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组织了妇女会，教唱革命歌曲，每逢开大会的时候她领着妇女拉歌，还常给妇女上大课进行启蒙教育，提高了妇女的觉悟和锻炼了参加社会实践能力。她给矿山群众运动中的妇女骨干二十多人安排了工作，从此，穆棱矿破天荒的有了第一批中国妇女在矿山井上、井下的各种工作岗位上劳动。破除了妇女不能在井口，特别是不能下井劳动的封建陋习。

陈慕华同志还在穆棱矿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使煤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正确轨道，全面发展生产，建设新矿山，支援解放战争，奠定了良好基础。陈慕华作风朴实、泼辣、平易近人，给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陈慕华经常到各井区参加劳动，有时她夜间八、九点钟或早晨三、四点钟去岭后三井和工人一同劳动推车翻车，工人关切地说：“你再来我们就不干了。”她的行动受到全矿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高度赞扬和好评。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钟二位同志转哈工作，在调哈离矿时，全矿职工群众一千多人自动组织起来送行，机械科的秧歌队，一直从矿里送到车站，当时矿里还准备了马车（是当时交通乘坐最好的双人乘马车），但是陈、钟二人不坐车，和同志们一起走到车站，矿总工会还为他们筹备了一些路费，他们一分钱没要，而是把钱交给了两个学校做为办学经费，当时很多同志流着眼泪，向令人尊敬的陈、钟二位领导人依依惜别。

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的回忆

薛文轩

1948年春，我在呼兰县城关区委主抓工运工作。一天县委通知我和区委书记高毅同志去哈尔滨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当时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到哈尔滨我俩来到陈云同志住地。门卫通报后，不一会，陈云同志就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了。陈云同志非常热情，他拉着我们的手走进了他的客厅。

当时陈云同志亲切的让我们坐下，并说不要急于谈工作，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可我们知道领导同志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顺乎自然的汇报起工作情况了，这时陈云同志说：我今天想侧重了解下小城市的工作情况。当时呼兰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恢复战后创伤，恢复生产，组建工会，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热火朝天的参加生产，用我们生产的产品有力的支援前线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时陈云同志在我们汇报中一再插说：你们不要受题目的拘束，可以谈的随便些。中央领导热情诚恳的态度，使我们之间很融洽，感情逐渐接近了，真的不感到拘束，时间过的也真快。到了中午了，陈云同志一定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还在想那能随便在中央领导同志家吃饭呢？我们一定要走，陈云同志再三挽留，推让之时，饭菜已端上来了，就这样和陈云同志一起用了午餐，在用餐中，陈云同志说：你们年轻而且又是工人出身，多吃一点、一定要吃饱，我们也真的象在家一样吃起来了。饭后我们和陈云同志依依告别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我们一直暖在心里，虽然时隔四十年了，但是陈云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情景还一直记在我们心里。真使人感动。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难以忘怀的毕勇

李 丰 堂

每当我捧读《鸡西党史通讯》刊载的《爸爸，我给您交作业来了》的回忆文章，心头涌起阵阵热浪，老县长毕勇的身影时时浮动在我的眼前。毕县长！我忘不了您呵！几个月来，老同志遇到一起就议论毕勇生前的事迹，在路上，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毕勇的形象又活动在人们的记忆中。看来，做为党的负责干部的形象，毕勇同志已经深深印在鸡西人民心里。

毕勇是1952年10月来鸡西的，开始是代理县长，后来开县人民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县长，并兼县委副书记。1956年12月撤县建市时，到省委中级党校学习。毕勇来鸡西的时候，我正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上党校学习时，我在初级党校学习，可以说是“同学”。学习结束后，毕勇任副市长，分管农业工作，我又多半在农业口工作。做为他的下级，我们在工作上经常接触。二十多年的交往，可以说达到了相知的程度。到今年6月份，他离开我们也满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毕勇的一言一行，永远在激励着我。每当不正之风如潮水涌来的时候，每当自己对“能人”有些羡慕的时候，毕勇的身影油然而生。是他给了我抵制不正之风的勇气，是他催我自新，永远前进。这几个月来，老同志的议论，我的回忆，毕勇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往事历历在目，毕勇那亲切的话语萦绕在身边，这些，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但是，我还是要拿起这只笨拙的笔，写下我的怀念，为了毕

勇和毕勇那样的同志，为了我的同龄人，为了下一代……

简朴的婚礼 朴素的生活

毕勇到鸡西工作后，长期住在办公室里过独身生活。经县妇联主任赵淑范（现在大连医学院工作）和县扫盲办公室赵福林（现已离休）二同志介绍，同于桂琴结为夫妻。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一简朴的结婚典礼。一天晚饭后，同志们把县工会一个简陋的会议室简单布置了一下。桌上摆几盘瓜子、糖块。参加婚礼的客人来到后，主持人讲话，宣布婚礼开始。首先请新郎、新娘讲话，他们二人简单谈了恋爱经过。表示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干好革命工作。大家也纷纷发言，说些祝福的话。最后主持人宣布婚礼结束，祝愿他们二人白头偕老。同志们把一对新人拥入洞房。洞房里摆设极为平常，既没有箱子、柜，也没有大包小裹。没有多少新婚气氛。女同志把于桂琴的铺盖从独身宿舍搬来，我们男同志把毕勇的被子拿来。都是旧的，毕勇的被子还是部队发的，上边缀着几块补丁，但拆洗得很干净。二人也没有特意打扮，穿的也是平常衣服。说到住房，本应结婚之前就准备好，可 he 让给了别的同志。夫妻长期分居。一直到生第一个孩子时，还没有分到房子，暂时住在机关腾出的十几平方米办公室里，即鸡冠区政府楼一楼里边。

毕勇的家庭生活开始了。直到他去世前，他家也没有什么象样的摆设。虽然他很爱听新闻广播，家里却连个半导体、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有一次我到他家请示工作，发现他手拿电话听筒，耳朵紧贴在上边，全神贯注地在听什么。我问他：“毕市长，你干啥呢？”他神秘地一指听筒：“新闻广播。”并示意我先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放下耳机，大概是听完了广播。我不以为然地说：“你就买台收音机呗，熊猫牌和红星牌的都挺好，

质量都不错。再说，商店也有卖的。”他说：“电话耳机的串音也能听到。孩子还小，正在念书。买收音机会影响他们学习。以后再说吧。”就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家也没有收音机。

从他当县长到当副市长，没见他穿什么高级呢毛料，常见的是布制的中山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用黄炮药染成的上衣。每年都穿几回。不知他为什么这样爱惜这件衣服。记得1962年秋天，他在郊区工委（地址在现鸡冠区政府）开会，结束时已五点多钟了，外面正下大雨。许多同志没有雨具，在屋里等待雨停再走。毕勇急着要走。大家劝他：“毕市长，等雨小些再走吧！”他看看天说道：“啥时能小呵，晚间还有一个电话会议，你们等一等吧，我先走了。”说着，他挽起裤腿，将那件黄上衣脱下来，精心叠成一个小卷，小心翼翼地搂在怀里，猫腰就往家跑。过了不久，我指着这件上衣对毕勇同志说：“毕市长，你这件黄上衣每年穿几次，这么些年了，咋还这么‘金贵’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件上衣还是打仗时穿过的，它不但让我时时回忆战争年代，还使孩子们受到教育呵！”确实，他离开人间二十多年了，他的四个孩子一个个都相继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个个忠厚老实，艰苦朴素。据我所知，他的大儿子、大女儿结婚都是从简办理的。

苞米面糊涂与肉禽蛋

由于“大跃进”影响，加上1960年遇到自然灾害，人人填不饱肚子。做为副市长，他也和人们一样同甘共苦，渡过灾荒。一次，我陪毕勇去畜牧场检查猪禽大批死亡原因和组织代食品加工生产。检查之后，畜牧场准备了饭菜，硬留我们吃完饭走。毕勇百般推脱，我们一起步行回家。到了他家门口，他非逼我到他家喝酒、吃饭不可。没办法，我随他进屋，他爱人于桂琴说：“就

剩一碗苞米面糊涂了，在锅里热着，你俩先喝点酒吧。”毕勇说：“那就先喝点酒吧。”那酒是什么样的酒呢？就是当时酿造的又辣又苦的柞树叶子酒，（柞树叶子是不会产生酒的，主要是加入少量糠麸才产生酒的成分，目地是为增多畜饲料）菜是白菜根腌制的咸菜。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苞米面糊涂端来了，他的大女儿小莉，当时只有五、六岁吧，眼巴巴地盯着这碗多菜少面的糊涂粥。见到这情景，老毕赶紧说：“小莉呀，这碗粥给叔叔吃吧，叔叔累一天了。”小莉很乖，含泪说：“叔叔吃、叔叔吃吧，我不饿。”说着还腆了腆肚皮，仿佛刚才吃了山珍海味一般。这时，我才喝了一两多酒，心情很激动，对孩子说：“叔叔喝酒肚子就不饿了，还是让小莉和爸爸吃吧！”说着，我推脱家里有事，赶紧抽身回家了。大家都知道，毕勇家里人口多，粮不够吃，就想办法帮助接济一点。我有时排队买点豆腐渣，就分给他家一些，聊以充饥。

读者同志，说来您大概不会相信。做为一名主管农牧业的副市长，他家里人，甚至他本人竟然食不饱腹，您大概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吧？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毕勇，做为党的领导干部，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称得上真正的人民公仆。他不仅不以权谋私，而且对当时出现的不正之风能够自觉抵制。1960年，我在市畜牧渔业局负责秘书、财务两摊工作。畜牧场出于对主管领导的关怀，趁毕勇不在家时，送去白条鸡、鸭、蛋等副食品。送的人常常是硬往里闯，不管他家人收不收，放下就走。毕勇回家发现后，立即送到畜牧局，交给我，一再叮嘱要赶紧送回畜牧场。他诚恳地说：“千万不要让场子这样做啦。人民群众都在吃不饱肚子，我怎么能特殊呢？如果我们都这样做，不去关心人民疾苦，那人民群众怎么能拥护我们呢？”在我们局党组会议上，他就这个问题又做了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共产党员、国家干

部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要同人民群众一起战胜困难，度过荒年，决不能接受或索取畜牧场的物品。……”还有一次，在这年春节来临时，畜牧场的领导有心给主管市长送些肉、蛋、鸡，但又不敢往家送，怕再给退回来，还要受批评。于是到局里请示，打算以畜牧局的名义给所有市领导都送一份。毕勇知道后当即拒绝了这一主张。

毕勇这种严格要求自己、要求下级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每当不正之风袭来时，自己产生过错误想法，一想起毕勇的话，我就感到脸上发烧，暗暗叮咛自己，起码要“洁身自好”，从自己做起。1965年春季，报上宣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事迹时，我已到劳动局工作。在党组对照检查时，我想，毕市长对革命工作的事业心多么象焦裕禄呵。于是，我决心远学焦裕禄，近学毕勇。

一饭一菜足矣

和毕勇在一起工作过的各级干部或接待过毕勇的农民同志，都知道他不讲吃、不讲喝。他曾对郊区工委的干部讲：“我们下农村，到基层工作，要把党的传统作风带下去，不要讲吃讲喝，要踏踏实实的工作，真正为群众、为基层解决问题。如果讲吃讲喝，长此已往，要把作风搞坏的。要改善生活，那就在家里自己做……

毕勇同志不但教育干部这样做，自己也率先垂范做到。凡是同他一起下过基层工作的同志至今仍然赞扬他这种作风。当初下基层时，有些单位在食堂准备了两个菜，他总是把其中一个菜端到一边，并告诉他们只准做一个菜，然后按照规定付足钱和粮票。我和他下基层遇到这类问题时，总感到既然人家已经准备好了，不吃不好意思，我们吃了领导不吃，同样不是那么回事。所

以，我对他说：“既然准备了，那就得吃下去，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做就行了。”他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呢？这次吃了，到别的单位也照此办理，那就杜绝不了啦。”果真如此，再回到这些单位检查工作时，都是一饭一菜了。

对同志情同手足

毕勇对待同志平易近人，无论级别高低，一视同仁。搞农村工作的同志深有体会。他们说：“和毕勇共事，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你做出成绩他不埋没，有了缺点或错误，他严肃批评，诚恳帮助。你若患病，他就千方百计抽出时间来探望你，安慰你。你遇到什么困难，他会尽量帮助你解决。”因此，使得郊区工委的广大农村干部工作都很安心，很努力。

1960年春节前夕，毕勇带领我们走访农牧、蔬菜等场站。了解到城子河蔬菜示范场的干部和工人没有肉过年。看到这情况，他心里很难过。决心让这个场的广大职工和家属过好这个灾年春节。他亲自到畜牧渔业局，派我到市直属的大同畜牧场，我和畜牧场的负责人在瘦弱不堪的猪群里挑了老半天，最后才选出一头勉强可以吃的老母猪。然后，由车库康殿举师傅开车，我们在年三十把猪送到示范场，广大职工和家属热泪盈眶，感谢党的关怀，使他们在灾年春节仍能吃上饺子。

1957年建市后，毕勇到省中级党校学习，我也到初级党校学习。两校相距不到一华里左右，每逢休息时，我们相邀，聚在一起，或者畅谈见闻，讨论问题，或者到校园里散步。这一年流行性感冒较严重，一些大专院校几乎停了课，一个星期日，我们几个人去散步，走得较远。我感到很累，浑身酸疼，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赶紧说：“我得回去，浑身不得劲。”毕勇立即说：“咱们叫他回去吧看样子是有些不舒服。”回校后，我就卧床不起

了。医生诊断是流行性感冒，被送到隔离室治疗。第二天大清早，毕勇就来到初级党校看望我。同室学员把他领到病房，我心里一热，差点掉出泪来，埋怨他说：“一大早你来干啥？”他说：“你昨天说不舒服，我放心不下，怕你得病，来看看，果然……”我不以为然地说：“没事，你回去吧，别把你也传染上。”他说：“不要紧。你要服从医生治疗，不要着急，功课拉下，我们帮你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他才回去。

在哈尔滨同修江堤

每逢公出到哈尔滨，漫步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坐在江畔公园的长椅上小息时，看着熙熙攘攘的游人，望着雄伟壮丽的防洪纪念塔，很自然地想起1957年夏天和党校学员一起修江堤的情景。

1957年夏天，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哈尔滨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包括在哈大专院校的师生员工抢修江堤，保护省城，我们中、初级党校的学员也都参加了修堤劳动。每天披着霞光乘车到江堤奋战，下午回校休息。我和鸡西几个学员到中级党校看望毕勇。刚走到校门口，就看到他在校园里一拐一拐地在散步。一个同学惊讶地说：“毕市长修堤受伤了。”我说：“可能是那条战畜受伤的腿又累犯了。”见面后，我们问他身体怎么样？他笑着说：“没问题。”那个同学指着他的腿问：“你这腿……”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老伤，小事一段。”接着，他询问起我校修堤情况来。我说：“我们已干了两天，再干三天就能提前完成任务。”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再干一天也可以提前完成任务。”大家纷纷讲起修堤见闻来。有的说：“咱们党校学员真能干，相邻单位的同志还提出向我们学习呢！”有的提到，党校学员修堤的拼命精神感动了一位卖冰棍的老大爷，他说：“党校学员不愧是党员，干活一个赛一个，象小老虎似的，没一个偷懒的。”

还有人感慨地说：“共产党员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呵！”毕勇说：“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得这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相信党，跟党走呵！”接着他用幽默的口吻说：“别小看我们这伙鸡西学员，我们代表鸡西几十万人民，在这里为保卫哈尔滨，保卫这个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战斗。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漫步在松花江大堤上，想起现在劳动的情景，不是也挺有意思吗？”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漫步在江畔大道上，我就想到，这里边也有我们鸡西人的血汗；每当我仰望防洪纪念碑那一组防洪人群雕塑时，我隐隐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鸡西人的代表。

实践与文凭

修完江堤后，我们又返校学习。一个休息的日子，我到毕勇那里闲谈。谈话中透露我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想法。告诉他，我已向组织部递交了报告。他听了以后劝我说：“你上大学深造，学个专业，我不反对。可是你想呵，你一走四、五年，国家给你开支，你又离开工作实践。毕业后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还能对党做多少年工作？再说，咱们建市不久，在各方面都缺少干部的情况下，组织上还送我们进党校脱产学习，不知有多少工作等我们做呵！”听到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回到宿舍，一连好几天都在反来复去考虑这件事：“我才二十多岁，还年轻，确实应该上大学深造，回来不是对党的贡献更大吗？”又一想毕勇同志的谈话，家里确实人手少，建市以后缺少干部，再说业余时间也可以学习嘛！于是，我毅然决定收回上大学的申请报告。在党校结业后，我愉快地回到了工作岗位。在工作中，我努力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同时，我又在市直机关业大文史班学习。六年来，起早贪晚，刻

苦钻研，经考试，六科成绩合格，达到了大学程度，适应了工作学习的需要。若不是“文革”开始，中断了学习，我还想学习别的专业呢。

这段经历证明毕勇跟我的谈话是对的。前个时期社会上掀起一股“文凭热”，忽视工作实践的学习，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使一些人拿到了文凭，却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修大通沟水库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民群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热情鼓舞着毕勇。他带领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走遍大、小通沟的山山水水，村村屯屯，调查水利资源和生产、生活用水情况。调查结果认为应该在大通沟修座水库，可以解决这一地区的用水问题。毕勇向市委主管书记刘文昭做了汇报。经过研究，市委很快批准修建大通沟水库的计划，并成立了水库修建指挥部，调集了千军万马投入战斗。

原畜牧局局长张富全回忆说：“在修建大通沟水库的日子里，我和毕勇工作一段。有一天，毕勇、我和于源涛三个人到滴道开会，不知道他听谁说的，水库建设急需一箱钉子。当时，又找不到车往回捎。怎么办？毕勇决定我们三个人扛去回，办完事从滴道出发时天就黑了。因急于赶路，都没有吃晚饭。一箱钉子足有五十多华斤重，我们三个人轮班扛，累了就歇一会儿。就这样，我们扛着箱子，翻越两座山，徒步40多华里，天亮时才赶回水库工地。大家又累又饿又困。毕勇说：‘赶紧到伙房搞点饭吃吧！’又告诉我们不要惊动炊事员，有现成的吃点就行。于源涛到厨房一看还有点剩米饭，柜厨里还有鸡蛋，回来说：‘咱们来个蛋炒饭吧！’毕勇说：‘鸡蛋不能动。做点面片汤喝吧，又解渴，又

解饿’。饭后，我眯了一觉，睁眼一看，毕勇早已到工地上去了。”

大通沟水库是我市最早兴建的水库之一，由于组织的好，人民群众干劲很足，只用了七个月就建成了。水库建成后，不但放养了许多种鱼类，还供给附近煤矿的生产用水，水库下游还开垦了千亩水田，农民们吃上了喷香的大米饭。现在那里的老百姓仍然怀念毕勇，说：“毕市长为我们办了件好事。”

回忆至此，张富全深情地说：“每当我去大通沟，走在水库大坝上的时候，每当和同志们谈起大同水库时，自然会想起毕勇，想起和他一起修大通沟水库的日日夜夜。”

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

毕勇于1952年来鸡西，从县长到副市长，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一直主管农业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干部无不为其的深入细致、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所感动。机关里文件很多，不知什么时候兴起的圈阅风，使负责文秘的同志或报告单位不知所以。每看到红头文件上划满的圆圈，我自然想起毕勇批阅文件的情景。凡经他手批阅的文件，都签得很详细。比如对下属单位的请示报告怎么处理，采取的措施，完成时间，都批得很具体。然后交给主管部门去办。事后，还要亲自催办结果。有一次，要向上级汇报畜牧业发展情况，毕勇坐在办公室里同我们一起研究提纲，核对数字，半夜才把草稿弄出来，我们整理草稿时，他还坐在那里修改。直到天快亮时，在大家一再催促下，才回去休息。还记得在“大跃进”年代，市矿合一时，工作多面且杂乱，我们几个同志在他的办公室里吃住，昼夜工作，电话铃声不断，请示汇报的人来来往往。他从不厌烦，耐心听取汇报，然后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毕勇和乡亲们

毕勇在鸡西工作的十多年间，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土地，走进了数不清的农户那低矮的草房，和他们同桌共餐，亲切交谈。晚上开完社员大会或者研究完工作后，他又钻进农民的家里，在土炕梢上打开随身携带的行李卷，躺在炕上同农民拉家常。

我们背着行李跟他下乡时，刚进村就听到此起彼伏的热情的招呼声。老农村干部称：“老县长来了。”老社员说：“毕市长来了。”和他年令相仿的人说：“老毕来了。”青年或者小孩则远远跑来，有的喊毕哥，有的叫毕叔，你拉我扯，非要毕勇住在他家不可。

“文革”期间，毕勇被迫害致死。二十多年来，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们这些老同志聚在一起，谈起前阶段个别领导同志乘小车上下班时，非常怀念跟毕勇背行李卷下乡的日子。有的说：“毕勇那样做才真正实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当谈到干部子女教育时，就称赞毕勇教育子女好，有的说：“我亲眼看到毕勇带几个孩子上街捡粪。”当然，做为那一时期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也不免带有那一时期的特点，有他的缺点或不足，甚至是失误。比如盖原县办公大楼（被报社记者称为“城皇庙”），他主动承担责任，心悦诚服地接受组织上给的处分。我认为，同毕勇那些优秀品质相比，是瑕不掩瑜的。

刚刚结束的十三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战略任务。它必将引导、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四化”而奋斗。当前，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更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我想毕勇同志这种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必将鼓舞我们为改革大业和四化建设的成功而努力奋斗。

（吴玉科整理）

鸡西戏剧界名流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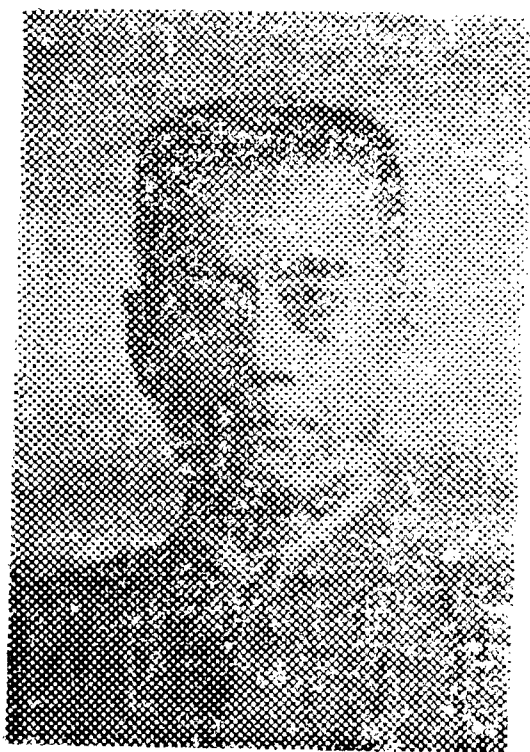
市文化局史志办

鸡西市的文艺事业从50年代起逐渐兴旺发展，许多艺术上造诣较深的京、评剧演员参加我市各戏曲团体，他们为活跃鸡西地区的文娱生活、繁荣文艺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随着日月增长，许多著名演员相继去世，为纪念他们的功绩，寄托我们对他们的怀念，特摘选了张笑侬、李云升、宋奎英、于志龙同志的传记，以饷读者。

张

笑

侬



张笑侬（1901——1960），又名张福宝，京剧演员，天津市北窑洼人，幼年家贫，十岁从师陆乐平学戏于天津，工老生，十八岁出徒，在丹桂茶园登台献艺，崭露头角，1921年赴东北各地流动演出，以擅演黑、白老生戏知名。能戏有《空城计》、《斩马谕》、《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群英会》、《借东风》等正工老生戏和《青风亭》、《九更天》、《夜审姚达》《七星灯》、《鹿台恨》、《青山英烈》等衰派老生戏。尤以演衰派老生戏见长，扮相清

癯，嗓音脆亮、宽高兼有，唱做俱佳。演唱时底气充足，喷口有力，长拖腔高而亮，给人一种直入云霄的感觉。做工如吹、甩髯口、哆嗦、抽疯等表演，独具风采。如在《七星灯》中扮演孔明归天前，头部、髯口、上下身、手足抖动长达二十余分钟，把将死亡人的痛苦，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时人称誉“张先生最会‘洒狗血’”。1964年8月在吉林省延吉市加入解放军吉林军区京剧团，转年入哈尔滨京剧团。1956年参加鸡西市京剧团，技艺益深。特别对所饰人物的刻画，更重内在神韵。如在打炮戏《夜审姚达》中扮演的姚达，演得形神兼备，情绪饱满，行腔吐字激昂清脆。在“夜审”一场中，仅是一个〔西皮原板〕的下半句接唱“老太太的孙孙哪！”竟能赢得台下爆发出炸窝好。

1958年张笑依被任命为鸡西市京剧团副团长，并被选为鸡西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艺事不辍，仍忘情于舞台。虽近花甲之年，亦不让当年。如演《青山英烈》中的老仆，在水吊鱼的圆场中，接连做的跪步、蹉步、抡背、吊毛等动作，利落干净，节奏明快，半个圆场不到，观众已掌声四起。

张笑依性素幽默、乐观，喜与青年演员谈笑。每遇演出，青年演员时而打趣问他：“张团长，今儿戏几个好？”他答道：“三好！”待戏演完，果然三个好。其演剧经验虽然丰富，但每有演出，总要在演出前闭目静卧，将全戏默习一遍，决不因是熟戏而掉以轻心。上台后，全神贯注倾力于所饰的角色，每一个动作都表演得实实在在，毫不松懈。每次演出他总是坚持：“观众不叫好决不收兵”。

1960年10月，张笑依病逝于鸡西市，时年60岁。

李

云

升



李云升（1899——1967），京剧演员，河北省宁河县人。自幼家贫，生母早丧。十二岁乞讨为生，十三岁，父亲以三十元价卖给张俊亭为手把徒弟，习工老生。在张俊亭严苛训教下，苦练不辍。两年徒满，登台为师傅挣钱效力。其拿手戏为《辕门斩子》、《斩马谕》、《斩黄袍》、《托兆碰碑》等。后因倒嗓，改工长靠短打武生，以演《挑滑车》、《长坂坡》、《白水滩》《三岔口》、《武松》

等戏名重一时。1925年赴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克）演出，曾受苏联电影界邀请，拍摄京剧舞台片《战宛城》。1932年，应苏联国际电影公司之聘，赴莫斯科参加京剧《长坂坡》、《东方民主》等影片拍摄工作。是我国早期在国际上拍摄电影的戏曲演员。1934年巡回演出于烟台、青岛、潍坊、济南、上海、南京等地，常演张飞、霸王等花脸角色的戏，颇受时人的欢迎。1948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军区评剧团，翌年因病退伍，落脚于黑龙江，致力于课徒传艺。1961年参加鸡西市京剧团，任专职教师，培养青年戏曲演员，为青少年队排演《杨排风》、《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十余出传统戏。亲授《哭祖庙》、《受禅台》等数出唱做并重传统剧目。为剧团艺术建设做出较大贡献。1967年10月因高血压病，逝世于鸡西市，时年68岁。

宋

奎

英

宋奎英，河北省临榆县山海关人。1902年生人，家境贫寒。1909年七岁时在天津广和戏园学戏。1917年在唐山静仙茶园登台献艺。从此，直到1945年，他的近三十年的舞台生涯是在秦皇岛、山海关、锦州、承德、沈阳、抚顺等地的城镇和乡村度过的。为了养家糊口，成年累月的“为戏班的财主卖命捞钱，为军伐、官僚、汉奸、特务和资本家们开心取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宋奎英先生对旧社会控诉的话）。

1945年日寇投降，广大受压迫，受凌辱的艺人彻底翻身解放。宋奎英先生也从南满来到黑龙江省依兰、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等地演出，曾和著名京剧演员李鑫亭、李晓春、花砚云、吴蕊兰、刘瑞轩、陆凤山等长期合作。正当壮年的宋奎英心情舒畅，精力旺盛的为广大工农兵献艺，他衷心拥护共产党，赞成党的戏曲改革政策。在佳木斯任人民剧院院长时，为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和为艺人谋福利，和李鑫亭同志发起组织艺人协会。一九四九年做为艺人代表，出席了东北文代会。

宋奎英先生于1955年参加鸡西市京剧团，1960年担任业务副团长工作，长期致力于剧团的艺术发展和人材培养，为建设鸡西市京剧团不遗余力的工作。

宋奎英先生有很高深的术艺造诣。他幼时勤学苦练，基本功扎实，加之天资聪颖因而会戏极多，戏路很广。擅演白胡老生黑、红净和架子花脸。他在传统戏《走麦城》、《水淹七军》中扮演的关羽；《砸鸾驾》、《铡包勉》中扮演的包拯；《长坂坡》、《芦花荡》中的张飞，《探地穴》、《金鞭记》中的寇准，《黑

旋风李逵》《李逵大闹东平府》中的李逵以及《徐策跑城》中的徐策，《赶韩信》中的肖何，《路遥知马力》中的路遥等角色，均以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形神兼备的表演深受内行的赞赏和观众的欢迎。他为京剧团编排的十本连台本戏《金鞭记》是其毕生的杰作。此剧结构严紧、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矛盾尖锐。剧中人物众多，行当俱全，每戏都有突出的中心事件，可独立成章。而在每本的结尾处又留下极大的悬念，做到扣人心弦抓住了观众的心理。尤其可贵的是每本戏中都有几处五音大联唱（联弹），集京剧行当生、旦、净、丑声腔之大成，板式复杂多样，转调随意自然。除京剧声腔外，还恰当的吸收了梆子腔、汉调、广东调、民间小调、昆腔等兄弟剧种的声腔，新颖奇特、别开生面，既有传统的各种声腔板式，又不拘一格地改革与创新，为京剧音乐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宋奎英先生从艺多年，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他为人谦虚厚道，很讲艺术道德。演出时忠于艺术、严肃认真，从无泡汤懈松之举。演主要角色和配角一样的认真对待，不争角色，不吃戏醋。他在艺术上对己对人都严格要求，从不马虎。

宋先生对艺术从不保守，1953年在牡丹江京剧团工作时曾任兼职教师，培养出许多学生，牡市京剧团主演徐方候就受教过宋先生门下。在鸡西、密山等地培养过更多的学生，如薛奎英（武群）、杨树田、孟省石（鸡西评剧团导演）陶秀本（抚顺市京剧团副团长均拜宋先生为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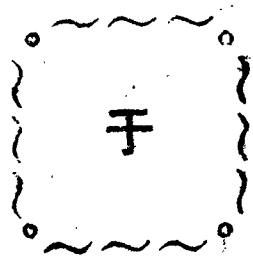
宋奎英先生的八个子女现有七个人从事文艺工作。他的大女儿宋丽芳系中国戏校毕业生，曾在梅兰芳先生拍摄的电影《洛神》中扮演过主要仙女，现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二女宋桂兰、三女宋桂芳、长子宋志伟、三子宋志辉、小女宋桂云、二子宋志远都从事文艺工作。宋先生把一生献给京剧事业，还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文艺事业的接班人，称得起戏曲世家。

宋奎英先生艺术上有求新、探索的精神。他很喜欢演现代戏，在《钢铁老人》、《柯山红日》、《海防战士》等现代戏中都扮演主要角色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由于他思想进步、勇于进取、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因而受到党的关怀和重视，从1959年起曾担任鸡西市政协常委、市人民代表、鸡西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198年9月，鸡西市文联、市文化局曾联合举办“宋奎英舞台生活七十年”的纪念活动。

宋奎英先生于1985年11月因病去世终年84岁。



1981年鸡西市文联、文化局联合举办宋奎英先生舞台生活70周年纪念活动，鸡西市委书记潘志湛同志与宋先生亲切会见。



鸡西市评剧团原副团长、市政协委员于志龙同志生前对我市评剧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编新戏、导新戏、培养青年演员无不全力以赴，成绩斐然，是我市文艺战线上的骨干力量，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于志龙同志原籍河北省通县，1930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是梨园世家。其父于畅亭唱梆子靠架老生，母亲于金翠工刀

马花旦，长靠短打无所不能，于志龙从小受到父母的熏陶、对戏曲极其热爱，自幼即练基本功。12岁从师父郭庆章学戏，同时受到著名评剧演员李宝顺、李银顺的教导，技艺大进。能演评剧小生、老生，又对京剧产生兴趣，学了许多京剧武生戏。因此他锻炼的、能文能武，能主能次，无戏不会，无戏不演，成为戏曲界的大拿，堪称全材演员。1975年以前在辽宁省沈阳、鞍山、营口、抚顺和乌兰浩特、海拉尔，北安等大小城市登台献艺。他的大姐李艳琴、二姐于秋棠、妹妹于香霞，也都是有成就的戏曲演员，爱人于云霞是评剧主要演员。因此盖县于家班名噪一时。

1956年后，全家来鸡西市评剧团参加演出，旋即成为该团的基本演员，担任了业务秘书、副团长。后因患严重的咯血症除必要时上台演戏外，重点从事编导和培养二代的工作。六十年代，于志龙同志编剧并导演的评剧《蒸骨三验》、《十梅花》、《打爪

园》和反映煤矿题材的《小班循环》以及由他导演的大型评剧《杨门女将》、《江姐》、《金沙江畔》等剧目，深受鸡西地区广大观众的欢迎，至今有些老观众仍津津乐道，使鸡西评剧团在省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于志龙同志对鸡西市评剧团的建设发展真正地做到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其热爱戏曲工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于志龙同志虽是演员出身，但能刻苦学习文化，钻研戏剧理论，热爱党的文艺事业，因而能创作、改编了许多成功的剧作、兼编、导、演于一身，为戏曲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人开朗，乐观，说起话来幽默诙谐引起人们哈哈大笑，虽然代着严重的疾病和“十年动乱”时受到迫害摧残，仍对生活充满信心保持乐观情绪，坚持笔耕，关心评剧事业的前途。

1985年4月10日，年仅55岁的于志龙同志因病久治不愈而辞世，实为我市戏曲事业的一大损失。

勃利煤田是如何发现的

——记鸡冠区政协委员、一〇八勘探队

高级工程师周其道同志

吴可保

建国以后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大专院校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地质专业科技人才，陆续投入地质勘探第一线，新大学生们从祖国各地奔赴边疆煤城鸡西，他们胸怀壮志，不怕艰苦，甘愿为革命毕生投身地质勘探事业，踏遍千山寻宝藏，不图享受，不计报酬，勇于吃苦，争挑重担，敢于突破禁区，标新立异，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们节风沐雨，一把铁锤，一个背包，徒步跋涉边疆的山山水水，在深山老林里做出了多少鲜为人知的重大贡献，赢得了今天矿山的繁荣、祖国的富强。回首往事，他们当中有的业已两鬓染霜，有的已经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了。人们创造了历史。人民将怀念历史。

艰 苦 的 任 务

1956年正当鸡西矿区内部大规模勘探新井区的时候，中央发出了各地区广泛找煤的指示，此时鸡西煤田经过解放后几年的地质勘探，已基本上窥知了它的全貌，对沉积环境、含煤建造、盆地范围、构造、层序、岩性特征等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进一步开辟工作，就要以鸡西煤田为基地向牡丹江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发展，这就需要组成一支较强的地质普查大队，进行地质填图工作，鸡西一〇八队普查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组建起来的。这个队伍的骨干技术力量，都是这些二十上下岁的年青

大学生，说是“这些”实际也只有那么三五个，他们人单势孤，才出校门不久，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可是建国当时我们只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是要用革命加拚命的大无畏精神去闯新路，变不可能为可能。

当年五月各组分头出发了，分片包干。周其道同志这个组奔赴鸡西以西牡丹江以东地区。名义上是组，实际大部时间都是单人活动，等到发现大目标时才能小组集中。当时群众报矿热的情很高，所以首先要去各处验证矿点，查看地层。56年我们还很穷，没有条件给地质普查队员配备交通工具，他们只能靠两条腿，爬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钻废坑下老窑，走啊走，看啊看，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山泉，硬是在荒山老林里走了两个月，考查了林口、青山、光义等大片地区和矿点，但没有发现较大型的有希望的煤产地，疲劳、失望加带满身征尘，回队汇报。得到队领导的指示是：不要泄气，继续扩大踏查范围，验证所有的报矿信息，并决定向勃利县进军。领导的决心，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七月中旬周其道同志马不停蹄，赶赴了勃利。

面对前人的结论

勃利的矿点，发现较早，已有土窑开采，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大肆勘探掠夺鸡西煤炭资源的同时，也向勃利伸出了罪恶的双手。他们派遣一名叫国分坚的地质工作人员，对勃利煤田进行过地质勘探，投放了山地工程槽探和井探，并撰写出《勃利煤田地质调查报告》，此项文献资料和图纸，在东北解放时为我方所查获，该调查报告对勃利煤田的结论是：经调查和槽井探证实，勃利煤田因储量甚少，仅适宜地方小煤窑开采，无太大的工业价值。寥寥数语，作了定性宣判。伪满时期在东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一些日本人当中，颇有几个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如森田

义人等都曾发表过权威性的学术论著，在地质技术界有一定的影响，许多技术论点都曾为我们当时煤田勘探所引用。面对前人的结论，年轻的地质普查队员们，不能不有所顾虑，没有确凿的证据，想推翻前人的结论是轻率的，相信吧，那就是解除思想武装，就此却步，承认人家的结论。不相信吧，这又是一个技术比我们发达的外国专家的结论。何去何从，考验着青年大学生的意志。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

日本人的技术再高明，毕竟是以侵略者的身份盘居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随时都怀着被复仇袭击的恐惧心理，这就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他们武力控制的范围内施工探索，推理判断，不敢冒险深入腹地，做全面考察，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威胁下，他们也会敷衍塞，苟且偷安，另外也不无滥竽充数的技术骗子。

而我们则是遨游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协助，有一颗火热求实的信心，不经实地验证就不应轻信任何好的或坏的结论。号称第二抚顺的光义煤田的勘探失败，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地质队员们怀着深入探索，认真考证的决心出发了，奔向已被判定无望的勃利。

地方政府的热忱支持

七月中旬，骄阳似火，伏天的暑热，蒸得人汗流夹背，在勃利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室里，一位姓车的女县长，热情接待了周其道同志，她代表地方政府热烈欢迎地质队员来县考察，并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她富有军人风度，办事利落，朴实无华，她爽快的承诺，只要是地质调查队需要的，要物给物、用人给人，当即指示县工业科具体负责协助工作，并特意物色了一位懂日语的中学老师，帮助翻译了国分坚的日文地质报告。据县工业科介绍，

县内仅有的一座小型煤矿，座落在距县城五十余里的缸窑沟，考察就要从这里开始。七月下旬在政府的安排下，乘煤矿办事处的运货马车顺利赶到缸窑沟，同样受到煤矿领导的热情接待，并特意给派出一名转业干部老郭，佩带上枪支，既当向导又负责保卫安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协助，给地质队员很大的鼓舞，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的进行考察工作，在十几天的行程中就出了大成果，获得了振奋人心的地质信息。当七月末周其道同志回到勃利县城，将此行观察收获向车县长作详细汇报，说明勃利煤田发展前途和重大经济价值时，她高兴得一面再三感谢地质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一面迫不及待的向县委高书记报告喜讯，并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特大发现。她反复讯问了今后的勘探打算，答应所需山地工程的施工人力，县政府可以按征调民工的方式保证劳动力的供应，一切生活后勤，地方将大力支援，希望地质队赶快开进勃利，到县里安营扎寨，开展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地方政府情深意切的嘱托，暖人肺腑，给地质队员增添了无限的精神力量和由衷的欣慰。三十年后，每当重游七台河市，攀上桃山之巔，环眺这座兴旺发达现代化煤城的景物时，不能不感慨万千，昔日的荒山秃岭，田舍茅屋，羊肠小道，仍依稀可辨，忘不了食宿过的人家，款待过我们的人民群众，又怎能不深情怀念当年老一辈革命者的奕奕风采。创业维艰，红花硕果，激发出一个地质队员的光荣感。

重 大 发 现

在缸窑沟，周其道同志深入矿坑了解煤层及构造情况，并在煤矿附近，草绘了地质图，断定该矿所采煤层确属穆棱组，与国分坚所定相同。然后徒步去七台河附近填图，先后踏勘了安乐、青龙山、合作、小五站、大六站等地。一面观测自然露头，一面向

村民访问，终于在七台河村东北靠倭肯河南岸一块大豆地头的冲沟内，发现了一层厚约一米的煤层。这煤层的层位，原国分坚推定为白垩纪以上的煤层，因而断定此煤田无大希望。周其道同志没有轻轻放过，对这层煤从岩性和构造特征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观测，几年来在鸡西煤田调查的实践经验，增长了他敏锐的观察判断力和智慧，反复推敲之后，他果断的判定：这不是白垩纪地层，而是鸡西组地层。亦即现在所通称的城子河组煤层。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使地层排列顺序，正好翻了一个倒转，白垩纪是整个含煤建造的上部，确实没有什么希望，而鸡西组却位于整个含煤建造的下部，是最有经济价值的煤层群。现在上有穆棱组，下有鸡西组，说明这一沉积建造的层序是完整的。因此这个沉积盆地范围决不会小。这一惊人的发现，乐得他几乎蹦了起来，他挥臂高呼，我找到啦！找到了铁的证据！国分坚是错误的！他错判了一块大煤田的死刑！静静的山林为他的欢呼所震荡，一刹时山鸣谷应，鸟儿也惊得扑拉拉飞向天空，同行的老郭一时莫名其妙——这个年青人发什么神经？茫茫旷野难以装下年青勘探队员的胜利喜悦。他兴奋万分，觉得自己又为祖国拿出了新的奉献。是啊！这一瞬间的喜悦，才是勘探队员一生中真正的喜悦，这是事业的成就，理论和实践的升华，这是扭转乾坤的一瞬，价值连城的一瞬，这一瞬来之不易，很多专业人员毕生工作还品尝不到这样的一瞬，这一瞬是突发的，神奇般的出现，但又来得那么自然，入情入理。同是一块露头，千百年死板板的出露在那里，风吹雨打，任凭溪流冲刷，无声无息。有多少人踏身而过，未予理睬，又有多少地质专业工作者，发现了它，但看了又放下，没有触及灵感，未加重视。而他：一位新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却能拨云驱雾，还其本来面目，象一棵出水的明珠，立现光芒。这一瞬是何等的宝贵，又是何等的短暂，因为他将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跋涉，新的寻觅和探索。当即决定顺藤摸瓜，沿此煤层走向往

东追踪其延展情况。人逢喜事精神爽，过分的激动当夜几乎是难以成眠。第二天凌晨一直向东，一路经八道岗过桃山；至茄子河，沿途观测自然露头，夜晚借宿在林业站的土炕上，没有行李，只得头枕背包，合衣酣睡，疲劳占据了整个肉体。次日观测了村东头河岸阶地剖面和当地居民的挖煤旧坑，又见到了三层可采煤层，其中一层原达八米，根据煤层结构，岩性特征，均认定为鸡西组煤层。第二站住八部落，时值雨季，河床涨水，他们赤足涉水，沿河岸走了三十余里，到达铁山包下，把沿途见到的含砾粗砂岩和泥岩等，定为桦山统。第三站住在龙湖畜牧场，观察了河东岸伪满旧槽探沟和挖煤小井的遗迹，从岩性上判定也属鸡西组。从畜牧场分别向北星、金沙两向各踏勘二十余里，了解到北星方向沿途全为冲积层所掩盖，金沙方向沿途全是桦山统，呈反复褶皱。至此勃利煤田已略窥全貌，圈出其大致范围是：西起青龙山呈北西走向至桃山向东转成北东走向，至龙湖仍是敞口，面积约为七百二十平方公里。

上述重大发现，震动了勃利和鸡西，1956年8月16日，《鸡西工人报》头版二条以《又发现一个大煤田》为题，作了如下报道：

“东北煤田第二地质局一〇八队普查队，在勃利附近发现一个大煤田。根据队员汇报，所见到的可采煤层，累计厚度在15公尺以上，沿煤系走70公里还没有见到这个煤田的边界，从现有资料看，这个煤田的可能蕴藏量将比黑龙江省内已知的最大煤田蕴藏量还要多。根据露头煤的燃烧试验和地质理论上的分析，在这个煤田里，将有大量可供炼钢用的焦煤。

目前，普查队已组织一批地质技术人员，分头出发沿着这个煤田的周围进行大面积的观测，以确定这个煤田的边界，和发现另外的新煤田。最近，他们又提出了将原有超产面积增加三倍的勘查计划。”

向勃利大进军

八月初，周其道同志返回鸡西，队领导听取了详细汇报之后，立即决定进一步勘查勃利煤田，投放山地工程槽探，计划分五个施工区，计有安乐、七台河、小五站、茄子河（桃山）、龙湖各点，并和勃利县劳动科签订了用工合同，九月初展开全面施工，定周其道为查勘负责人。七台河区由张超、宣志瑞、鲁丙坤进行；小五站区由秦玉龙、龚永兴进行；茄子河（桃山）区由刘国俊、周仁发进行；龙湖区由汪寿林、赵圣久进行；安乐区暂缓。到十一月中旬结束现场施工返回鸡西，十二月末提出了《勃利煤田查勘报告》，发现可采煤层二十余层，煤层总厚度约二十六米，获地质总储量约十亿吨。为下一步勘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查设计。

1957年3月，勃利煤田进入概查阶段。一〇八队普查队于五月初，全建制迁到七台河村，借驻乡政府后院。组织两个组由周其道和王素坤分别带领，进行勃利煤田和外围地区的全面填图工作。从五月起至十月末止，填制了十万分之一区域地质图。

1957年10月，东北煤田地质二局李健局长，专程来七台河普查队了解概查成果，为筹建新队作准备。1958年4月，二局下令从一〇八队和其他队抽调钻机设备，职工干部，并从一〇八队普查队调出一半地质技术人员，组建了七台河勘探队（即现今的二〇四队），展开大规模工业储量勘探。从此七台河煤城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向勃利大进军从56年8月查勘施工起到58年4月组建二〇四队止，前后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其行动之快，效率之高，实在是目前各种繁琐手续关卡拖拉所望尘莫及的。

结 语

勃利煤田在淹没了数十年之后，由一位年青地质队员的现地踏勘，推翻了前人的错误结论，使一棵地下明珠重现光芒。现在的七台河煤矿，已成为省内四大煤矿之一，七台河的焦煤被列为国家煤炭珍宝，实行保护开采政策。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这一段勘探过程中的历史佳话将永远流传。笔者身为勘探队的一员老兵，特记此文，敬献给毕生献身于煤田地质勘探事业的勘探队员们！

注：周其道同志现任一〇八队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鸡冠区政协委员。

风风雨雨四十年

——鸡西话剧团史话

吴述今 整理

鸡西市话剧团是黑龙江省建团较早的一个专业话剧表演团体。她是原东北煤矿工人干部学校文工团的继续，鸡西矿区东北煤矿工人干部学校校址在鸡西市恒山煤矿。该团始建于1947年8月，这是我国煤矿工人开天辟地创建的第一个工人自己的专业剧团。为了激发工人的阶级感情，推动生产，在反把头斗争中，他们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矿山泪》、还创作演出了《谁把废铁炼成钢》等大型歌、话剧，激起工人对旧社会的仇恨，增强了斗志，推动了煤炭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煤矿宣传文化战线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秋，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和东北煤炭恢复生产的需要，东北工业部将鸡西煤矿工人文工团调到沈阳，成立了东北煤矿文工团。1954年又与华北煤矿工人文工团合并组成了中国煤矿文工团。

工人文工团调走之后，矿区党委决定由党委宣传部负责重新成立鸡西矿区文艺工作团。于是在1949年6月，通过东北日报发出在社会上招聘矿区文工团演职人员的广告，从沈阳、哈尔滨两地共招了宋儒林（宋杨）、王景星（王元析）李军（赤叶）、孙蒙、周景泰（周喆、侯太、李之凡等138人，在张复同志带领下于7月10日抵达鸡西。

文工团团址临时设在鸡西工校宿舍院内（现市廿六中院内和文物站办公楼里），于7月15日宣布鸡西矿区文工团成立。矿区党

委宣传部长王珣（现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兼文工团长，由沈阳鲁艺学习回来的王勇武派来任文工团代理团长，指导员任树棠，宣传部还派吴长胜、张复等同志来团协助工作，行政关系隶属于矿区党委宣传部。7月20日调来张恩福（张贵）、赵殿财、吴述今、钱亚坤、曹春福等五名同志。他们是密山县委文工队的，毕业于合江鲁艺文艺训练班。十月鸡西县委艺工队撤消，其队员于靖、袁志勤、姜柱林等七人调来矿区文工团。此时文工团员近150人，组成了戏剧队和乐队，队长分别由时正午、王勇武（兼）担任。十月组建工会，十一月召开全团大会，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发展了第一批青年团员。

矿区文工团建立的宗旨是为政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由于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对他们的思想、业务、政治面貌都不了解，要使这些人能成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推动生产的坚强文艺队伍，实现为政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宗旨。首先开展了政治思想建设，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人生观》、《社会发展史》、《青年修养》等有关文章。集中听大课，分队组讨论，讲课人王珣、任树棠、王勇武等同志。由于实行供给制，集体住宿、集体吃饭、供吃供穿，给点零花钱，每周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生活、工作代有准军事性质，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清理出以路人、马杰、白荣楣等有政治历史和破坏行为的人，纯化了队伍，提高了革命思想，初步树立了为建设矿区、为政治、为生产、为矿工服务的理想。

组织建全了，人员思想安定了，业务活动也随之开展了起来，第一次和矿工见面的，是以王勇武为领队，吴述今为指挥的管弦乐队，参加了八月十五日在滴道矿召开的鸡西矿区第一次劳模暨职工代表大会。为迎接开国大典，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排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活报剧，建国前夕和

十月一日在“开国广场”（现在的青少年文化宫院内）举办的“营火晚会”上演出，受到普遍的欢迎。还以孙蒙、王景星、宋儒林、钱亚坤、曹素兰、路振清为主要演员排演了歌剧《钢骨铁筋》，以张贵、赵殿财、李之凡、柳宗兰、王滨艳、白庆和、侯太、叶延等人为主要演员，排演了话剧《一条皮带》、歌剧《立功》等剧目。

歌剧《钢骨铁筋》是文工团建团后，第一次到各矿巡回演出，直接为矿工服务的“开纪元”的剧目。演出是慰问形式的，一律不售票，各矿工会按坑口车间、科室单位组织观众，矿上供吃管住，自带行李，有时住招待所，多数睡台板，吃的大盘菜，不成席、不摆宴、吃得饱、睡得好、演职人员情绪高，矿工喜爱文工团，团员尊敬矿工。

十一月间，经过整顿之后，演职员仅剩70人左右，团址由街里工校宿舍搬到南山矿务局对面的两幢平房里（现矿务局俱乐部后身、矿务局机关托儿所院内）王勇武正式任团长、于靖为业务团长，芦凤兰为政治指导员。稍加修整就投入大型歌剧《刘胡兰》的生产。导演于靖，路振清饰刘胡兰，宋儒林饰徐大胡子，孙蒙饰石三海，杨文竟饰石头。管弦乐队伴奏，指挥吴述今，首席小提琴杨景春。这是建团后的第一个戏，演出很成功。五〇年三月八日受鸡西县政府邀请在街里文化院（现在工农兵剧院），为鸡西县进关干部学习班演出，剧场正上方悬挂着“慰问进关干部演出晚会”的巨幅横额，两侧配有提高阶级感情，支援新区建设的标语。看戏的观众都是进关干部，仿佛不是来看戏，像是参加一个严肃会议一样，剧前会场秩序井然，人们情态肃穆。演出中情节感染了观众，观众进入了剧情，台上台下达到了共鸣。高潮中，演员的泪水冲淡了化妆的脂粉，泣不成声，几乎不能正常表达台词。乐队边演奏边擦泪，尽管乐不成句、音色音量受到影响，不能完美的表达情感，但是观众完全被剧情所吸引，无心欣赏音乐伴奏的成功与否。观众的眼睛被泪水遮住了视线，一边擦泪一边看，有的

干脆趴在椅子背上哭，场内被一片呜咽之声所淹没。开始观众中有人带头喊口号，观众都跟着喊了，后来就没有人喊了。记得有位观众叫张吉田，在悲痛情节中他喊：“打倒蒋介石，为刘胡兰报仇”，可是近千人的大厅里，无一人响应，他急的站起来边哭边说：“你们怎么……不喊哪……呜……”。散场后人们也不愿离去，坐在座位上擦泪。演员们也把“你们怎么不喊哪”的佳话，久久流传。

五〇月十一月，周总理签发了关于朝鲜战争的外交部声明，接着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声明，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文工团排演话剧《友与敌》、《打击侵略者》等配合宣传，还组织由演员乐队、创作员参加的小队，到各矿基层单位开展“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宣传活动。这次下矿任务重，劳累、艰苦，演员的政治热情很高。他们吃在集体食堂、睡在坑口学习班、跟三班、在班前学习会上演，还要到机电、建设科等老白班的工地活动，一天除演五场戏外，还要收集超产班组和个人的先进事迹，编成快板、演唱、相声等小节目，在班前会上演出，有时演员记不住词，只好照本宣科，尽管如此，还是博得矿工和领导的欢迎。演出十分忙碌，忙起来化上妆就一天不能卸，吃不上饭就在坑口吃块面包。零点班结束演出后，就把学习班的桌子摆成大炕，不分男女、没有被褥、浑身打浑身一起滚，虽然条件困难，生活艰苦，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极高。为此，各矿都为宣传队颁发奖旗予以表扬鼓励。在此期间安置了朝鲜国家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家李哲羸夫妇的演出，他爱人是舞蹈演员，对文工团乐队的合奏能力和舞蹈事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提高团员专业素质，培养人材，提高演出质量，五〇年派时正午、景德瑞、侯英、田金祥等人去沈阳鲁艺学习戏剧、声乐、作曲、器乐等有关专业。五一年煤机厂党委宣传部长李永福调任文工团团长，于靖为付团长，王勇武调矿区党委宣传部任职。同时

又从各厂、矿业余剧团和部队转业人员中抽调了刘庆凯、牛建文、陈家祥、刁桦、王允红、宋桂荣、哈淑珍、王玉杰、律桂芳、吴永臣等充实了文工团。成立了以宋儒林、李军、周吉吉为主要创作员的创作组，调入温美富、高俊国组成舞美、灯光组。至此，经过两年多的业务建设，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体制的文艺工作团基本形成。

五一年配合三五反运动，化整为零分成若干组到各矿辅导业余剧团和开展坑口文化宣传，生产鼓动活动。部分人员组成演出小队，编创演唱、快板、独幕剧等短小节目到基层单位和有“老虎”的重点单位去进行宣传鼓动。三五反运动后，五二年秋演出大型歌剧《星星之火》，由于演员不足，矿区警察队参加了演出。演出后再次调整，人员只剩30人左右，团的建制改为队，李永福调出，时正午、张恩福、于靖为正付队长。隶属关系由矿区党委宣传部改由矿区总工会宣传部领导：这个时期活动较少，矿工看不到戏，抱怨说文工队是“白吃饱”。改队后，五二年十月八日派吴述今、金长勋、王玉杰、金顺善、朴真顺等人去北京煤矿文工团学习《跑驴》、《采茶扑蝶》、《荷花灯》等流行一时的民间舞蹈。其中《跑驴》、《采茶扑蝶》于五三年元旦团拜会上演出，不但为鸡西舞台上增添了新鲜色彩，受到了欢迎，而且这两种形式也流入了民间，直到今天，在鸡西秧歌中经常有《跑驴》、《扑蝶》的出现。

五三年六月由于靖、侯英到伊春森工局接收了伊春森工局文工团的方海清、谭占英、吕明、李玉莹、刘景和、王金成等22人来鸡西，五四年初又从虎林、密山、城子河招来赵艳君、孙希君、宫瑛、张殿仁、范学良、刘淑贤等人充实了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发展鸡西文艺事业的骨干力量。人员增多，队伍扩大，文工队又恢复了文工团的建制。第二次排演歌剧《星星之火》，于靖导演，侯英配器。满足了矿工精神文化的需求，同时走出了矿区到密

山、连珠山、八面通等地演出，摘掉了“白吃饱”的帽子。五四年由于靖导演，排练了苏联话剧《锦绣花巾》，为上演外国名剧打下了基础，创出了一条新的话剧路子。

创作组成立后，由马迅、于靖等人集体创作的话剧《红色标兵》正式演出，这是建团以后的第一个创作剧目，也是上演的第一个反映煤矿生活的话剧。五四年上演歌剧《小二黑结婚》，曾在牡丹江、桦林橡胶厂、密山等地演出，受到欢迎。五五年由宋扬创编的《地下的春天》大型话剧，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搬上了首都舞台。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演《万水千山》、《家》、《雷雨》、《秋海棠》等大型话剧，主要演员有方海清、马少信、宋桂荣、谭占英、吕明、李玉莹、刘淑贤、于靖、姜珍、孙蒙、赵艳君等人。这两年的话剧活动，为建立专业话剧表演团体奠定了良好基础，培养了骨干。

五七年二月建市后鸡西矿区文工团改为鸡西市文工团，市委派郑全厚任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工团长，张恩福、于靖分别为行政、业务副团长。分歌舞、话剧两个队，张恩福（兼）、侯英为歌舞队长，刘庆凯、高俊国为话剧队长，孙蒙任导演。五八年受矿务局委托携带《秋海棠》、《红色标兵》、《骆驼祥子》等三个戏，赴大连摩电车制造厂进行慰问演出。由矿务局办公室主任李茂勋和郑全厚团长带队，一行三十多人。由于这次南下打的“鸡西矿务局文工团话剧队”的招牌，人们认为是业余剧团不感兴趣，安排在俱乐部住下，伙食都无人过问，演员自己到车站买烧饼吃。首场演出《秋海棠》之后，轰动了全市，仅一出“秋”戏就连续上演一个多月、四十多场，市团委等群团组织和厂矿企业举办联欢会，邀请演员参加，为主要演员送纪念品，献花束、花篮，真是盛况空前，形成了“倾城竞赏《秋海棠》，街头巷尾议鸡西”，颇有“不看《秋海棠》会遗憾终生之感的狂热局面。附近市矿闻讯来人约请去演出。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在辽阳、抚

顺、阜新、本溪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历时四个多月，演出过百场，观众达12万多人次，净收入超过四万多元。这次所谓“南满”之行，确是声誉大振、名利双收。

六〇年秋，鸡西市文工团一分为二，结束了综合性文工团十二年的历史，分别成立了鸡西市歌舞团、鸡西市话剧团。歌舞团与曲艺团合并，迁往曲艺团剧场，话剧团在文工团原址，一个专业话剧表演团体在祖国边疆新兴煤矿城市正式诞生。张恩福、于靖为副团长。分团后第一个戏是周笑秋改编的话剧《八号档案》，导演于靖，主要演员：马少信、迟仁基、宫瑛、刘淑贤等人，曾演出于各区矿、佳木斯、牡丹江、密山等地，共演200多场，颇受观众赞赏，艺声显著。

六一年八月赵殿财任话剧团支部书记、团长，张恩福、于靖、刘庆凯、高俊国为副团长。第二次上演外国戏。由于靖导演的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刘庆凯饰列宁、马少信饰捷尔仁斯基、方海清饰曼诺夫斯基，受到市民的好评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六三年为提高演员表演水平和话剧艺术质量，请来电影著名演员李景波，做为艺术指导，参加方海清导演的《迎春花》的排练工作，还参加了首艺校导演王士为导演的话剧《兵临城下》的演出，扮演胡高参作了示范表演，此外，他还在《秋海棠》、《雷雨》中分别饰袁司令、鲁贵作示范演出，使演员收效很大。为了提高导演水平，六四年八月方海清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班学习。十一月三日赵殿财等二十二人，被市委抽调参加社教，到宁安县兴隆公社搞社教，方海清在社教点编导了话剧《贫下中农站起来》，并进行演出。六五年六月返团。六五年二月十四日为鸡西话剧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首任导演于靖因病逝世，现年仅三十八岁，于靖的逝世是鸡西话剧事业中一大损失。

六六年开始十年动乱，话剧团也“派性丛生、暴力横行、派仗不已”，在六十多人的团体中，竟以各种名义揪出三十多个

“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四人帮”迫害文艺工作者，远离首都的边塞煤城——鸡西，也未能幸免其难。六八年十月全市文艺战线干部都被送到正阳矿，名义上叫“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而实际却是送到井下去采煤，强迫接受变相劳动改造近四个月。到矿当天放下行李就下井，结果黄丹、周广宝两同志一下井就没有上来，牺牲于井下事故。返团后，于七〇年三月又有部分人被送到兰岭公社插队落户，其中有领导干部、主要演员十几户。方海清、迟仁基又借调到市京剧样板戏学习班、参加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排演工作，方海清导演、迟仁基为乐队指挥。由于插队下放、人员减少、艺术上一花独放、话剧形势急转直下，一个较为完整的专业话剧表演团体，不得不又招收部分歌舞演员，演奏员成立了歌舞队、话剧队，话剧团又改为综合性文工团。

尽管文艺受到摧残，人身自由得不到保证，为了发展艺术事业，话剧团在动荡的年代里仍然坚持上演了《张思德》、《刘英俊》、《夜海战歌》、《槐树庄》，和张勤同志创编的反映煤矿生活的话剧《煤海朝阳》。为了加强舞台综合艺术的完整，提高话剧质量，还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指导艺术实践。如七六年请哈市话剧院舞美设计罗克敏，为话剧《万水千山》进行了舞美设计。

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以后，结束了一花独放的历史时代，文工团也随着文艺解放而复兴繁荣，展现了新的面貌。上演了一些“暴露”戏，如《白卷先生》、《枫叶红了的时候》“伤痕”戏如：《救救她》、《姑娘跟我走》、《于无声处》等外，还恢复重演一些群众较为喜爱的名剧如：《秋海棠》、《八一风暴》、《八号档案》、《西安事变》等。七八年在牡丹江演出《西安事变》期间，鸡西文工团团部因小孩玩火，不慎而引起毁灭性的无情大火，除携带在外演出用的设备幸免遇难外，其它三十多年的积蓄家当，都毁之一炬而成灰烬，从牡丹江演出返鸡后，文

工团无处安身，市委、市政府决定文工团和煤城影剧院合并。歌舞队在排演《小女婿》（评剧）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鸡西市评剧团。文工团又一分为二，话剧队又恢复了鸡西市话剧团。八〇年迁入煤城影剧院，赵殿财任支部书记兼团长，方海清为第一副团长、迟仁基、权世逸、王金城为副团长。

八一年后，社会上出现了自由化倾向，各省、市有些表演团体上演了《香港大亨》、《假如这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一些戏，而鸡西话剧团却坚持“两为”，反对自由化倾向，上演了话剧《刘胡兰》，和请哈市话剧院导演肖致城导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还上演了《雷锋》、《谁是强者》、《少帅传奇》等一些教育意义较强的戏，受到领导和观众的好评。市委宣传部为《雷锋》的上演发了通知。八四年由杨宝琛编剧、迟仁基导演的话剧《将军的战场》，参加省调演和东北三省的汇演。其故事情节与编导收入“维也纳皇家戏剧学院”编纂的《世界戏剧大全》里。八六年杨宝琛编剧、夏钧寅导演、陈力为指导的《孝子贤孙》，参加了黑龙江省首届天鹅艺术节的演出，获荣誉证书。八八年杨宝琛编剧、中国青艺严忠颖、迟仁基导演的话剧《天鹅湖畔》参加了鸡西市首届艺术节。

鸡西话剧团四十年来，努力配合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演大量的歌、话、舞剧外，还为省市电视台排摄了张勤创作的电视剧《笔墨春秋》，邵宏大的《响山》，鸡西电视台的《黑手》。有些同志受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排了电影，方海清受北影的邀请，于八二年排了《血，总是热的》，八三年排《骑士的荣誉》。八五年高强受峨嵋厂邀请排《小巷名流》，八七年排《京都球侠》、八七年排《血魂》。

八六年经省艺校批准，成立了省艺校鸡西校外话剧班，学员16名。在倪如训、吕露玲的精心培育下，经过近三年的学习初步掌握了话剧表演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术，即将成为话剧事业的接

班人。鸡西话剧团为发展话剧事业，培养表演人材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鸡西市话剧团从建立到现在，经过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漫长的战斗历程中几经沉浮，由团变队、由队变团，由综合性文工团变专业话剧团，又由专业话剧团变为综合性文工团、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具有编、导、演、舞台工作等行当齐全的话剧团。人事多次更叠，鸡西的话剧事业也在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东北、特别是我省小有名气的话剧表演团体。话剧的四十年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就是：

一、是建市前的组建巩固阶段。在矿区党委宣传部长王珣、吴长胜、矿区总工会宣传部长才晋三等同志的亲自领导关怀下，得到组织上强有力的保证，才得以顺利建成、巩固、发展。在业务上有于靖、孙蒙等艺术造诣很深的同志，以他们毕生的精力，培育成一支较为完整的艺术团体，成为推动煤矿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大军。

二、是建市后大发展的阶段。建市后，文工团隶属关系由矿划归市领导之后，市建立了文化局，第一任局长刘振兴。市委宣传部长张涛部长亲自过问文化事业。从建市到文革前的近十年中，鸡西市的文化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建成了京、评、歌、话、曲等五个文艺表演团体，是鸡西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话剧的艺术质量，在大发展中也有较大的飞跃，如：《秋海棠》、《八号档案》、《红色标兵》等戏，都震撼了东北三省，北京青艺还把《红色标兵》搬上了首都舞台。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值得留恋的大发展的年代。

三、是文革中话剧受摧残的阶段。由于文革中受一花独放的影响，话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演职人员受到了迫害。为了配合运动，曾一度出现“三突出”和“造反文艺”，使话剧艺术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四、是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得到解放，话剧也随着复生。在进入八十年代改革过程中，市委副书记陈玉德给予很大的关怀和支持，话剧得以稳步前进，先后创作、演出了一些较好的戏，参加省调演和东北三省会演，在东北文化艺术界中，成为东北知名度较高的话剧专业表演团体。目前，全体演职人员正为改革话剧、繁荣话剧而努力奋斗。

来自地狱里的怒吼

——记解放前麻山煤矿的文化生活

周笑秋 搜集整理

现在麻山煤矿的所在地，在二十世纪初是一片渺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地带，直到一九四一年才有了“西麻山”（现今麻山矿）这个名字。因此，追溯麻山煤矿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志是短暂的。加之解放前的矿山，矿工连温饱都得不到保证，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了。然而，煤矿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压迫剥削下，并没有保持沉默。他们以淳朴通俗的语言，谱编了一首首对统治阶级的怨恨、诅咒和讽刺的矿工谣，流传至今。当时在麻山矿工中有这么一首反映自己苦难生活的矿工谣：

吃的窝窝头，
披的麻袋头；
盖的破席头；
枕的红砖头；
下坑摸榔头；
升坑挨枪头。

解放初期有个佚名的文化教员把矿工中流传的这首头字歌收集整理为一百句《头字谣》。一九五一年在沈阳召开的东北煤矿职工代表大会上朗读，受到好评，被誉为反映旧中国煤矿工人苦难生活的民间史诗。

由天津受骗应招到鸡西煤矿的一位教师梁万树，以亲身经历编写了一首《劳工怨》，谱以《苏武牧羊》的曲调，在矿工中广

为传唱，至今还有些老工人一字不差地背唱如流：

宋祖武（招工把头）把膏药卖：

快到密炭去（即鸡西煤矿区），

炭矿把活干。

一日三餐洋白面，

还发大洋三块三。

老头也能去，

小孩也不嫌；

要去的走上前，

使上点铺底钱，

天津站里把车上，一溜铁门关……

到了炭矿傻了眼：

住的大窝棚，

穿的麻袋片；

橡子面的窝窝头，

又碜又发酸；

赶下煤洞子，

泡在水里边；

鬼子把头打，

血泪湿衣衫；

万人坑里留下咱白骨一摊……

这首《劳工怨》真实地反映了受骗工人的悔恨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把头诓招劳工的骗局。

麻山矿有个大把头叫林秀峰，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矿工曾编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来发泄对林家大柜的怨恨：

到了林家柜

光剩活遭罪；

开支不用看，

管保大鸭蛋。

原来工人每到月末去领工资，经把头七折八扣，只能领回一片画着“○”的白纸条，矿工把它比做“大鸭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全面推行奴化教育，进行精神愚弄。鬼子、把头在各个煤矿开设妓院、赌场、大烟馆，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工人，以达到控制工人的罪恶目的。当时在麻山煤矿地面运输大福组工人曾流传着这么两则民谣：

(一)

把头特务都是强盗，
敲诈勒索出尽损招：
一送财礼在数难逃；
二卖彩票耍的圈套；
三设赌场输打赢要；
四祭老君，掏尽腰包。

(二)

七九六十三，
工人把脸翻；
大天拉一把，
地么点支烟；
牌九桌上摆，
要走难上难。

这首打油诗的大意是说：每逢“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大好春天，是煤矿工人跳柜的大好季节。地面运输大柜于长志就唆使他的大老婆“大天”，用淫秽的色情来麻醉工人；而他的小老婆“小地么”则勾引工人赌钱。有些工人因无处消遣，在流氓地痞的勾引下，抱着“活一天少两晌”的想法，出入妓院、烟馆、赌场。他们辛苦挣来的几个血泪钱被搜刮一空，不但养活不了家小，想逃跑、跳柜也就难上难了。所以麻山煤矿工人自己谱写

了一首喊起人们警苦的歌谣：

吃喝嫖赌抽，
分文也不留；
爹娘望穿眼，
泪珠不住流；
想家回不去，
只好当马牛。

但是，大多数煤矿工人并没有终止对反对统治的斗争。他们一方面消极怠工、破坏生产，一方面利用民歌形式，揭露、诅咒鬼子把头的滔天罪行：

煤窑地狱十八层，
大鬼小鬼来追命；
大巴掌、榔头棍；
要不扣个大罪名，
“反满抗日通八路”，
屈打成招用大刑——
辣椒水、老虎凳，
冻冰棍，蚊子叮。
刮掉眉毛打火印，
熬出人油点天灯。
各种刑罚全用尽，
阎王殿里难逃命。

下面一首打油诗，则是矿工对封建把头的刻骨仇恨，并表示冤死之后也要进行报复的仇恨心情：

把头王八蛋，
尽把坏事干，
吃的他不管，
住的他不管；

砸伤没人理，
病倒没人看；
死到阴间去，
也要把帐算！

麻山煤矿工人望眼欲穿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强盗欠下的麻山煤矿工人的累累血债，夹着尾巴逃跑了。矿工为了抒发心中的欢乐，表达对人民军队的热情，编唱了一首民谣：

八月十五桂花香，
红军八路打东洋。
飞机大炮一齐响，
日本鬼子投了降；
把头特务全完蛋，
煤黑子作主把家当。

解放前，在麻山煤矿秘密传唱的这些矿工谣，有的是从别的煤矿流传到麻山煤矿的，但绝大多数是麻山煤矿工人自己编唱的。从这些充满血泪感情和刻骨仇恨的诗篇中，反映了工人群众的创作才能。老一代矿工留给我们的《矿工谣》是煤矿文化志中一部难得的珍品。

解放前，麻山煤矿仅有过一次文化活动，那就是在一九四四年大把头林秀峰为讨好新任日系矿长神尾，举办过一次庆祝日本樱花节的演出。演出的临时舞台搭在麻山矿岭南的山坡上。演出这天，安在电线上的喇叭不停地播放令人肉麻的流行歌曲《满州姑娘》。靠近舞台的山坡下，摆着几十张长条桌。条桌前依次坐着神尾矿长、宪兵队长、警察署长，矿本部各系系长，各坑口坑长，以及矿警队长；挨着神尾矿长和宪兵队长坐的除大把头林秀峰兄弟外，还有他们自称为“老寿星”的父亲；林秀峰的老婆“二蘑菇”也在座。为了表示尊重日本的风俗习惯，除“老寿星”

外，在座的都穿着日本和服。

从林口请来的一个日本戏班子，演出的日本民间喜剧，把日本人逗得前仰后合，捧腹大笑；最后，由林把头的老婆和日本宪兵队长演出“日满亲善”双人舞；她那卖国求荣的丑态，使在一边观看的矿工感到恶心，骂她是“洋婊子”。

庆祝樱花节的闹剧，从早晨开始，又是看戏，又是吃喝，闹到下午三点才收场。

樱花节过后，矿工们见自己的开支条上扣除三元钱戏票钱，都拿着开支条去找内勤问：“给日本人和把头演戏为什么扣我们工人的钱？”内勤说：“樱花节那天你们不是都看了戏吗？”工人刘柱说：“演戏的时候，有警察站岗，不让工人靠前。我们离台子一百多米，唱什么也听不明白，凭啥扣钱？”内勤把手一挥说：“不管站多远，凡看到戏台子的，都得扣钱。”林把头通过这次演出，又从工人身上刮到了一千多元，而工人只因看了一眼听不懂、看不清的日本戏，却被无理扣掉了一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至今老工人回忆起来，无不切齿痛恨诅咒鬼子和汉奸把头的罪行。

往事杂忆

袁兆山口述 吴玉科整理

转战东北，密山养伤

1942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新四军三师27团，在山东改为滨河军区二师五团。1945年10月，从山东渡渤海进入东北。当时在北满、黑山一带的国民党13军、新一军乘我部立足未稳，搞了突然袭击，使我军损失不小。不久，我军寻找战机，在营口附近一举歼敌30余万。将国民党的那部分部队彻底打垮了。接着挥师北上，驻防吉林省永志县的查路河。1946年3月11日，于蛟河县又收编了欲哗变的解放过来的国民党65团。这时，我们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二师五团，参加了第一次解放四平的战斗。占领四平的是苏军撤离后被国民党收编的伪满“铁石部队”，一场激战，我军一举歼灭敌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及“铁石部队”3000余人，解放了四平。我在柳条沟攻坚战中膝盖骨被弹片击碎，不能行走。战地医院将我简单处理后随部队转到当时的后方基地——黑龙江省密山第九病院养伤。

第九病院分三个疗养所，密山地区有两个（一、二所），鸡西一个，叫三所，疗养一段时间，已基本痊愈，但还不能象正常人那样走路，还得拄着拐杖。我要求重返前线，领导看我这个样子很难参加战斗，就再三动员我，不让我回到部队，让我继续疗养，正好，刚成立的东安实业银行没有干部，跟专署要人，当时各地

都缺干部，专署找到我们师部，当时，我师正在密山整训。师首长开玩笑说：“我们还缺干部哩，你们要伤病员，我们可以考虑。”经过协商，师里从恢复健康，但不能回部队参战的同志中挑出13名，支援到地方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考虑自己腿部受伤，既然不能随部队参加战斗，那还不如尽快到地方为支援前方工作。所以，我同意了组织的决定。

接收鸡宁银行

到专署报到后，专署分配我到东北银行东安分行工作。时间是1946年9月12日，行长张安仁立即同我谈了话。这个老同志从13岁起就跟着父亲当了红军，在延安时就在银行工作。他谈了银行工作的重要性，说明前方战士的吃穿、弹药主要靠银行筹款供给，说着，他把金库钥匙交给我，说：“我明天去省里开会，得十多天才能回来，你要保管好金库。”同时告诉我负责银行的后勤工作。10月3日，张行长又找我说：“根据东北银行指示，要我们接收鸡宁支行，那里的行长现在由县长张凤阳兼。你要同他接收。”同时，具体商量了接收办法，还给我看了“东安银行鸡宁支行”的大印，带着这个大印我就出发了。

到鸡西后，住在银行宿舍（农机商店旧址）当天我就找到县委书记白如海，商量接收事宜。看来，专署已通知过，他们知道了这个决定。县长张凤阳也在场。初步就接收程序谈了一下，张行长临来时吩咐我要无条件接收，而县委、县政府出于本单位的利益要我们有偿接收。说着，我和张凤阳争执起来，当时，年少气盛，都有领导撑腰，各不相让。我说：“我按银行领导指示，前来接收。你们提的条件我答复不了。”张凤阳说：“鸡宁银行为我们鸡西做了不少贡献，也攒了不少家底，你们来白捡，我们不干。”我说：“我从专署来接收是奉领导指示，有专署签字，有

偿接收我办不到。”我见怎样商量也不行，就火了，掏出枪来，啪地放在桌上，他也掏出枪来同我示威，双方的警卫员不知如何是好，白如海从中极力调解，我气呼呼地说：“你不让接收，我明天就回密山去汇报。”次日；我准备回密山，白如海的通讯员来通知我，不让我走。告诉我：“专署已知道这件事，派郎秘书来鸡宁处理。”当即我和他同去县委，在白书记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郎秘书、白书记、张县长。郎秘书说：“这是一场误会，鸡宁县要有偿接收，也是为了工作，你应该理解。现在专署要无条件接收，我们坚决服从决定，不过，银行的债权债务一切全包接收。”我表示同意。这样，在郎秘书、白书记在场情况下，我俩在接收书上签了字。

边 贸 和 内 贸

当时，物资奇缺，光靠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物资供给前方远远不够。合江省银行给我们下达命令，收购大米和白条猪，和苏联进行边境小额贸易。我接到命令后，考虑到行里人手少，工作任务重，必须依靠地方协助。于是，我向白如海汇报，他大力支持。经过研究，选中了平阳镇、鸡东两个点收购，他特地指示在那里工作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张震、张进学二同志协助我们工作。记得我们将平阳稻米所做为收购大米的场所，经过动员，农民肩扛手抬，车拉人拽，涌跃售粮，不几天便完成了任务。经过当壁镇，我们用这些大米和猪肉同苏联换回大量的海盐、布匹。省银行觉得鸡西银行做了不少工作，特地拨给鸡西不少物资。保证了鸡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春节前夕，白书记派通讯员把我找去商议工作，当时李尔重也在场。刚一落座，白书记就说：“请你这个银行老板来，想让你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忙问怎么回事，他们说：“鸡宁市

场物价太高，火车又不通，外边物资运不进来，光靠小商贩的活动、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他们乘机哄抬物价，老百姓叫苦不迭。一些城市贫民没有盐和油吃，没有布做衣服，没有粮食，要过不去年啦。”又说：“你能不能搞点物资，让老百姓过个好年，也可以平抑物价嘛！”我说：“可以，不过得请示一下分行领导。”分行领导听到我的汇报后，同意我们把换来的布匹卖出，并指示：“不要挣老百姓的钱，要个成本价就行。”遵照领导指示，我们立即把布匹食盐投放市场，又和密山联系来三车皮衣服和军用毛毯，五车皮密山酱油。这些物资投放市场后，老百姓踊跃购买，现在有的家庭里还有那时买的黄毛毯。小商小贩则叫苦连天，要求贷款，我批评他们：“你们乘人之危，哄抬物价，以后不要干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情啦。”经过我们十几天艰苦工作，终于平抑了鸡西市场上的物价。

关于县大队成立

看到《鸡西党史通讯》登的成立县大队照片，我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照片前排右起第二人就是我。当时我是鸡宁支行办事处主任，并不在县大队兼职，为什么参加县大队成立大会呢？说起来这里边还有些值得回忆的东西呢。

1946年初，县长沈先夫和周天浩找到我，沈先夫和我很熟，是我们的参谋长。说：“县大队要上当壁镇整训，眼看冬天过去，春天到来，战士们换不下冬装，你说该怎么办？”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意思，难以回答，这时财政科长张志良说：“你拿钱吧，我可以签字。”我说：“你签字当啥，县财政也没钱哪！”我知道，当时鸡宁工业少得可怜，靠那一点财政收入根本不够党政军人员开支。沈县长要我想办法通融一下，我答应请示一下。回到行里，我特地去密山一趟，请示张行长，我把鸡西的困难作了

汇报，张行长很同情，指示：“钱你先花吧，只要支援解放战争，收不回来也无所谓，我再向上边请示。”回来后，我立即行动，按1500人编制，每人拨30尺白布，估计够做一套军装、内衣、背兜、绑腿、帽子。白布做军装得染成黄色，我找到鸡西一家私人染厂（厂址在印刷一厂），老板姓张。商量能不能给染一下，老张表示为难说：“这么一大批布，我这个小厂确实困难，再说我也没有钱买那么多染料啊！”我说：“那好办，只要你能加工，我可以给你贷款买染料。”他高兴地答应了。我把白布拿来后，张老板带领几名工人亲自操作，不几天就完成了任务。沈县长说：“银行贡献不少了，服装加工费我们县政府拿吧！”不久，全套军装加工完毕，大队长周天浩非常高兴，非要拉着我参加县大队成立大会，盛情难却，我同吴德华、沈先夫、白如海等同志参加了县大队成立仪式，会后照了这张宝贵的照片，至今我家自然保存着这张照片。

保护民主工商业者

土地改革是一场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严重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的威风。当然也不可避免产生过“左”的错误，一些村农会擅自到城镇抓小商小贩，揪起来马上就斗，这让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市场也萧条冷落起来。这时《土地法大纲》已经公布，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民族工商业者的作用，明确了党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

记得春节初一那天，担任城关区区长的赵鸿丰来到我家，谈起了这件事，感到很忧虑。我说：“你不来，我正想找参谋长去，一来拜年，二来找他商量这件事。”赵说：“好呀，咱俩一块去吧。”沈先夫原是我团参谋长，我跟他很熟，到鸡西当县长后，我一直称他“参谋长”。我俩出门骑自行车直奔县政府。来

到沈先夫家，这是办公室临时改修的宿舍，他爱人马飞也在。落座以后，寒暄一阵。我便谈了正题，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应该由县政府发一个布告，搞他几条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我们又来到马东波处（当时是县委书记），他也表示同意。我心里很敞快，感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真是为人民办实事。马东波非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我们说家都不远，这次就免了吧。初三那天，我在街里就看到了石印的布告，内容很全面，落款是鸡宁县人民政府鲜红大印，布告是在李镜波刻字局印刷的，刻字局就在现在的妇女儿童商店。据布告规定，凡是农村到城镇抓人，一律经城镇公安局批准。同时公安局也加强了纠察。老百姓很高兴，商贩们也都安心营业了。公安局长吴德华见到我说：“小袁，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命令公安局为他们服务？”我说：“这是土地法大纲规定好，咱们只不过是搞了几条具体实施办法。你公安局是我们的靠山，你不出面，县里怎么办？”吴德华哈哈大笑。公安局组织纠察队伍上街巡逻，街上也真太平多了。吴德华和我关系很密切，他和黄其（城区书记）俩口子没有小孩，见面老吴头就管我叫乾儿子，我也自觉承担起义子的义务，对老同志格外照顾。赵鸿丰和我来往挺密切，我还和他换过手枪，他把日本的四四式手枪给了我，我把二八匣子给了他。沈县长后来离开鸡西时，我们送他，临别前，我把最心爱的派克式钢笔送给他做纪念。

关于伤病员

1946年底，前方陆续送下来一批批伤员，这些伤病员有的是抗日战争就参加革命的八路军、新四军老同志，有的是刚解放过来的战士，刚从前线下来，后方管理工作一时跟不上去，伤员们有些想法。上级号召各单位慰问他们。银行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除了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还要在精神上鼓励他们，安

慰他们。我们决定排一出歌剧。记得剧本名字叫《不》，演员们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小青年，大家热情很高，我们找来滕小飞给演员排戏、化妆。刘振兰演沈老太太，寇淑琴演女儿，演员逼真的表演，生动的剧情使不少伤病员感动得呜呜直哭。一些伤病员对前排就座的县政府领导很不满，错误地认为他们摆架子，对伤病员不关心，个别人就连续几天寻衅闹事，公安局出面制止。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我到第九病院三所（现光明电影院西侧）和伤病员谈话，因为我曾在三所养过伤，认识不少同志，协理员我也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你们要看戏，我让银行剧团单独给你们演。”我还同协理员商量，协理员说：“我们三所底子薄，伤病员生活照顾不好，药品也缺，没钱买。”我说：“那好办，我们可以给你们搞些无息贷款。”协理员又召集伤病员中的干部开会，规定几条纪律，例如不得单独外出，对地方有意见要逐级反映，不要采取错误做法等等，这样，我们银行和伤病员的关系搞得很融洽，每逢年节，有些轻伤员自动为我们站岗，保卫我们。

还有一件事，西山军工部来一批学员，没有住宿房子。林世超找沈先夫县长指定要用铁路小学和附近的一些仓库。当时，这些房子还归我们银行所有，准备做收购粮食的仓库。因没到收购季节，暂时闲置。林世超执意要搬过去，我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僵持很久，有些伤病员听说后，亲自动手把行李搬进去，替我们看守。后来，县里一再调解，军工部答应是暂借，等新粮上市他们就搬，我们考虑军工部的困难，也就借给他们用一段时间。

沈县长来鸡西很好地处理了伤员闹事问题，以后再没听说有闹事的。

统一流通货币

1946年10月，我到鸡宁接收东安地区专业银行之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发行东北币，统一鸡宁的货币市场。

当时鸡宁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非常混乱，有伪满币（俗称绵羊票）、红军票、牡丹江票和合江票、东安票。各种币值比价不同，由于地区差价，一些商人趁机大搞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老百姓深受其害，例如，鸡西市场上大米10元1斤（东安票）到哈尔滨卖40元（东北流通卷）1斤，这40元东北流通卷到牡丹江可换60元牡丹江票，回到鸡西可买4斤大米，转手可得数倍余利，而且鸡西物价飞涨，一日数价，老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不使老百姓吃亏，为了发展生产，我们采取了不同办法统一币制。对伪币采取“赶绵羊”的方法，这是东北人民政府同敌占区展开货币斗争的重要措施，鸡宁县政府向人民发出通告，告诉人民伪满币即将停用。同时鼓励商人用伪满币到蒋统区购买棉花、纱布，由解放区贸易部门收购，让商人有利可图。这样一来，伪满币在市场上不断减少，并且不断贬值，1947年1月1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下令停止使用。

对其他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则实行用东北币兑换的办法，以不同比例兑换，当然、政府和人民损失不小，仅合江票就损失127万元。

一次特殊任务

魏殿明口述 于迎春整理

在我平凡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件事情至今令我难忘。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被组织上分配到城子河矿派出所当民警做外勤工作。十月末的一天夜里，值班人员把我从宿舍叫到所里告诉我：“我们刚收到矿区公安局电话，让你换上便衣，马上赶到局里执行任务。”我一时找不到便衣，只好把所里食堂大师傅的衣服换下来，满身立刻散发出浓烈的油烟味，我也来不及告别其他同志，就匆匆上路。当赶到矿区公安局时已汗流夹背了。门卫听清我的来意，将我立即领到局长办公室，王凤歧局长和马文良、孙耀宗二位股长都在等我，我一进门，他们就赶紧迎了上来说：“小魏累了吧，快坐下喝点水。”我急于想知道是什么任务，所以也没坐下，马上请求领导分配任务。王局长看我着急的样子说：“好吧，咱们坐下谈。”我坐到王局长身边，局长说：“在恒山，我们掌握一个国民党的某省高级参议员，叫蔡寿山，现在他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你的任务就是监视他的行动，看他与什么人常接触，在我们没正式逮捕他之前，别让他跑掉，我们派王福诚协助你。小魏，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公安战士。”我一听是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兴奋地说：“我坚决完成任务，接受组织考验。”然后王局长又给了我一支手枪，又检查了我的服装，给我一张蔡寿山的照片，怕露破绽，让马、孙二位股长将我绑上，由二名公安战士押送去恒山，我们告别了王局长，就上路了。

我们出发时已是半夜十点多钟，在微微的月光下，夜显得格外的黑，通往恒山的崎岖山路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尤其我两手反绑，总觉得身上失去了平衡，想快走也快走不了，艰难地迈着每一步，可是想到任务的重要就什么也顾不得了。当我们到恒山矿派出所时已是后半夜了，我们都疲倦不堪，押送的二名公安战士将介绍信和我交给恒山矿派出所所长陈配凯后说：“这是个要犯，先把 he 安排一下。”我很快被送进小号，双手绳子被解开后，我一头躺到草垫子上就睡过去了，开牢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已是早上十点多钟。马、孙二位股长从鸡西矿公安局来了把我提出来，绳子又绑到我的手上，不过这回多了一个人，走在路上，二位股长介绍这个人就是王福诚，是和我一起在省公安干校分来的，我们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二流子劳改队。由于蔡寿山在十五号大房子住，所以向管教员李凤林交待，把魏殿明安排在十五号南炕，王福诚在十四号北炕。为我们创造接近他的条件。当我走进十五号房子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这屋里有个头大家都叫他纪炕长，是国民党大连老虎滩书记长。把我安排在他旁边的一铺，纪炕长听说我还没吃饭，就给我写个条，让我去找刘区长领饭，一会我领回两个窝窝头，连块咸菜都没有，但由于一天没吃饭，三口两口就把两个窝头吃下去了，还满香呢。这时下井的人都陆续回来，唯独不见蔡寿山，我想是不是他知道什么风声跑了？但我怕露马脚，还是耐心等着。晚十点多钟，进来一个人，他大高个，大手大脚，用老百姓的话讲，长得还真是福相，他身披一件长棉袄、脚穿双棉水靴，屋里人都和他打招呼，他说话声音宏亮、有膛音，瓮声瓮气。我想他可能就是蔡寿山。果然，炕长问：“老蔡，你才回来呀？”，“有几个朋友喝点酒。”他边说边脱鞋上了北炕，很快就睡了，我也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蔡寿山就下井，我也顾不上疲劳，找管理员办入井手续，我和蔡寿山没分到一班，我怕脱勾，又二次找管理员

要求换班，管理员嫌我事多，我磨了好一阵，才给我换到蔡寿山那班上。结果第一天就砸死一个北炕的伙计，大家情绪很紧张，有的买酒喝，有的不下井睡大觉，蔡寿山也买了些酒和小菜，把我们几个人找到一起，就喝上了。他看我是新来的，问我犯了什么事儿，我说是偷人东西，他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干坏事？把我好顿说，真把我气坏了，但还不能表现出来。就在这时，一起喝酒的有个小子说：“我好象在哪见过你。”我这时也想起来他是我曾抓的一个小偷，我怕暴露身份，利用掌握的案情说：“咱们过去不都是干那儿行的吗？”他看我比量偷的动作也就信了。我当时真出了一身冷汗。

通过几天接触，发现蔡寿山很狡猾，平时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和工人一起少言寡语，言行很谨慎，都说老蔡是个好人，他尽量掩盖着自己的身份。

我和王福诚每天早晨在厕所碰头，把掌握的情况再由他汇报给局里派去的联络员。大约一个半月后，局里把蔡寿山的身份搞清了，看他没有其它行动迹象又没发现什么人与他联系，怕时间长了他再跑掉，决定逮捕他送交北京。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联络员通知我们今晚捕蔡寿山。我和王福诚对蔡就更注意了，怕他捕前跑掉。

晚上，蔡寿山与往常一样回来的很晚，和大家喝点酒，又说会儿话就躺下了。约十点多钟、门外有人喊：“这儿有叫蔡寿山的吗？刘区长找你。”蔡起来披上衣服，趿拉着鞋就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他刚一出门，有人问：“你是蔡寿山吗？”蔡刚说：“我是。”就上来两名公安战士利落地将他反绑上、押上了车，很快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几天后，我们奉命回到公安局，局长告诉我们，蔡寿山是个国民党的要员，并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我怀着公安战士一颗赤诚的心开始新的工作。

智 取 保 安 队

陶 宜 民 口 述 吴 玉 科 整 理

1946年初，鸡西地区已进驻了苏联红军，滴道那个地方，当时我军派驻一个连队守卫。连指导员叫葛志云，连长是苑云宝，是孙轩华从虎山调来的。曾给白如海同志当过警卫员的×××也在这个连当青年干部。当时流窜在鸡西、密山一带的土匪头子谢文东，对苏联红军和我派驻的武装力量恨之入骨，欲除而后快，经过一番密谋后，于2月16日早晨，由谢文东的参谋长吴康带领一帮土匪，悄悄地包围了我驻防滴道的一个连队。那天早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我连七十多名战士，还在睡梦里，没有准备，仓促应战。伤亡二十多人，其余有的逃走，有的被俘，指导员葛志云用驳壳枪还击，子弹打完，把枪支砸毁后被俘，后被敌人杀害。

白如海回到鸡西后，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同苏联红军联系，要求配合剿匪，红军派出炮兵紧急增援，孙轩华带领一百多人往滴道增援，将土匪打死。

土匪这次扰乱鸡西，不但打死我们的战士，苏联红军也牺牲不少人。红军司令感到很愤怒，对佟振声的保安队很不满意，要求他们撤出滴道，到兰岭一带驻扎。佟振声的保安队表面上应付红军，暗地里勾结土匪，阴谋投靠国民党。他手下有四个大队。一大队长叫白胜云，二大队戴凤章，三大队王××，四大队长的名字忘记了。这四个人也很坏，他们在兰岭附近为非做歹，专门杀害我们独立团的家属。我们曾派邵洪泽去接收过，因土匪

势力太强，孙荣文叛变没有成功。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不能四面对敌。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战略。决定派东沙场的柴保生（他是保安队的挂名参谋）去谈判。柴感到很困难，婉辞拒绝，但他推荐了与佟振声有家礼关系的关眼镜，并说：“这个人很可靠，不会两面三刀。”按规定时间，关来见我，我见他挺稳重，言谈间颇有正义感。我对关说：

“佟振声队长曾经是我们的朋友，土匪吴康挑拨我们的关系，佟做了一些坏事，但我们不计前嫌，为了地方安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我们团结起来吧。”关眼镜听了连连表示：“我是中国人，一定为国家效力，陶政委如看得起小弟，小弟一定效劳，小弟一定能说服佟振声，让他参加谈判会。”我说：“会议时间和地点再定，你先跑一下，探一下佟的动向。”关说：“空口无凭，你最好写个信给他。”我把早就写好的信给他，信的大意是：大敌当前，我们应放弃前嫌，为了地方安宁，不再互相残杀，要合作。不几天，关眼镜回来告诉我，佟基本同意，又提出得让四个队长参加，他接着又做四个队长的工作，他们也同意和平相处，至于开会时间地点另定。

我向白如海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经过商议，觉得谈判应该由苏联红军出面主持，我们和红军司令部商量，司令部表示此事可由滴道的红军出面。于是我和老白带领徐翻译到滴道找红军司令商议，我们的口气很硬：“佟振声的保安队是你们红军同意建立的，现在他们扰乱治安，必须收编。”红军同意了，我们打算如保安队接受改编，我们允许保安队回到原来驻地。如不同意改编，我们就把谈判人员扣下。

谈判是在滴道进行的，我方由白书记参加，保安队长佟振声很狡猾没有来，只派邹世鹏参谋代表，四个大队正副队长都来了。苏联红军一个军官主持了谈判会。白书记首先发言，他说：

“日本侵略者撤走后，地方治安一直由我们和保安队维持，由于保安队一些人立场不稳，暗地里勾结土匪，致使地方不得安宁，我们和红军也损失了不少力量。考虑到保安队多数人的愿望，为了地方上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们和红军研究，同意你们回到原来驻地，负责地方的保卫工作，条件是接受我们改编。”保安队邹说：

“回原驻地是我们弟兄的愿望，但要说改编，恐怕难以接受。”武凤章、白胜云也异口同声地说，回去可以，不能改编。白书记见谈判已成僵局，给红军军官使了个眼色，军官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为了诸位的安全，请你们留下来住几天，枪也要交给我们保管。”众人一看都傻了眼，不得不把枪交出来。

当晚，白书记回到鸡西，讲了这个情况，我们很高兴，要求红军把这些人引渡给我们，红军不同意，将他们送往牡丹江。途中看管不严，武凤章和邹参谋跑了，其余人押到牡丹江，经过审讯，把白胜云判了十二年徒刑，其余也判了刑。

中央胡子进街

王守德

1946年4月9日午后三时许，国民党15集团军郎雅彬团（简称郎团，郎雅彬是伪满时期林口县宪兵队特务）、阎树民团（简称阎团，外号阎大马勺）和郭团等三个团一齐向梨树镇街里进军。郎团从河西抢渡穆棱河向街里猛扑，阎团和郭团合并匪军从穆棱煤矿四井一带向街里逼近。当时梨树镇街里有保安队员72人。分布在街里60人，车站12人。保安队主要头头崔照禄、魏化南、李俊清、姜德谦等人与中央胡子郎团互相勾结，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让中央胡子进街，因此中央胡子顺利地进驻了梨树镇街里。这就是中央胡子第二次进街。

第一次郎团进街是1946年一月份，被苏联红军司令部派红军乘汽车来梨树镇街里，把中央胡子郎团赶走。第二次进街是里应外合，保安队打算把中央胡子引进来，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梨树镇东进委员会主任金生同志的反对，不许他们进街。保安队副大队长魏化南谎说：“郎团进街是投降受编。”金生同志坚决不准其进街。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副大队长李俊清为迎合金生的意见，同意将保安队全部撤离街里，到东山集中，居高临下，便于瞭望和抵抗。遂下令保安队战士往东山撤退。梨树镇车站的护路小队12人是保安队的一个班，其中11人是朝鲜族战士，他们发现敌人从河西渡河时，曾用电话和街里保安队请示行动，魏化南答应可到街里保安队集合。街里队员在东进委员会主任金

生的指挥下，往东山撤退。副大队长李俊清率领保安队战士和金生同志一同撤退。当保安队员撤到城鸡线火车道时，敌军已进入街里，并开始向保安队员射击。保安队员发现敌人向他们开枪时，开始还击，边撤边打，争取在短时间内撤到东山高处，占领东山后便于打击敌人。当撤到东山坡时，朝鲜族战士朴正彦中弹身亡。保安队主要武器机枪向敌人猛烈还击，打得敌人不敢冲锋，掩护了保安队战士顺利地登上山顶、继续战斗。轻机射手金元植向猛扑的匪军扫射，迫使敌人不敢前进，但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来，他只好转移方向撤离。

梨树镇车站护路小队的战士在小队长任利淳的率领下向街里挺进，他们发现街里已被敌人占领，乃改变路线向东山前进。行进在东山南坡下时，他把战士安排在坡下待命，他一人先去探听一下情况，结果前进不远被隐藏在附近的匪军将任班长刺死。其余战士发现敌人太多，只得按原路撤出，正在撤退时被敌人发现，集中火力向他们猛扑，结果朴利峰腿部中弹，在战士们的掩护下进行简单包扎后继续撤退。从东山南坡经过穆棱矿小河沟向八家子西头山脚方向前进，边退边打，激战近一个小时，护路队战士退到八家子西山根下的坟地边的一个倒塌的菜窖里和坟墓后，利用地形地物做掩护，匪军已追至公路的北侧，仅有一道之隔、双方相距仅有一百多米，情况非常紧急。匪军连长率领匪军喊话：“缴枪不杀！”并亲自指挥作战，敌人继续逼近，距离越来越近，最后仅有三十米左右了。任班长牺牲了，敌人逼近了，子弹也快打光了，怎么办？有人主张投降保命，也有人主张：中央胡子和朝鲜人誓不两立，宁可战死也不能投降。他们小声商量，要节约使用子弹。必须做到一发一中。这时敌连长正在指手划脚地出现在眼前，他以为护路队战士不还击可能都战死了。他指挥匪军要冲上来，这时我方发出一枪将连长击倒了，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前进了。我方战士把日军的钢盔做为假目标，用一个

枪托把它顶出菜窖坑外，敌人向钢盔打枪，我军一会儿将钢盔移向左方，一会儿又将钢盔移向右方，扰乱敌人视线，从午后四点钟双方坚持在这块战地上，敌人被击伤多人，又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敌人也不敢冲锋，我方战士也只有坚守阵地，最后敌人抓来一名朝鲜族群众向战士们喊话：“你们投降吧，不然把你们都打死！”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每个战士仅有三、四发子弹了，不敢轻易使用，又不敢冒险撤走。

不一会儿，天空黑云密布，并下起小雨来，逐渐雨点大起来，双方都看不见了，敌人不时发出枪声。战士们小声研究：

“时刻到了，我们快点撤退，但要一个一个的撤，先把受伤的同志扶走，免遭敌弹，减少伤亡！”这时战士们迅速地爬出菜窖沿着阵池沿岸鱼贯而行，直奔大场村，安全撤离险境。保安队牺牲两人、受伤一人；敌人死亡一人受伤多人。金生主任从东山北上，经风山村赴鸡西市安全脱险。保安队战士从东山边战边撤，绕东北方向去穆棱煤矿，撤离阵地。

天色已黑，战斗结束了，中央胡子占领了梨树镇街里。维持会长白惠霖、副会长贾绍先、保安队长、副队长崔照禄、魏化南、李俊清、姜德谦等头头们，设宴招待，并找来崔海亭大夫为敌军伤员治伤，半夜时间派车把敌人送走。

同年四月十三日，民主联军十四团经林口、麻山来梨树镇。本地朝鲜族的保安队员怕中央胡子再来扰乱，又怕保安队头头报复，不敢在家，今天看到人民的军队来了，积极要求参加人民军队。十四团的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把40名朝鲜族青年的保安队员改编为民主联军十四团警卫连第四排，从中选出崔南极、李峰担任正副排长的职务。

1946年4月末，牡丹江民主联军十四团三营（全是朝鲜族战士）再次进往梨树镇。以召集梨树镇保安队全体人员到自动小学开会为名，当双方把武器柏到操场上开始休息时，另一部分早已

做好准备的三营战士端来武装、架起轻机，宣布保安队被缴械。把保安队主要头头崔照禄、魏化南、李俊清、姜德谦等 到 场 逮 捕，将30余名队员送往宁安编人民主联军二师四团。

经查实，保安队主要头头崔照禄、魏化南、李俊清、姜德谦等，已与中央胡子取得联系，并约定进入梨树镇街里的时间和路线等，拟进街后将东进委员会除掉，由中央胡子扩充兵力争取东山再起，结果这一美梦般的计划，被人民的铁掌击得粉碎，几个主要头头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而结局。这就是本区历史上中央胡子进街的一段真实片段，记入史册上供后代了解掌握。

此材料经亲自参加战斗中的朝鲜族战士崔吉元同志和汉族战士纪洪德同志的回忆叙述，经整理写成。

鸡西地区日本开拓团的覆灭

李宝山

一、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统治集团就酝酿向外侵略，明目张胆地提倡：首先征服朝鲜，然后征服满蒙，从而征服中国大陆。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日本开始把魔爪伸入我东北地区，随后又通过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攫取了沙俄在华的一切权益。一九〇六年，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将旅大地区变成侵略我东北的桥头堡，建立了日本的海外飞地——“关东州”。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派遣移民，强占土地，掠夺资源。一九一四年，“满铁”实行“除队兵”移民，把铁路沿线守备队的退役兵组组起来，强迫他们在我东北长期定居。以后，日本关东厅又发放贷款，建筑房屋，购买农具，开发水利，种植稻田，在金州附近建立了“爱川村”移民团。一九二五年，又成立“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招募日本农民，进行大规模移民。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更加狂热地向我东北派遣移民。当时日本政府的拓务省，组织了专门人员，成立所谓“拓民土地调查班”，并委托专家学者对我东北农业状况、土地经营方法以及衣食住各方面开展研究，进行侵略性的考察。“满拓公社”（即“满洲拓植株式会社”）还以“商租”形式，用最低价格，强制“收买”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日本移民。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把“移民满洲”作为

一项重要国策，野心勃勃地提出，二十年内向满洲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口，要求土地面积为九千九百一十七万三千六百华亩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九三六年（昭和十年）根据关东军主办的第二次移民会议上通过的加速实施的决议，由广田内阁决定，作为重要国策而实施的。出席会议人员有关东军、陆军部、伪满洲国政府、满拓、满铁的代表和石黑忠笃、加藤完治等有关人员。这是世界殖民史上很少见的大规模的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这个狂妄设想，不只是要解决日本农村经济的衰退问题，主要的是要在二十年后，改变伪满洲国的人口构成，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成为日本人。下面是日本政府实施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迁入计划：

期 别	年 度	户 数	人 口 数
第一期	昭和十二年～十六年	100,000户	500,000人
二	十七年～二十一年	200,000户	1,000,000人
三	二十二年～二十六年	300,000户	1,500,000人
四	二十七年～三十一年	400,000户	2,000,000人
计	二十年	1,000,000	5,000,000人

（上表摘自伪《满洲开发论》）

实际上，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日本已派遣五批、二千八百户移民侵入伪三江省的桦川、依兰，伪滨江省的绥棱和伪牡丹江省的密山、鸡宁等地。

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日本移民团在东北各地已达四万八千零八十五户，十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六人。这些移民大部分是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他们来我东北定居后，自行组织村落，不受当地伪基层政权的管辖。开拓团内部，另有一套完整机构管理移民事务，并有自己的武装，俨然是“满洲国”的

国中之国，是关东军的别动队。据大连日本商工会议所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版的伪《满洲经济统计年报》统计，迁入我东北各地的日本开拓民分布情况是：

伪省名	集团户数	人 口	分散户数	人 口
三江省	7,008	21,564	904	20,433
北安省	9,745		364	
东安省	5,708	17,532	717	942
龙江省	4,763	8,079	253	455
吉林省	4,348	8,292	1,659	5,294
滨江省	5,904	14,752	1,012	3,126
牡丹江省	2,548	4,613	601	2,024
奉天省	41	144	180	675
四平市	166	470	197	853
兴安东省	425	888	42	98
间岛省	111	185	435	1,697
黑河省			92	182
通化省			44	155
兴安北省			48	122
安东省			139	527
锦州市			170	621
新京特别市			184	522
兴安南省			51	174
其 他			228	684

注：①集团：指集团移民，其中包括一般集团、特设集团、义勇队集团开拓团。

②分散：指分散开拓团，包括集合开拓团、义勇队集合开拓团、铁道警卫队开拓团和其他开拓团。

日本开拓团组成人员，各有不同。一种是武装开拓团，大部分由退伍军人组成，受关东军指挥，大都分布在国境地带，负有军事和特务任务。如入植佳木斯永丰镇的弥荣开拓团，就是由四百二十一名在乡军人组成的武装移民团。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他们接受日本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的送别，高喊“万岁”涌进“满洲”。

第二种是农民开拓团。这部分人大都是来自日本各县濒临破产的农民。日本当局以“开拓满洲”的侵略口号，强迫农民背井离乡，携妻带子，漂洋过海来到东北。他们也有武器，并接受军事训练。在日本军国主义临近灭亡时，开拓团的全部男人相继应征入伍。

第三种是招募青少年经过严格训练后遣送到满洲各地的。仅加藤完治等办的“农业学校”、训练所，就向“满洲”送了二十七万多毕业生。

日本的开拓移民输出，开始时是以开拓志愿者为对象招募来的，后期是以日本国内村屯为主体，强迫组织的集团拓殖，进入我东北后，建立分村，叫作分村移民，为补充人员，又从停业的产业中把转废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职业开拓民。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满蒙开发，派遣移民一百万户的侵略计划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困境。由于战局的扩大，日本国内推行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总动员，大量征集新兵投入侵略战争，再招募成年移民来中国已经不可能，便开始建立青少年移民制度。当年十一月，由日本农村更生协会理事长石黑忠笃、满洲移住协会理事长大藏今望、满洲移住协会理事桥本传左卫门和那须浩、加藤完治和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香坡昌康等人提出关于组建“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书，提交内阁总理大臣

近卫文磨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建议书中疯狂叫嚷“将满洲建成一个以日本民族为指导的五族协和的王道国家，给东方十亿民族作出向往的启示，断绝‘日支纠纷’的祸根，不能听任赤俄觊觎满洲国，更不能使民族协和的基础，出现缺口，为东方的永久和平奠定基础，日满两国命运和前途绝不能逆转，我等根据当前迫切局势情况的了解和需要，痛感目前有必要实行向满洲移民这一国策，势在必行。而且切实有效的方法，是组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特制定方案，恳请给予实施……”（摘自伪《满洲开拓史》）。根据这个明目张胆的新的侵略计划，日本开拓省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具体方案，经过讨论，即日通过决定实施。翌年十月开始募集，准备从日本全国各地招募九千名青少年。结果，应募者超过二倍以上，随之开始组建“满蒙青少年义勇军”。当年年底，早期派出伪北安省嫩江县的伊拉哈少年队和哈达河的山形少年队，以及第二年在城子河开拓团的少年队，都随之改为“青少年义勇军”。同时又从加藤完治的日本国民高等学校以及大谷光瑞在大连郊外周水子经营的周水子少年训练所中，选出十四岁以上的青少年，送往面对乌苏里江与苏联隔江相望的东部国境的饶河地区，正式成立了青少年义勇军，还把其宿舍命名为“大和村北进寮”。

总之，从一九三二年送出的第一批弥荣开拓团开始，接着，又分第二批千振乡开拓团，第三批瑞穗乡开拓团，第四批在鸡西地区的城子河和哈达河开拓团，以及各种“少年义勇军”，连续向我东北派出大量的武装农民。这些人平时务农，一旦需要就武装起来，成为现役军人，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关东军。同时，还通过这些开拓民监视当地中国居民的动向，防止反满抗日的活动，他们也是不穿军装的日本宪兵。

二、鸡西地区的国中之国

在鸡西地区的日本开拓团，分集团开拓团和分散小型开拓团两种，第一批集团开拓团是于一九三七年进入鸡西地区的。据一九四〇年伪《满洲年鉴》记载：迁入城子河地区的有二百五十一户，并带有家属四百四十五人，以城子河为中心，分居七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改为日本地名，什么东山形、西山形、向阳、新日本、北上、镜泊、大道等名称，即现在的城子河、新兴、红卫、丰安、永红、永丰、东北段、一太保、红光等地，定名为城子河开拓团，团长佐藤修。

哈达河开拓团迁入一百六十六户，带来家属三百七十人。哈达河开拓团除本部外，还有十个部落，开拓团长叫贝沼洋二。开拓团设有农业指导员、畜牧指导员、警备指导员，并设有学校、医院、商店、粮油加工等专为开拓团员服务的机构。他们廉价雇用大批中国人，供他们种地赶车等劳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自成系统，不归伪政权基层组织管辖。

城子河和哈达河地区，是鸡西一带主要产粮区，它南临穆棱河，北接完达山脉，东西走向，地势向南倾斜，有肥沃的耕种土地，有充足的水利资源，是我中华民族用血汗开发出来的。由于日本开拓团的人侵，它变成了日本的海外飞地。

据一九四〇年四月“满拓公社”公布的移民团耕种土地的总面积，每年增加如下表：

年 代	城子河开拓团 (耕种面积)	哈达河开拓团 (耕种面积)
1936年	303.40町步	216.00町步
1937年	615.00 "	584.00 "
1938年	1,040.00 "	1,047.00 "
1939年	1,680.12 "	1,256.20 "

注：日本一町步等于99.20公亩

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满农业移民情报》公布的城子河、哈达河两个地区的年收获量如下列：

品 种	耕 种 面 积		总 收 获 量	
	城 子 河	哈 达 河	城 子 河	哈 达 河
水 稻	160.00町步	91.00町步	2,520.00石	2,734.00石
大 豆	94.00	137.31	816.00	2,746.00
大 麦	39.00	90.92	885.00	1,363.00
小 麦	89.10	91.74	801.90	594.91
高 粱	10.00	10.15	100.00	230.20
苞 米	10.00	7.70	121.00	92.40

以此为基数，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两个开拓团，从这块土地上掠走水稻36,778石，大豆25,144石，大麦15,736石，小麦9,777石，高粱2,310石，苞米1,493石，共十万石，这还不包括逐年增加的耕种面积所产的粮食数。

在鸡西地区，除城子河、哈达河两个集团开拓团外，还有分散的开拓团。一九四〇年四月迁入柳毛、钏路地区的有二十四户，九十七人，开拓团团长是金野善吉；迁入兰岭地区的有二十七户，七十九人，团长是远藤三百一。同年十二月，迁入梨树的凤山、青森地区的十七户，六十六人，团长是阿部重雄。一九四一年四月，迁入平阳地区的四十户，四十六人，团长叫坛上忠彦。一九四二年迁入碱场村二十户，一百多人。这样，鸡西地区除矿区、铁路沿线住有大量日本人外，到处有日本开拓团，并且不断扩张。据满拓企画委员会的调查（载自伪《满洲开拓论》），全满洲各地集团开拓民每户平均耕地扩张情况如下：

年度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1933年	0.80							
1934	0.88	0.40						
1935	1.90	1.57	1.46					
1936	3.23	3.36	3.65	1.09				
1937	3.38	5.29	6.65	2.07	1.34			
1938	9.15	6.65	8.20	3.65	4.13	1.60		
1939	9.21	9.40	7.40	5.70	5.78	2.85	2.61	
1940	11.98	12.40	9.86	7.73	6.26	4.63	3.31	1.39

为了弄清日本开拓团的内幕，现把日本开拓团成员笛田道雄记录整理如下：

名 称：集团第四次哈达河开拓团

所 在 地：满洲国东安省鸡宁县

在籍团员：一百七十八人（昭和十二年当时）

团 长：贝沼洋二

干 部：农事指导员：得能后任为山崎

警备指导员：辻质平

保健指导员：福地靖

畜牧指导员：野寺梅吉

部落构成如下表：

部落名	出身县名及人员数	区 别
北大营	哈尔滨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学生佐贺、 岩手、长野、宫城12人	一 区 (先遣队)

武 野	东京多摩川，农民训练所出身 23人 友部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出身 3人	
东 海	盛岗第一拓殖训练所出身 18人 官 域	二 区 (本队)
东	埼玉、千叶、神奈川、群馬、 14人	
新关东	茨城 历木 17人	三 区
福 岛	福岛 14人	(本队)
宙 傍	鹿儿岛 佐贺 长崎 宫崎 大分 德岛、高知、香川 19人	
白 川	熊 本 13人	四 区
长 川	长 野 28人	(本队)
黑 川	新潟 静冈 山梨 28人	

以后，山形少年队开始入植。另外，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北海道实验农场十四户，还有由亲友介绍加入的东哈达开拓团。这个东哈达开拓团，接受资助金，单独成立开拓团，在运营方面，还是属哈达河开拓团。

开拓团本部的附属设施有事务所、会议室、仓库、邮政办事

所、精米所、酿造所、榨油所、锻工所、蹄铁所、铁板加工所、招待所、本部职员住宅、哈达河病院、兽医室、卖店等为移民们服务部门，应有尽有。

开拓团的部落建设，是在开拓团来东北之前，通过“满拓”强制收买国境沿线的大片土地，包括村屯的所有住宅，把原住中国农民赶出他们的世代祖居的地方，强行归乡并村。腾出的房屋，就成了日本开拓团员的住宅。如哈达河开拓团本部地址，就是大地主曹家的庄园，群众叫作“曹家大院”。

当时建立的部落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分散式的叫做“分散体制”，一种是集团式的，也叫“密集体制”。集团式的部落建设（开始为四栋八户，后为一栋三户），是以住宅群为单位，周围筑成外墙，前后有大门，墙高二米，宽两米，墙外侧挖有二米深的水壕，土堤上边设有刺铁线，成为坚固的堡垒。各家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各部落之间大约相距二十米到五十米之间，周围有宽敞的空地。这种集体式的部落建筑，主要是为了防止抗日队伍的袭击。是开拓团初期建设村落的“安全”措施。在他们认为形势初步稳定，这种集团式建设，就暴露出弱点。它把人们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各家之间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引起邻里间的不合。因此，以后建筑住宅，大部分在分给自己的土地中间建造自己可心的住宅和畜舍，逐步形成了分散式住宅。开拓团也鼓励各部落建造个人家庭住宅。这时，一阵风式的大造房屋的浪潮，开始活跃起来。建筑用的木材，附近森林很多，他们从距林口十五里的山间密林中采伐，石料都是附近小山上的，烧砖烧瓦等劳役大部分是开拓团雇用中国劳力来完成的。哈达河开拓团副团长上野胜在一九四〇年建造的住宅，有两间卧室，是在火炕上面铺上木板，再放上草垫子的日本式卧室，还设有日本型的厨房、浴池、便所。这样舒适的住宅，在当时日本本国农村，也是为数不多的。

日本开拓团也把他们的天照大神请到开拓团，在开拓民居住的附近，建了神社。哈达河开拓团在举行神社“开光”仪式时，从日本伊势神宫请来神位，命它为哈达河弥荣神社。每年举行祭日，也是日本开拓团的狂欢节日，并邀请警察，伪满国军，自卫团长等上层人物参加仪式，还强迫附近中国农民参加。

为解决开拓团员的婚姻问题，日本当局曾大力宣扬开发满洲，作开拓团员的妻子，是光荣的。所以在日本国内“大陆新娘”

“开拓新娘”之风盛行。一九三八年八月，哈达河开拓团上野胜和菊枝就是由县的社会科介绍，在日本国内结婚的。在结婚的仪式上，新郎穿国民服，新娘穿女子青年团的制服，很有气派。县知事，县学务部长也出席仪式，在联合妇女会馆举行，这在熊本县还是第一次。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了“红太阳的结婚式”“赴满开拓团的花姑娘”的消息。哈达河开拓团笛田道雄的妻子米子是“前往大陆，当新嫁娘”的。当时，笛田道雄在开拓团蔬菜组负责，因工作太忙，离不开身，是委托在这个时候回国迎接家属的丸山久三郎，把米子接来的。新娘米子除了带自己的嫁妆和随身衣物外，还给未见面的丈夫买了许多书籍。这时开拓团长贝沼洋二也结了婚。随后远藤久义、及川赖治也把新娘接来了。截止一九三八年底，哈达河开拓团迎接家属工作基本结束。

随着时间的转移，开拓团家属、孩子们增加，开拓团又开始建立学校。当时教育行政权归属于日本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兼）。根据全权大使训示规定，其教育方针是：一、教育要以天皇勒令和旨意为根本方针。二、彻底实现日满一德一心。三、大和民族真正取得其他民族的依赖，加强品质和实力的培养。四、养成朴素坚韧不拔的精神。五、启发学生积极学习技术技能和保健知识。用以培养所谓高贵民族的优越感，培养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的接班人。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开始，日本开拓团学校名称与日本内地一样，废除寻常的小学校，改为国民学

校。哈达河小学改为校“哈达河公立在满国民学校”。这个学校，座落在哈达河大地主的曹家大院里。四周是用土打成的大围墙，四个墙角都设有炮楼，朝南面房檐下有大门，院内的右侧是哈达河开拓团本部，左侧是哈达河桑常小学校。墙上还挂着“帝国在乡军人会东海分会”的墨笔大字的大厚木板的牌子。小学校开始是与团本部和在乡军人会在一起的。以后学生逐步增加，又在团本部的西侧小山岗上新建了校舍和寄宿舍。工程结束时，还举行盛大的落成仪式，这个新学校，据说在开拓团办的学校里是全满一流的。这个学校开始只有一个教师，叫吉田，他担任小学一年到高小二年级的课程。学生大部分时间是自习，全员住在宿舍，男女生分住二个房间，和团本部的人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以后搬到新校舍，又从开拓团员中选出一人担任学生生活指导，并任命两名教师，一个是佐藤，一个是佐佐木，校长是高田成章。高田校长调到北安后，继任校长叫卫滕通夫。他到任后，由于火墙太热，引起火灾，造成烧毁新校舍的大事故。当时，这是开拓团的一件重大损失，他流着眼泪向开拓团长请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学生们的学习任务被放在次要地位，开始参加动员“粮食出荷”、“勤劳奉仕”，给应征家属干活。卫藤校长在任五年迎来了日寇投降后的麻山的悲剧。他亲手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处置了，他所保护的学生也在麻山死掉了。后来，他回到日本，以“加害者”的罪名成为被告。一九六六年夏病死。

三、霸占土地与种种剥削

日本开拓团是武装移民集团，带有屯田兵性质，其占用土地，绝大部分是由“满拓”以强迫手段低价收买中国农民的。在日本开拓团入植当时，北满一带的土地价格，每垧既耕地为十元

至十八元，荒地一元以上。可是日本军方和官办的“满拓”强行收买时，不论现耕地还是荒地，一律按一元收买。后来，从一九三四年起，日军把土地收买业务，交给了伪满政府。伪满政府定的土地收买价格是每垧荒地二元，熟地二十元。实际收买时，又把荒地和熟地合起来算每垧只给四元二角。据曾给开拓团当长工的赵玉杰回忆，一九三二年满拓收买土地每方（四十五垧）熟地只给二百五十元，撙荒地仅给二元钱。由于这种强抢、霸占，夺走了中国农民的饭碗，因而在东北地区，经常发生中国农民反抗日本开拓团的事情。一九三四年发生的“土龙山农民暴动”事件，就是中国农民反抗日本开拓团强征土地的典型事件。土龙山的农民暴动发生的原因是伪依兰县公署遵照日本人的旨意，多次为日本移民抢占土地，收缴我民间武器。同年夏季收缴了湖南营和孟家岗的部分地照，秋天又在各保进行私枪登记，准备缴枪。这时，土龙山的农民愤怒起来了，在土龙山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联络各保发动武装暴动。五保群众在井振清父子率领下开始造反。当地豪绅谢文东利用这一契机，钻进暴动队伍，夺得暴动的领导权，围攻了日本千振和弥荣开拓团。关东军饭冢大佐率人马，向土龙山进攻途中，被暴动队伍包围在土龙山的峡谷中。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了日本黑龙会健将、两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饭冢大佐、铃木少尉以下二十一人，俘虏了伪军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参谋，打死了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等人；同时打死开拓团五人，重伤五人。事件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大，却严重动摇了日本开拓团员的情绪。用当时开拓团负责人的话说是，“危及开拓事业的前进”。哈达河开拓团长贝沼洋二深怕“土龙山事件”在哈达河重演，便极力鼓吹“农民无国界”，“五族协和，开发满洲”用来麻痹我国农民。城子河开拓团长佐滕在《农业与经济》中写道“收买土地问题，是最伤脑筋的一件麻烦事，特别是涉及房子的收买，把当地人动员到边远的地方去，弄不好就要出

乱子”。哈达河开拓团的上野胜说：“中国人表面上装作平静，没法子，可是许多人在内心存在反抗情绪”。

在哈达河开拓团中，开始时是禁止开拓团员雇用中国农工的。后来，随着日寇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大部分青年开拓团员被应征入伍，家中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不雇工是种不上地的。一些在开拓团本部工作的人，家里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同时，雇用农工可以不劳而获，这自然是侵略者乐于干的事。所以当时家家都雇用中国农工，不少开拓团员实际上变成了经营地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由于土地被满拓强占，失去了谋生的土地，也只得出卖劳动力。这就为日本开拓团使用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大批雇用对象。同时，中国农民为日本开拓团当农工，还可以减轻或免除部队征用义务劳役，所以，到日本开拓团当长工、打短工的中国农民越来越多。

日本人除雇用中国农民作劳工外，也出租土地，收实物地租。当时哈达河开拓团的地租标准是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用开拓团员的话说是“一半一半”。借用耕畜、种籽、农具等，要交百分之四五的租金。开拓团还经常强迫中国农民做无报酬的公务劳动和无代价的家庭帮工。在殖民统治下，中国农民不仅是日本开拓团的剥削对象，还是日本殖民者任意驱使的牛马。

本文作者曾访问过当时给日本开拓团赶车种地的吴玉发（现住哈达河村、八十五岁）老人。他曾给开拓团的十几户日本人赶车种地，干了七、八年，到头来连个老婆也没娶上，打了半辈子的光棍，解放后才成家立业。在哈达河居住的佟双臣，原来家里有四、五方地。日本人实行归乡并屯时，硬把他家的土地以每垧三元的地价强行收买，把他的房子也给烧掉了。没有办法，他只得租日本人高桥家的地种，每垧地收成二石，要用一石交地租。曾经居住在哈达河的李奎恒（现在城子河矿区居住）说：“日本人熊人的办法可多了，租了他们的地，除了要地租，还得给他干零活，年节还得送礼，不然，来年就不租给你地种。他们也放高利

贷，出租马车。农忙时用人工换马工，他要多少就得给多少。农民王国祥说：“谁家的猪、鸡跑到日本人的地里，不是罚款，就硬扣下牲畜。小孩到地里拣野菜，被他们看见也是非打即骂，无处说理。”日本开拓团不但占有耕地，周围山林也归他们所管。中国农民冬天上山打柴，拾些树枝，日本开拓团看见就没收，强迫把干枝送给他家。谁要得罪日本人，就说你“反满抗日”，抓进宪兵队，在政治上，中国人的一切行动，都要受日本人的监视。稍有不满意或有反满抗日活动，就会被逮捕监禁。原哈达河地区的屯长李奎一，由于对日本人侵占他的房子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半夜抓走，一去杳无音信。

日本军国主义对英美宣战以后，关东军更加紧对我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对开拓团提出了新要求：“一、领会宣战大诏的意义，了解皇国圣战的真谛，树立必胜信心，坚持磐石般的态势，共同向附近原住民宣传圣战的意义，负担起收服民心的重任，以实现民族协和的核心作用。二、促进实现战时国家对粮食、饲料增产的要求。三、确保兵战基地的安全，协助皇军排除暴乱和干扰。”（引自《满洲开发论》：关东军吉本参谋长对开拓民的训话）这个训示要求在“满洲”的军、官、民三位一体来应付非常局势，作为增加农产品和军事上的协助，更加严厉的控制中国人，实现他们所谓的文化的、产业的，国防的三大侵略目标。

一九四三年，伪满洲国实行了街村制建设。这是与日本国内实施国家总动员邻保体制同时开始的。街村制，就是在归村并屯的基础上，以屯为单位实现更严厉的统治。农产品的增产和出荷，劳动力的动员和征兵的任务，都由屯长来负责督办。哈达河执行村屯制后，把哈达河开拓团改为哈达河村。开拓团长是当然村长，他的助理是原哈达河保长李奎一。各区长改为屯长，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担任。屯以下设“排”。这些伪基层组织，分头到群众中挖出荷粮，抓劳工，搞经济取缔，监视群众行动。他们敲

榨勒索，无恶不作。还以伪警察为中心，编成“出荷督察班”一个接一个地到农家搜查，把中国农民藏在炕洞里的种子都给搜出来强迫出荷，闹得土地都种不上。

为扩充“满洲国军”，对当地居民中的年轻男人，实行强制检查当国兵。当兵不够格的，就抓去当劳工、参加“勤劳奉仕”，强迫他们修国防公路、到矿山挖煤。真是闹的鸡飞狗跳墙，老百姓不得安生。给日本人干活的吴玉发说：“当时中国人真是活不了啦。我给开拓团当长工，就是为了躲避抓劳工。在日本人家里干，受他们的气，还可以混个活；若抓去当俘虏浪工人，那就是九死一生啦”。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是极其残酷的。川崎顺太郎在日本参院提出证言中，曾揭发在哈达河开拓团区域内建造飞机场时，屠杀中国人的情形时说：“在修建飞机场除大量使用勤劳奉仕的当地人劳工外，还使用从中国大陆抓来的俘虏，实行强制劳动。劳工和俘虏们的待遇，非常恶劣，一天只给三个窝窝头，他们只剩下骨头和皮，黑瘦如柴，五个人一组，用绳子拴在一起干活，由中国把头拿鞭子监工，强迫他们卖命。日本宪兵还不时督促把头。对逃跑的俘虏，毫不留情地执行枪杀。在哈达河神社的山坡下，有俘虏居住的席棚，他们因营养不良加上疲劳过度，接连不断地倒下去，死人的尸体，扔在山里，散发出臭气味，巴布岗森林地带的狼，每夜都来到这里抢食尸体。随后，附近家畜常被狼吃掉，甚至活人也被狼袭扰，人们都相互传告，禁止夜间外出，手不离枪的警戒。在这种情况下修建的军事飞机场，结果连一架飞机也没有落过”。同时又揭露说：“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强迫征用劳力，急剧增加，修军用公路。到处检查街上走路的中国人，遇到没有居住证明的人，就抓起来，用汽车载走，去当劳工。这种作法叫作“劳工狩”。在国境地带建筑军事工地使用的劳工，在劳役结束时，为了军事保密，就密秘处死。美东军对当地人残酷的迫害，真是令人发指”。

四、侵略者毁灭的炮声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法西斯彻底垮台，宣告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把强大的兵力，由欧洲战场输送到苏满国境上来，其兵力达一百五十七万多人，火炮、迫击炮二万六千多门，战车、自动炮五千五百多门，飞机三千四百多架。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宣告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八月九日，派飞机轰炸了“新京”和哈尔滨。在这之前，日本当局也看出苏联的进攻已是不可避免。

一九四五年七月，关东军发布紧急总动员令，对在满洲的日本在乡军人和壮年，几乎全部发出了召集令，并立即把他们配备在国境线上。秘密地进行了最后的战斗布署。准备撤出主力，选择向连京线（大连至长春）以东，京图线（长春至图门）以南的山区集中，引诱敌人进行歼灭，从而进行长期持久战。并准备在通化建立关东军的作战司令部，作为关东军的最后坚守地区。但由于苏军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关东军的坚守阵地的计划毁灭了，开始不顾一切的仓促逃命。原来计划在撤退主力时，把开拓团全部划到保护圈内。但最后还是把开拓团全划到连京和连图线的外侧位置上，使其处于国境附近的危险区域内。因此在关东军撤退时，剩下了一百三十二万日本居留民，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开拓民。战后，原日本大本营作战课长天野正一少将在议院回答质问时，作了下列申辩：“如果从国境线把开拓团迁出，会引起内外动荡不安，也会引起苏联对日作战的导火线。而且，如果在战前首先把一百三十二万居留民送归内地，运输船舶也办不到；如果往朝鲜遣送，恐怕不知什么时候，苏联把朝鲜必将战场化，也难免遭难；同时，必要的粮食也没有希望解决。”（引自日本战历丛书《关东军》）

伪满的开拓总局、日本的拓务省也都没有撤出开拓团的安

排。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关东军，都是存心要丢掉他们的居留民。忠于日本天皇、依靠关东军为靠山的日本开拓团本身，却不知道他们被遗弃而面临灭亡的命运。

哈达河开拓团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入植，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日本的小天地，家家过上了驱奴唤仆的殖民者生活。因此，团员们准备在一九四五年秋后筹备举办“开拓团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开拓团彻底垮台的日子已经降临。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早晨，哈达河开拓团的人们在安静温暖的家庭中苏醒过来，有的在鸡鸣犬吠中，赶着牛出了庄院，有的妇女开始做早饭。炊烟袅袅，一派升平景象。刚刚担任副团长的上野胜家里，住着前一天来的南乡开拓团A某，在床上刚刚睡醒，就听到远方有爆炸的声音，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是飞机来了。随着爆炸声走出门外，他看见在黎明前的东方，出现了飞机，顺着军用道路上空，向平阳镇方向飞去。这时人们都跑出来，惊恐地听着飞机的轰鸣声。

吃完早饭，还未到上班时间，许多团员就急忙去本部事务所，登上山岗，在墓地附近瞭望飞机场，没有任何变化，大家抱着怀疑态度，走进本部办公室，室内有几个人在一起小声议论，感到气氛不一样，不久有人说：“我认为美国的舰载飞机、从冲绳或者从北海道附近飞来的，也许是从北中国基地来的。”头两个月，冲绳已被美国占领，在这期间，日本有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有人听说要从日本向满洲开拓地疏散人口。为了这个原因，人们不管白天黑日的增产，准备迎接疏散人口。当他们看到飞机时，有人怀疑九州、北海道已被占领。现在怎么办？大家在议论。这时，贝沼团长走过来，急忙打电话，但打不通。他便对大家说：“我到警察队长那里听听情况。”说完就大踏步地走了。

在贝沼团长打听消息时，东海警察队长本村辰二，对当时的事态作了如下的分析：“在七月左右，苏联对无线电波就有干扰的预兆，进入八月更加严重，简直就不能收听，根据苏满国境各

种情况综合判断，都是使人不安的消息，这种状况对于国境监护人来说，应当有所认识。内心一点不能动摇，如果发生严重局势，由于职务关系，顾不上家里一切，听从命令，采取行动，为了应付局势，加强训练家属，操练手枪和护身技能，以及自决的方法。在八月九日早上，听到金属的爆炸声，飞机在哈达河上空盘旋，联想到苏联飞机不法入境，在进入防空监视状态的同时，向县警察本部报告情况，随后，本部通报了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被苏联单方面撕毁，同时公布了宣战的通告。头一天晚上，在南方苏满国境的沼泽地带，发现许多青色的信号弹升入天空，许多间谍潜入各地无法阻止，最后唯一的通讯设备的警备电话，也在哈达岗附近几处被切断，开始与本部断了联系。黎明时，从东部国境方面，飞来了苏联的轰炸机群，向平阳镇我方物资仓库，进行波浪式轰炸，火焰上升，时时听到物资库自身的爆炸声。（引自本村辰二《我的六十五年》）他的手记说明，他已感觉到局势在恶化。这天，警察本部派来汽车，命令日本职员家属乘车逃避，本村辰二接到指示：表示“作为警察官，要维护日系住民的安全和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警察官只顾自己家属逃避，是良心所不允许的。”因此，本村辰二只得和开拓团共同行动，他的妻子却坚决要和她的丈夫在一起，结果汽车开走了，他们没有走成。随后又接到鸡宁车站站长的通知，商量与车站的日系职员一起，乘最后一次火车逃避，结果也没有实现。从此，他和哈达河开拓团的团员和家属，开始走向徒步跋涉的逃亡道路。实际上，这个警官不但未能保护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而且连他三十岁的妻子、七岁的长子公一郎，五岁长女昌子和三男明之辅，也都暴尸在中国的东北大地。战后他只身一人逃回日本苟延残喘。

八月九日贝泽洋二打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回到开拓团本部。他知道飞来的飞机是苏联的，也知道苏联军队突破国境线，

而且各地都在纷纷逃难。但他没有接到鸡宁县长的指示之前，只能采取应急措施，组织青年学校学生，担任警备联系，动员当地的自卫队员和警察，维持治安秩序，不时的与本村警察队长协商，同时，派本部勤务员到青年学校学生家联系，派团里仅有的一台汽车 驰向离本部很远的南乡开拓团去接军属，又到日本国民学校找校长卫滕通夫，校长出差还未回来。后来从永安逃回来的校长卫滕通夫，向团长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我带领四名 学生，出差到东安，领取教科书，按预定时间七点左右，从宿舍出发，到达东海车站，听说昨晚附近永安火车站，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据站长讲受害很少，我们乘上迟到的火车，三十分钟后，到达永安站瞭望被炸的情况，站前的电杆东倒西歪，电线散落在地，从东方发亮的山岗上，放出耀眼的光亮，皱着眉遥望天空，看见飞机一架、二架……向这边飞来。毫不怀疑苏联飞机马上就要袭击我们坐的火车了，我当即命令学生，躲在座椅下，四个学生立即躲了起来，机关枪的哒哒声，子弹打在车厢上，我们非常紧张，十分钟左右，车厢里出现数人伤亡，火车开出又立即返回来。苏联飞机连续轰炸，我们结束东安出差，领着学生紧急徒步走了十二公里返回哈达河。”听到卫滕校长的报告，大家都感到局势严重。开拓团本部乱成一团，开拓团一切正常工作也无法进行。急忙通知各区长，到应征家属看望，要求她们在自家待命，等待指示。

这天晚上，两名青校生背着枪到上野胜家送来了团长的信，信上是县里发来的撤退命令，要求不带东西，准备好粮食，坐各家的马车，连夜向鸡宁方面出发。集合地点在长野区十字路口石房子附近。信上附记“请您把家属安排好，委托给深渡濑君，急速到本部报到。”上野胜马上给深渡濑写信，拜托他照顾家属，然后他把信交给青校生，接着给妻子留下便条，要求：一、做一天吃的饭团；二、要带好冬衣，夏衣装在柳条箱里，装不下就把

夏衣留下，三、带一组小型炊事用具；四、要把大米、面粉，调味料都装在麻袋里；五、要准备带领孩子出发。并说：“我可能在本部不回来，深渡濑君帮助装车，如果东西过多，应适当减少。”随后他换上在乡军人会的训练服，穿上胶鞋，打上裹腿，挎上子弹袋和枪，装备齐全开始出发。这时，在平阳镇方面，还在燃烧着熊熊烈火。上野胜到开拓团本部时，在本部团长室的椅子上坐着樱井指导员和四、五名青校生，上野胜感到这里好象军队的卫兵所。担当本部联络员的纳富藏善，对本部这种紧张情况，作过如下的记述：“团长招呼我们说，全体都往鸡宁撤退，你们青校生二人一组，分别往各部落去，”我们拿着撤退命令，向各部落奔跑，谁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宣读命令。回到本部，天已经黑下来，在昏暗的油灯下以团长为中心，还有福地医师，本村警察队长和其他二、三名干部，继续讨论如何行动，我们也加入协商。讨论的内容是把宿舍的孩子们送回他们自己家去，把仓库里的粮食取出来，把重要的文件、武器控制起来以及对当地人的今后安排问题。晚九点召集当地人村落的屯长，收集武器，最后团长讲话，“我们为了与苏联打仗，要到鸡宁集合，我想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当然是日本胜利，然后再回到哈达河，再和你们一起建设村屯，你们也会想到可能遭到苏联的迫害，必须为了胜利，要顽强战斗下去，本部仓库里有粮食，我们都是好朋友，分给大家吃吧。”接着他又写道：“我们除了警备以外的人，把学校的武器分解开投入井里，把在团长家准备撤退的一切文件烧掉，又往汽车上装东西，非常忙碌，半夜十一点左右，撤退的马车，开始从本部门前走过。”（引自《麻山和青年学校学生》一文）从此，日本人精心经营的哈达河开拓团宣告垮台开始走向逃亡的道路，从此哈达河周围被日本人占据的土地，房屋等等全部物归原主。

哈达河当地的农民们，在八月九日苏联飞机轰炸平阳镇的时候

猴，人们就互相议论，苏联军队要打过来了。曾经由山东“下关东”来的老王头，回忆一九〇五年在我国东北地方发生的日俄战争时说：“小鬼子和老毛子，是宿世的仇敌，那次战争小鬼子把老毛子打的很苦，这回该老毛子打小鬼子啦。”当时给开拓团山口家赶车，现在哈达河头段住的吴玉发，听到八月九日晚上开拓团各家一宿都在忙忙碌碌，孩子哭老婆叫，吵吵闹闹，心里纳闷，认为可能出了什么事，十日早上，天还未亮就起来，照例到山口家准备赶车时，车马没有了，人也不见了，只看到日本人家养的狗，惊恐的嚎叫，好象是说日本人把它扔下不管。这个不忘旧主的狗，还在看守这个没有主人的家。他急忙又到其他日本人的家里，有的家开着门，桌上还放着饭碗筷子，破乱东西扔的乱七八糟。有的家关着门，院里鸡猪乱叫。这时有人喊，“日本人全都土豆子搬家滚球子啦”村里的人们，都三五成群，围在一起互相议论起来，有人说“日本人跑了，这回可再不受日本人的气了，他们的土地也背不走，今后该咱们种自己的地啦。”青年农民牟其林（解放后在东海区工作，后调鸡西县委任组织部长，现已离休）告诉大家：“日本人跑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咱们的，谁要用就随便拿吧。”开始人们还不托底，经他一提，提醒了大家，都动起手来。当时，人们称作王光腚的青年和一犄小伙子，跑到日本神社，把大门砸开，拆了门窗，有的人喊：“把兔子庙烧了吧，叫天照大神和日本鬼子一起升天吧”！一会儿，日本鬼天天祭拜的神社就烧得片瓦无存。这是中国人积存十几年的愤怒，是一种民族感情的表露。小孩们也到日本小学校内，把书桌和椅子都搬走了，有的孩子把操场司令台上的旗杆搬倒，扛回家去架猪棚子。当年中国人不敢随便去的地方——开拓团本部所在地的曹家大院，这回也热闹起来，木牌子被砸了。过去经常挂在空中的膏药旗，被人们撕下来，拿回家去做抹布。一九八七年深秋，作者走访旧日开拓团本部时，姓王的老人告诉说：“这个大院，光复前

是土围大院墙，周围四角有炮台，大门一边挂日本在乡军人东海分会的牌子，一边挂着开拓团本部的大牌子，可威风啦。”现在，一切陈迹已不存在，这个当年地主大院，日本开拓团的指挥部所在地，现已改建为八五一〇农场的玻璃厂，工厂的烟囱高高耸立，在新建的楼群后面，一座当年的旧房（现作仓库）还歪歪扭扭地存在着，好象有意留下来，让人们回忆当年的岁月。

中国人民开心之日，也正是日本侵略者难受之时。过了两天，从密山方面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日本兵，低着头，有的还缠着绷带，象失了魂似的，在苏联红军的押送下，一队队向牡丹江方向走去，其中也有密山、永安等地的日本开拓民。在从鸡西到柳毛的大道上进行有一队日本俘虏哭喊着呼口号，好象要暴动，被苏联兵用盘枪一阵扫射镇压下去弃尸在道旁。。有的日本零散军人背着枪到处乱窜，被仇恨入骨的矿山工人夺过武器，用镐把打死在山间和道旁。昔日的关东军，成了丧家之犬。

由于日本关东军的溃败，居住在东、北满一带，特别是散居在苏满国境线周围的大批日本开拓团，在苏联飞机轰炸和苏军的进攻下，全部溃散，他们丢下了在满洲积累的财物，逃出了经营多年的安乐窝，携妻带子，慌忙如丧家之犬，开始逃亡。在铁路沿线和闻讯较早的开拓团的人们，在苏军进攻前，就争先恐后，登上逃难火车向南满方面逃避，当时在鸡西地区的城子河开拓团以及永安和黑台一带的日本开拓民，都乘火车纷纷逃离。而远离铁路交通线或接到撤退命令较晚的人们，只得乘马车和步行，慌慌张张地走上艰难的逃亡之路。

五、灾难逃亡的路上

八月十日，太阳刚升起，一百八十多台马车，一千三百多人的长长行列，慢慢爬上哈达岗的山梁。从哈达岗走到接近城子河

地区，悠悠的穆棱河水流淌着，远方有四百三十二公尺高的鸡冠山，鸡冠山的那边，就接近苏联的国境线，人们心惊胆战的默默地前进，盼望着得到关东军的保护。在这个哈达河开拓团的长长队伍中，除哈达河开拓团的人以外，有与笛田道雄在哈尔滨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同来的先遣队，入植到北大营区的远滕久义，还有领导新哈达河。新泻部落的应征家属的及川赖治，还有不少掉队的妇女。哈达河开拓团的副团长、负责团的西部地区运输任务的上野胜，从后边赶来，有两台马车装着物资和坐着小孩子们，其余大部分人是徒步行走。队伍的最后是北海道实验农场的横关妇人，赶着两匹马的大车，拼命地赶上来。北海道实验农场的北海区，是在哈达河开拓团的东北部，他们好不容易到本部集合，但大队人马已出发了，他们马上赶路又追了上来。

哈达河开拓团的队伍经过城子河矿区时，由于宪兵队经常逮捕中国工人，强制抓劳工进坑挖煤，强迫出荷粮，随意打骂工人，出于民族仇恨，这个地方集起了许多矿工和附近农民虎视眈眈地盯着日本人行走的队伍，用憎恨的表情议论着。开拓团的队伍，小心翼翼地前进着，不断警惕地小声喊：“不要落后，不要间断，不要离开队伍！”不久，从平阳方面开来一列火车，它刚刚驶近穆棱河铁桥，后边传来轰鸣声，一架苏联飞机直向火车飞来，又是轰炸又是扫射，在火车过桥的同时，轰的一声，铁桥的一端冒起了黑烟，奔驰逃难的火车刚刚过去，铁桥就炸断了。从此由密山通往牡丹江的火车，就成了伪满时期最后一次列车。

据上野胜的笔记里记载，从哈达岗到鸡宁的路上，苏联飞机，不断地轰炸，人们惊慌的奔走。他在笔记中叙述了这样一段情景：“博林妻子感到要临产，想在这地方找个空屋子生孩子，她丈夫说，不和大家在一起行动是危险的，互相争论着。我马上找到福地医师乘坐的团部汽车，要求照顾一下妇女临产。博林妻子一边哭泣，一边不好意思地说，‘留在空屋子里吧，这样的事

情……’在大混乱的时候要临产，真是生死关头，危险已极，就是平时，女人临产也难免恐惧不安，可以想象博林妻子当时是多么为难，真是灾难重重。“本村辰二在《我的六十五年》中也写了其她妇女在道边分娩的情况：“这个妇女，连支撑身体的力量也没有，在这时，只有她一个人倒在路边，真是痛苦万状，望着逃难的人流喊道‘别看、别看。’”

在苏联进攻开始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命令断绝了由密山往牡丹江的火车。所以，哈达河一千三百多开拓团的人们，不得不赶着马车，拉着长队，拼命的涌向鸡西，渴望从鸡西乘火车去牡丹江。

在鸡西火车站，许多人看到凡是从国境地区逃出来的都拼命争着上车。哈达河日本小学校女教师岩崎素实，谈到当时争先恐后上车的混乱局面时说：“那时谁也指挥不了人们的秩序，当时成了骨肉相残的斗争场面。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就是少数人上了车，也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和低空扫射，真是血肉横飞，哭天嚎地。”乘坐平阳站最后一列货车逃出来的高野准尉在他的《战败回忆录》中写道：“火车头和各节车厢，像蜂窝一样挤得满满的，我坐在货车门口的地方，曾三次被血浆滑倒，好不容易上了车，车厢里象个活地狱，人们垂死挣扎着，有的蒙着脸象死人一样。”

哈达河开拓团接到县公署简单的撤退命令时，他们认为到鸡宁一定备有避难火车，其实火车已经中断。当他们在哈达岗上空看到鸡宁正在遭受苏联飞机轰炸而火光冲天时，心才开始紧张。在临近鸡西街的时候，看到大的建筑物都冒着黑烟，在黑烟弥漫的天空中，又看到苏联飞机二架三架……向下俯冲投弹，真是魂飞胆战。城子河矿区、西鸡西车站也都遭到轰炸，靴鞢草沟的弹药库和兵营也起了火。他们开始绝望了。这时，从警察队那里传来了联络消息，由于鸡宁受空袭，停止白天活动，来连系的 T 警察

官，就是在三个月前到东海警察队赴任的本村辰二队长的前任，是哈达河开拓团人人熟悉的人。运输兵器和物资任务的团本部汽车，好不容易追上队伍，又传来了召集全体在乡军人的召集会，口头传达指示说：“今天到鸡宁的全体在乡军人，同时都被应征，要携带二、三天的粮食，协助部队担任城市防卫任务。”从团长到本部勤务员，所有男团员，都成了应征者。为了躲避苏联飞机的空袭，各部落把马车分散的隐蔽起来。男人们作好一切应征准备。目前这个逃难队伍最大的问题是男团员全部应征后如何行动，使许多妇女都陷入沉思，人们骚动起来。上野胜看见了自己的车马，拿出些白米和军用鞋，放在奉公袋里，一齐放在背包装在汽车上，妻子叫他吃饭，他一点也不想吃，静静地沉思。上野从团里出发时，把收藏的日本战刀取出来，交给爱好剑术的深渡濑正直。深渡濑正直接过刀说：“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上。”因为他正在手摇缰绳赶车，随手就把刀交给他的儿子正喜。这个正喜在两天后到麻山时，用这把刀结束了他悲惨而短暂的生命。

苏联飞机又来轰炸，这次是以从国境地区撤退的日本军的汽车队和逃难人群为目标，进行俯射。旁边传来“隐蔽隐蔽”的声音。上野胜立即跳到道旁排水沟里隐藏起来，马上机关枪的子弹打在草地上。苏联飞机三转两转寻找目标，来回的向马车队伍扫射。上野胜在手册《麻山》里写道：

“苏联飞机从头上发出金属的声音，马上吐出火光来扫射，一会儿上升，一会儿又下降，反覆扫射，拉车的马被打中，其他的马，也惊恐的拉着车奔跑，北海区的小川老人也被子弹打伤，这时谁都帮不上忙，避难的北海区佃君，在高粱地的垄沟里，把身子盖好，等待飞机飞去。我的妻子看见后，也把孩子埋在垄沟里隐蔽。仅仅十分钟的轰炸，好象过了许多小时，满身渗透了汗水，使人难以忍受。不久，飞机过后，车马被打得一塌糊涂，东

西到处散落着，完全断了气的耷拉着四条腿的马，还有的肠子都露在外边在血泊中喘气的牲口，那是潼泽君的马。背着小女儿的美智子，受了伤，孩子在背上不知打着没有，就是这样还想活着，跑到高粱地的深处隐藏着。炮弹不断咚咚的打来，机枪扫射，地里高粱叶子哗啦哗啦地落着，子弹乱飞，路上有的马不在意的走着，也有的往草地奔跑，我的一匹带着北海道马具的马，挣断了缰绳，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剩下的一匹马，回来的时候满身是血。在军用汽车上，并排躺着满身是血的负伤军人，在烈日下辗转呻吟，毫无抵抗能力，忍受着苏联飞机的扫射。”飞机飞走后，人们又出现在道路上。在这次轰炸和扫射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死亡，但依靠逃难的主要力量——车辆和马匹都失掉了，人们在徬徨失望的哭泣着。这时，去侦察情况的汽车回来报告：

“在鸡宁的日本人全部撤走，从久保田县长到兵事员，都乘最后一列火车走了，只剩下我们留在这里。”前来联络的T警官，也不知什么时候溜掉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提前乘火车逃走的。“他们跑的很容易，只把我们扔在这里。”大家开始动摇起来。带着沉痛面孔的贝沼洋二团长，提出下一步逃难地点是奔向林口，林口呆不住，再去牡丹江，按铁路距离到林口是八十公里，去牡丹江还有一百一十公里，人们都感到行路艰难，都在心里盘算着。

空袭时，横关夫人的两匹马的马车失掉了一匹，她的丈夫善春，由于马车震动，直喊伤口疼痛。看着患病的丈夫实在忍受不住，横关夫人同情而又怜惜的说：“伤口内部溃烂化脓，实在没有办法，把东西丢下，你一个人骑马走吧。”她让二女儿年子（十一岁）和小女儿美智子（六岁）坐在同村北海区的平岛金五郎的马车上，让三女儿春枝（八岁）坐在畑家的马车上，她领着大女儿八重子（十四岁）徒步奔走。

笛田道雄负责照顾的应征家属队伍，在空袭中失掉一台马车。七名妇女十七名儿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想把孩子们放

在同一部落的马车上，但遭到拒绝。因为各家马车上满装着各自的财物，谁都舍不得扔掉。借不到车，就得领着妇女儿童徒步走，剩下的一台马车，把东西扔掉，让孩子们串换乘坐。笛田夫人背着一个孩子还抱着一个孩子，笛田也背抱两个孩子。在夜幕下开始走上艰难的征途。这是他们逃出鸡西的第二天——八月十日。

开拓团本部汽车司机金某（朝鲜人）感到局势危险，趁混乱之际逃走了，会开车的及川赖治和马场荣治，接受团长的命令，登上驾驶楼，继续前进，马车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人们都在徒步艰难的前进。

哈达河开拓团离开鸡西，路过西鸡西的时候，就开始下雨，十一日午前太平无事，午后又下起大雨，夜间又连降暴雨，人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的奔走。八月的夜雨透骨的寒冷，妇女们用冻僵了的手握着缰绳，随着前边的马车轮声，摸黑向前移动。车辙深的地方，车轮陷进去，马车途中抛锚，进退不得。因空袭路上有直径二米多的盆状弹坑，马落在坑内爬不上来。与哈达河开拓团在一起的南乡开拓团高桥庄吉记录了如下避难路上的情况：

“队伍混乱，前后相距三公里长，由于深夜天黑，看不见目标，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惨叫声，原来有人掉在深坑里负了伤。路上桥梁被炸坏，前进中的人马停下来，弄得心身疲惫不堪，马车又不断出毛病，断了缰绳，用妇女们的带子和手巾代用。马车坏了，不能遗弃马车上的人们，只得丢掉车上的东西。可是由于马车超重，行路更加困难，随着贝沼团长发出就地停止前进的命令，大家全都在大雨滂沱中停立着，受着夜寒的侵袭，等候到天明。为了避雨，有的人盖着被子也都湿透流着水，孩子们又饿又冻，疲劳不堪的闭目无声的哭泣。”在鸡西空袭中失掉马车的笛田道雄和应征家属一伙人群，个个被大雨淋透，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的爬滚，好不容易跟上先头的队伍。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不断的赶路。一旦途中休息，那些妇女和孩子们马上倒下来进入梦

境。笛田道雄的妻子给吃奶的孩子盖上蒙布，也进入睡态，失掉马车的这个队伍，除了蔽雨的苫布外，衣服物品都没有了。母亲们在与大雨搏斗中精疲力尽，想起很长时间没有给孩子喂奶，当从湿透的背上卸下来，抱在怀里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断气。

八月十二日早晨，哈达河开拓团的人们，用疲倦的两腿又开始行动。在泥泞的道路上，从出发以来也没有喂过的马一点力气也没有，妇女们担心马车出问题，都下车步行，路上扔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有的老年人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佛龕和被褥也都扔掉了。丢了马车的人，背着东西，拄着木棍一跛一拐地跟在队伍后边，小孩们哭喊着跟着大人连拉带扯的奔波。队伍已经非常混乱。从国境线退下来的汽车，超越开拓团的队伍，零散的日本兵也越来越多，他们在开拓团的队伍中，满脸阴沉的默默穿过。

笛田道雄和妇女儿童队伍，落在最后边，笛田夫人还装作振作的样子，不断地鼓励大家快走。笛田道雄在他的《手记》中写道：“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穿着帆布鞋，开始穿的时候，起到保护脚的作用，可是后来擦破了肉皮，脚受了伤，肿的象棒槌一样疼痛难忍。也有的人从腿上流着血，不身临其境，不知道人们在困难中死里逃生的困境。”一些刚强的女人，也都一边流泪一边走路。高桥秀雄（满拓派的农事指导员）在他的《麻山的记忆》中写道：“妻子在泥泞的道路上，背着小孩，牵着黑川君马车的缰绳，呆呆的走过去，孩子们也没有笑容，在几个小时之后，就生离死别，成了隔世人呢。”

十二日十一点钟，前面的马车依次的停了下来，本部的汽车也停了下来。在道旁边有贝沼团长、福地医师、武田清太郎、马场荣治、及川赖治等人，正在紧张的研究放弃汽车的问题，高桥秀雄按照团长的命令，从汽车上把东西卸下来，装在马车上，分配由团购买部运来的粮食和日用品，又增加了许多枪支和弹药，在军用汽车的保护下，马车也不断的追赶上来。这时，侦察情况

的本村警察队长传来了消息，等候在那里的贝沼团长立即迎了上去，青校生拿出来军队的命令：“前面有优势的敌人在活动，日本军正在待命中，开拓团的男人，迅速前进，协助军队活动，把汽车烧毁，妇女儿童马上隐蔽。”团长立即下令，人们都上山里隐蔽。上野胜到山顶上去监视敌情，他在手记《麻山》中写道：

“激烈的枪声，象轻机枪的连发声，从后边来的一小队日本军，分散向前活动，可怕的战斗可能在战壕周围打起来，前边的高山上，是土匪还是叛军的阵地上，不断发射迫击炮的爆炸声，在群山中回荡着，前进中的日本兵，是否被发现目标，使人担心。”事后知道，当时突破东部国境线的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八月十一日拿下梨树镇，十二日立即到达麻山，十三日到达林口。哈达河开拓团已经全部被苏军机械化部队包围。

滴道野炮一二六连队同哈达河开拓团一起，十二日从麻山向牡丹江方面转移。四公里长的队伍，先头部队已进入麻山，后继部队包括连队的行李班和一群掉队的人，还在青龙附近的道路上前进。同一时间，哈达河开拓团，自然形成三个部分。笛田道雄率领的应征家属们，疲劳已极，变成寸步难行的掉队状态，是最后面的人。她们在下力气的往前赶。同时，由贝沼团长命令上野胜、高桥秀雄领导的妇女们隐蔽以及带着伤员和孕妇的开拓团医师福地靖，也到最后的队伍中来了，形成了最后面的后尾队伍。离这支后尾队伍约一公里的前方，是以贝沼洋二团长，卫藤通夫小学校长，本村警察队长为中心的中央队伍。南乡开拓团员也加入这个集体，将近四百多人。最前边的是象远藤久义所说的“由于我们在哈达岗遭突袭，没有马匹的，在避难中都先走了”的那一部分；在北大营区、东海区的应征家属们；以及纳富善藏的父亲、吉冈寅市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亩傍区的深渡濑正直、贝沼洋二团长夫人、上野胜的妻子菊枝一行。他们在中央队伍的前面约一公里，是开拓团的先头队伍。

据哈达河（南乡村）开拓团避难情况报告记载：“第五次南乡开拓团，是从宫城县远田郡南乡村组成的乡村开拓团，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刚刚到哈达河开拓团的。（地址在哈达河沟里的西北方面）。八月九日苏联飞机空袭时，团长皆川七之助（在沈阳避难民收容所病死）正在出差，团员们与哈达河开拓团一起避难，在藉人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止，有一百一十九人，其中十四岁以下的有六十二人。在麻山死亡七十八人，其他在避难途中和在避难民收容所死亡二十人，还有二个人下落不明。”

留田道雄最后一伙人到达麻山以后，在对面的山坡上，枪炮声越来越激烈，一二六野炮连队的三十名骑马侦察兵跑到山顶上，几分钟后又下来。在山坡的背荫处退下来的妇女们，躲避灼热阳光的照射，都在灌木林荫下蹲着。又有三十多名步兵的一个分队，脱了军鞋，换了胶鞋，好象是在准备突击，分队长正在向部队作最后杀敌的动员。笛田道雄在瞭望这难以想象的战斗景象，枪声依然在响，听惯了的耳朵，已经习以为常，在焦急的憔悴不堪的妇女周围，有着奇怪的寂静，都默默地等待着不幸的来临。军人仍用水壶喝着水，把背包卸下来放在旁边，分队长准许他们在这里吸烟，士兵们向开拓团的妇女们说：“婶子们，这里有面包，请吃吧。”可是大家谁也不动手。九山夫人和河横贞子拿出布包皮，士兵们把羊羹、牛奶糖、饴饼、面包等装进布里，又把菠萝罐头送给孩子们，方听到多日听不到孩子们的欢笑声，妇女们的脸上也浮起了微笑。当时笛田道雄看到这种情景，内心认为军队是否要求开拓团的男人协助打仗呢。时间已到了中午，这时在下边的公路上，高桥秀雄正在烧毁开拓团本部的汽车，这里除武器弹药外，还有一斗缶装的三十个小桶汽油，认为这些东西不能交给敌人，在福地医师的帮助下，高桥秀雄点着的汽油，烧起汽车来。

在笛田道雄等人避难地点前方二百米一段高地，是一片高粱

善，那里的山沟向北延深，是一片可以集中许多人隐蔽的地方。笛田道雄就照顾着妇女开始往那里移动。路上遇着扎着白头巾、挎着白带子骑马而来的青校生和纳富藏善。他们大声向笛田喊：

“团长的命令，请求后方待命的部队来掩护开拓团。”说完扬鞭打马而去。当笛田与部队的负责人说明情况后，却遭到拒绝。他们回答说：“没有保护开拓团的任务。”

六、集体自决的墓地——麻山峪

在后尾队伍集合的高粱地前一公里处，有一个开阔地，它三面被山包围，四周为灌木林所掩盖。开拓团的男人们把此地称之为“麻山谷”。“麻山事件”，就发生在这约有二百平方米，带有缓慢斜坡，也是比较宽阔而又可隐蔽的地方。它的右边有从沼泽地里流出来的泉水，在这个地方，是围绕以团长为中心的中央队伍所在地。在这里集聚了四百多人和二十台马车，在那山阴处，距离公路较远，炮火莫及，所以成为哈达河开拓团中央队伍发号施令的掩护所，是避难的安全地带。前方炮火连天，正在激烈的战斗。突然从前方跑来一个日本兵，着急的讯问谁是负责人，急忙说：“前方就是苏军的战车阵地，是敌我交战的地方，部队伤亡很大，千万别往前走”。贝沼团长听到这个消息，低头沉思如何率领人们渡过这危险的难关。许多妇女吓的面无血色。随后，昨天晚上开拓团一起由鸡宁赴牡丹江的一二六炮连的士兵们也撤了回来。有的士兵叙述他们与数十辆苏军战车遭遇、被打了回来，战车正向这个方面开来。同时从国境开来的坦克群，也从后面攻来，队伍已被包围，只有一条路，可往山里撤退，从麻山迂回，绕个大圈去林口，这是唯一的出路。开拓团员们惊恐万状，准备领着疲倦已极的妇女和孩子们脱离这个险地。日本军队一群一群

的散兵，已溃不成军，往林口方面慌忙爬山逃命。贝沼团长恳求撤退的日本士兵，那怕给一个小队也好，保护妇女们撤到较为安全的地带，但遭到拒绝。绝望的贝沼团长，仍再三致意，希望在后方的待命的部队来保护开拓团，但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们没有保护开拓团的任务”。纳富藏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团长怎么哀求也没有用。过于牢骚，也可能会象对待士兵一样，说你是国贼、叛逆，马上会枪杀你。现在想起来，那时军队要用宽大的心情，勇敢的接受开拓团请求，给予保护的话，也可能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在中央队伍万分紧急，贝沼团长一筹莫展的同时，从山上斜坡的草丛中，远藤久义、吉冈寅市急急忙忙跑下来，他俩是这个避难集团走在最前面的人，负责先头队伍的带头人。两个人脸色苍白，踉踉跄跄走到贝沼团长面前，瞪着眼睛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大家都集中恐惧的眼光看着他俩，不知出了什么事。两个人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报告说：“前面突然受到敌人的攻击，多数团员战死，有的逃散不知去向，男人们把自己的家属处置后也都散了。我们特回来报告。”大家突然听到这个恶耗，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的望着团长。随后只听到妇女的哭泣声，夹带着前方的枪炮声……。原来这些开拓团的先头队伍，在远藤久义、吉冈寅市和深渡濑正直等六、七个男团员，领着北大营、东海、新关东、亩傍，国州等地的妇女儿童，加在一起估计有六七十人。他们在离中央队伍前面约一公里的山坡上，这个山的下坡，就是麻山车站，他们的侧面遭到敌人的攻击，附近的山上，自动步枪象雨点般的射击，人们跑到那里，子弹就跟在那里。当时，男人们都只顾自己部落的妇女小孩，这是留下的男团员应有的保护她们的责任。这时贝沼团长的夫人君代，上野胜的家属兰枝，深渡濑正直一家，都在先头队伍里。苏联军队很快向先头队伍前进的方向包围，并开始扫射，团员们急忙把孩子隐藏在沟里，到处是鸣

鸣的哭喊声。不久听到深渡濑初子的喊声：“请军队帮帮我们吧！”反覆地哭喊着，可是谁也没有帮忙，她的丈夫深渡濑正直被机枪子弹打中，大量的出血，正在拚命的挣扎着，在先头队伍里的槇夫人说：“我们在高粱地里隐藏，石山夫人抱着孩子，那个长满胡须的深渡濑先生呻吟着要水喝，旁边他的夫人问谁有水，大声喊叫，深渡濑先生的肚子里露出了肠子，我马上把自己腰里的白纸卷拿出来给他夫人，听说折磨了半天，实在受不了，叫同伴开枪打死他，在爆竹般的枪声中，结束了生命。有的人什么也不顾，只是祈祷父母平安无事而喊着父母的名字。”子弹把青草打的东倒西歪，深渡濑初子又一次叫喊：“各位士兵先生，帮帮忙吧！”可是没有人回答，眼看着鲜血染红了的孩子们也喊叫：“军队叔叔，救救我们吧。撕裂心肺的哭叫，在炮声中淹没。深渡濑正直的儿子正喜，看到父亲和弟弟妹妹们都中弹倒下，剖腹自杀而死。至此，在麻山先头队伍里深渡濑一家九口全部死亡。在哈达河开拓团先头队伍的人们无路可逃的情况下，以武士道精神大肆屠杀妇女儿童的事件开始叫了。美其名曰“自决”，实际就是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孩子们。远藤久义在苏军的枪林弹雨中，吓的进退不得，他知道末日的来临，眼望着正在祈祷的妻子，用枪把她打死。本来，先头队伍是可以自行逃散的，可是远藤久义认为不能那样作，因为自己接受团长的委托，必须把妇女和孩子们“保护好”，决不能个人一走了事，而要采取最后手段——全部自决。所以趁各处子弹飞舞中，他不露声色的用枪把先头队伍中的妇女儿童一个一个处置了。远藤久义处置了相处多年的妻子的同时，又把长女（关枝十四岁）、次子升君（十一岁）、次女澄子（八岁）以及长子辉，。田村恒夫的妻子等三人，也送上了死路。在同一个亩傍区的吉川清涛，也把他的家属秋乃（三十五岁）、寅明（六岁）、由美子（五岁）处置了，然后自己饮弹也自杀了。远藤久义和吉冈寅市两个人并没有自决，尽量

俯身逃出现场，从侧面绕道到中央队伍的驻地，向团长作了汇报。

听到远藤、吉冈两人的汇报，始终沉闷的贝沼团长，带着纳富藏善和二、三名青校生，登上山顶进行观察。在这个地方，直接看不到敌人的情况，根据枪声判断，战场可能又向右翼侧面扩展，危险正在逼近。在通往麻山的军用公路上，又开来苏联战车，有人在公路上被打死。中央队伍的人们，看到团长面临绝望的样子，咬着厚嘴唇，手握着腰间挂的日本战刀，用过去未有过的狰狞面孔，很重的语气说：“我们已完全被包围。前面有苏联机械化部队在等待我们，后面有苏联战车在追赶上来。日本军已在败退，在这种情况下，简直断绝了我们的逃生之路。”他沉思一会儿又说：“我想大家共同逃走已不可能，现在有二个方案，一条是建团以来，亲如一家的人们，痛苦的七零八落的逃散；另一条是不管死活，大家最后在一起，采取什么办法，听听大家的意见。”周围不时的响起炮弹的轰鸣声，震动耳膜。在惊恐中，人们处于痛苦的默沉。不久，小声的呜咽声和失望的痛哭声，象波浪一样扩散起来。要求自决声和各种吵闹一起袭来。“自决吧，象个日本人的样子去死。”“向冲绳学习！”“死为护国之神！”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的狂暴语言，在男人中此起彼伏的叫喊着。有的人把贴身附带的护身佛象，还有从故乡带来的父母照片和奉公袋，以及和军队有关的东西，堆积起来并点着了火。女人们把应征丈夫的照片和其他贵重品，都恭敬的投入火中。及川赖治的妻子，在包袱里找出漂亮衣服给孩子们穿上，自己也换了衣服。同时把新裤子也交给丈夫，什么话也没有说，端正的坐着，等待死神的来临。同一个部落居住的人们围坐一圈，有的围上白头巾，有的扎上白带子，用泉水与亲友传杯，作为死前的最后一刻聚会。

那个和开拓团在一起的警察队长本村辰二，在他的《我的六十

五年》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那个时候，沉静的应征妻子们，捧着丈夫的照片贴在脸上，然后依依不舍的投入火中，人们都流着眼泪，泣不成声，我也暗自决定，坚决和我管辖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在这里准备自决。我把所有的现款、手表、警察手册全部烧掉。看到蓬头散发的妻子和可怜的孩子，默默的点头，会心的告别，开拓团的妇女们穿上和服，整整齐齐向我说：“我们先走了，麻烦您啦。”当时我暗下决心，和大家一样殉难……”

当时，向贝沼团长建议，组建敢死队，向敌人冲去的呼声很高，主要的倡导者是哈达河小学校长卫藤通夫。团长听了大家的意见，最后说：“作为日本的男儿，消灭敌人，以身殉国，是好样的，也是最理想的，冲绳的人们，最后走上自决之路，是光荣的，当俘虏是最可耻的。我考虑回归祖国的道路是自决，死而无憾。”绝望地表示一定要与妇女儿童共生死，作自决的带头人。

随后，他任命本村警察队长为敢死队长，要求南乡开拓团的樱井广人，还有纳富藏善等青校生四人，在大家自决后冲向敌人。那些准备自决的妇女们，向敢死队员们辞行，鼓励他们杀敌报国。人们一同向东方遥拜，三呼万岁。贝沼洋二自己右手拿着手枪，亲自向太阳穴开枪后，身躯倒地，作了自决的先驱者。卫藤通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这个场面时说：“大家看到团长的自决，哭声四起，人们围绕在团长尸体的周围，回忆十年相处的开拓团的老父亲，悲愤的互相告别，有的学生头上缠上洁白的头巾，哭泣着对我说：‘老师，我先走了’。我对每个学生说：

‘光荣的死去，我马上也去。’随后把带来的有关学校的重要文件和贵重品都烧掉，从马车上取出毛毯，一家三口坐在上面，想到死期不远，不免悲从中来，看看妻子的脸，妻子苦笑着，小声说：‘我们幸福渡过了十五年，不辜负这一生。’我闭上眼睛，静静的听着，内心在翻腾，心脏如被撕裂，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

一次谈话。妻子最后也穿上和服，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把五岁的真知子抱在怀里。真知子在我的耳边小声对我说：‘妈妈领我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飞机。’回想这三天二夜的逃难路上，戴着防空头巾面带恐惧的女儿，真令人心碎，但没有办法。八月九日在哈达河，我去本部打听消息没有回来的时候，飞机来轰炸，他们母女俩非常担心我的安全，十一日在逃难路上，我来到妻子坐的马车旁，看着没有离在过家门的小女儿，今天就要永别了。当时，我横下一条心，亲手用枪打倒了真知子，随后在妻子胸前也射了一发子弹，妻子也倒下了。”随后，敢死队员们就疯狂的开起枪来。阵阵枪声伴随着哭喊声震响了山谷。四百二十三名妇女和孩子，经过三天二夜的艰苦避难路途，最后在这麻山谷中被他们的保护人杀害了。而那些敢死队员们，却一个也没有死，后来一个个溜回了日本。

八月十二日午后四点左右，纳富藏善在中央队伍隔着一个山头的地方，流动放哨，听到在中央队伍的山谷里激烈的枪声，心里明白，这是中央队伍的人们自决的枪声。当他急忙回到中央队伍的自决现场的时候，闻到了弥漫的血腥味，强烈的火药味，他默默的在现场走了一圈。最高的地方是贝沼团长的遗体，家属们一堆一堆躺在血泊中。他默默地向死者表示敬意，走下山去寻找活着的人们。

高桥秀雄在中央队伍集体自决时，正在后尾队伍引导妇女儿童们避难。他的家属八口人，已与中央队伍的家属一起被杀害了。当他听到中央队伍的枪声，感到意外，就从后尾队伍赶来，在血肉横飞的中央现场，他惊呆了。当纳富藏善见到他时，他拿枪大声喊：“这是谁杀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露出那可怕的面孔吼叫着。他在纳富藏善的劝说和陪同下，开始往后尾队伍方向走来。

后尾队伍离先头队伍二公里。在这里有上野胜、笛田道雄等率

领三十五家约二百多人的家属，焦急的等待着中央队伍贝沼团长的命令。大家正在焦急的时候，高桥秀雄象着了魔似的踉踉跄跄来到大家面前，同时，从前方飞马而来的青校生慌慌张张的宣布：

“团长以下全员自决”。高桥高声喊道：“都光荣的玉碎啦”“全完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象炸弹一样，打破了后尾队伍一时的寂静，惊恐中，有的大哭，有的呆在一旁不知所措。突然，不知是谁喊道：“全体在道上集合，冲上去为死者报仇！”许多青校生也哭喊着要杀向前线。这时，福地医生站起来大声说：“都去参加敢死队，妇女和孩子们怎么办？没有准备地往上闯，不是白送死吗？”大家听了都楞住了，人们进入了沉思。平时，福地医师少言寡语，但说出话来还是有分寸的。在团里，别人不敢顶团长，他却毫不客气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战争失败了，种族不会灭亡，国家垮了，山河照样存在。这些言论在当时的日本来讲，无疑是对天皇的叛逆。他为家庭困难的团员看病，常常不要出诊费和少要医药费。人们了解他，也很敬重他，他的意见受到了重视。在人们议论纷纷考虑福地的意见时，作为副团长兼后尾队伍负责人的上野胜也冷静下来，把周围的男人集中在一起，和南乡开拓团的中村正人一同到前方去侦察。他来到麻山峪时，新泻县的马场荣治和南乡开拓团的武田清太郎迎面走来，指着死尸的地方说：“团长就是在这死的”。上野胜急忙问：“团长为什么要自杀？”这一追问使马场荣治感到意外。他是八月十日根据团长的命令，离开家属与及川赖治一起驾汽车前进的，他们未到达这个地方时，妻子知惠（三十五岁）、儿子浩（十四岁）女儿真子（十一岁），顺子（九岁）、国子（六岁）元为子（四岁）芳子（三岁）七口人，都已经被人弄死了。这时，由贝沼团长委任的敢死队长本村辰二已把活着的男团员集中起来编成了敢死队。上野胜也加入了这个敢死队。受过步兵训练的上野胜，卫滕校长等六人，分别担任分队长，每个分队有六名队员，总数不到四十

人。在本村队长的指挥下，他们排成纵队向苏军阵地散开。可是在登山的时候，突然被苏军发现，右翼分队受到自动步枪的射击，原鸡宁县种畜场场长弥部隼右大腿被击穿，右耳受枪伤，头部被擦伤，还有人受伤。上野胜分队开始行动的同时，就遭到自动步枪的连射而处于不能行动的状态。刚一交火，敢死队就减员三分之一，已无力进攻。本村队长用低沉的口吻说：“这里就是我们葬身的地方，可惜没有消灭一个敌人。”沉默了许久，上野胜说：“强大的敌人，把日本军队都打败了，我们这些人，装备又不好，地形也不熟，实在是没有成功的把握。另外，不管是滴道的日本兵，还是平阳的守备队，或是从东安来的日本兵，他们都撤回逃命了。”有人低声说：“趁早逃命吧。”在黑暗中，看不清人们的表情。敢死队长本村辰二一言不发，悄悄从山上退下来，队员们也心领神会地跟他退下来，向着牡丹江方面，爬山越岭走上了逃命的道路。本村辰二在逃命途中，甩开了他的一部分队员，开始分散逃命。在吉林省境内，他结束了五十多天的逃亡旅程，捧着武器，向苏联军队投降了。从此，他被送往西伯利亚，混过了三年的俘虏生活，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被遣送回日本国。

上野胜在麻山敢死队解散后，心情一直是矛盾的。他感到作为哈达河开拓团的副团长，团长自杀，对麻山遇难的人们未尽到保护责任而内疚。从那以后，逃难途中也想到死。与他同行的卫滕校长，担心他自杀而夺了他的枪，以后，经过许多周折，也只身回到日本。由于他对麻山事件感到未尽到保护团员的责任，怕人们暗中议论，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作为原哈达河开拓团副团长，在哈达河开拓团战后事务处理完毕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悄悄地去南美的玻利维亚檀达克尔斯的偏僻地方的日本移居地去开垦，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原始密林中挥斧开荒，默默地生活着。一九七八年，在日本纪念麻山死难者三十三周年祭日

时，他从玻利维亚给友人来了一封信，内称“誓死杀敌，势如劈山破石的敢死队，那天夜里停止了进攻，这是我的过错，我犯了罪，生还敢死队员们的痛苦和被人们耻笑，我是理解的，如果那天夜里我不反对出击，大家会实现勇敢牺牲的愿望，我痛恨我自己的罪过而感到惭愧，可耻的活下来了，我没有脸面回去参加纪念活动，我在这里向死者表示哀悼，向生还者和死者家属表示道歉……”。后尾队伍在上野胜一伙去中央队伍侦察以后，人们都在悲痛中思索着。剩下的男人们互相痛苦的议论“前方的人们，都非常痛苦的死去了，应该前去和他们一起早点结束生命，这倒是痛快的事”。高桥秀雄也喊“对！对！”男人们又开始活跃起来，检点枪支，分配子弹，有人把放在军用车上的酒类、罐头都拿出来，喝着酒疯狂地宣布“今天是显示日本男儿本事的时候。”互相干杯，酒劲上来又喊起“向塞班学习！”“向冲绳看齐！”也听到妇女们表示决心自杀。在这紧张的一瞬间，人们又把目光集中在福地医师身上。因为福地医师发表了要保证妇女和孩子们，不能白白送死的有力意见。福地医师在众目所视中，慢慢地站起来说：“我们马上就要落在敌人手中，向敌人进攻也好，自杀也好，战争胜利的希望是没有的，在这关键时刻，要选择最好的道路，不能冒然去死，要找一条死中求生的道路，我们应该活着出去，有义务把事情真相带回国去，要坚决争取活下去，更要保护妇女和孩子们。”这个瘦弱的爱想问题的福地医师，越说越有劲，那些头脑发胀的小伙子们，被他说服了，一个个顺从的都到他的周围集中起来。福地医师拿出地图和指南针，一边指点着一边说：“从这个山脚下往西走，绕过麻山公路，从林口的后面出去，再往南走，就是奎山和杨木的火车站，往西就是勃利，考虑到这个地方危险，始终向西走……。”男人们眼睛看着他的脸，听着他的解释，不住的点头。有人提出这么多妇女孩子，在山里行军能走得得了吗，这是个累赘，怎么办？大

家又沉默起来，一种处置妇女的念头又冒了头。这时“带我们走吧，决不成为男人们的包袱”。从沉默中的妇女群里发出的刚毅声音，声音来自角田志寿（二十一岁，在宁安死去），他诚恳的表情，不眨眼的看着福地医师。“决不拖男人的后腿”用喊破喉咙的声音高声叫着，激发了妇女们的决心。在妇女中喊喊喳喳的扩展开了。在这些妇女的拥护下，福地医师和一些男人们鼓起了勇气喊着：“走吧，大家下决心走吧”。由医师带头，一个接一个涌向山里，走上逃生之路。就这样，由于福地医师的当机立断，把后尾队伍一部分妇女儿童一百多人的生命，从死亡边缘中拯救出来。这支逃难队伍，在那难以想象的逃亡路上，坚持了四十多天，又过了一年多的难民生活，得以生还日本。可是福地医师在进山的第四天就与队伍失散了，下落不明，可能已死亡。

在这同一块高粱地的另一角里，笛田道雄高喊：“大家在这里和团长一起赴难吧。”疲惫不堪的妇女们都愿与团长一起愉快的死去。笛田道雄的夫人米子安祥的向笛田说：“你呀，咱们在这里告别吧”。随后，妇女们继续向笛田表示：“笛田先生，你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一路上费心啦，请你继续完成你们男人们保卫林口的任务，有缘来世再见吧，谢谢，笛田先生放心吧。”一个一个向笛田合掌作最后告别。大家很快把高粱杆放倒，作为葬身之地，有的急忙梳理头发，整理衣服，在膝上抱起孩子，嘴角流露出微笑，准备走向神话般的极乐世界。互相又把水壶的水传饮着，一同向东方端坐，狂喊天皇万岁。笛田在他的《麻山的夕日》写道：“这简直是举行死的仪式”。笛田米子以妇女中的领导者姿态，对笛田说：“先把我和孩子，按坐着的顺序，最后把年青美貌的君子姑娘处置了吧”。随后一阵枪声，善良的妇女和孩子们，就这样结束了她们的一生。

一九八五年秋，本文作者为了弄清哈达河开拓团在麻山的集体屠杀现场，曾探访过当年麻山事件的墓地—麻山峪。它位于麻

山到西大坡公路拐弯的山谷里，该地在山间僻处，并有树木掩蔽，当年的树木，已被当时战火拆断，而今又发出新枝。在开阔的坡地，庄稼已经成熟，在那一块块绿油油的庄稼深处，可能就有当年埋葬的尸骨。山坡上一个尚可辨认的小丘，就是一九四六年五月，远藤久义作为归还日本人的代表访问麻山时，在团长以下集体自决现场，把他妻子的遗骨和经他亲手处置的尸骨，一具一具的集中起来，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埋在一个宽一米五长五米的大坑里，作为墓地，形成了今天的小丘。在整个山峪的土地上，还不时看见散落的白骨，在小丘的旁边，还发现一只不成型的类似儿童的皮鞋。

七、几个幸存者的故事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十八日午后一时，满洲国伪皇帝溥仪在临时宫廷举行退位式，伪满小朝廷的十三年零五个月的可耻历史正式宣告结束。从八月末到九月，一百多万日本居留民，经过艰难的逃亡路途，陆续向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集结，准备待机回国。

哈达河开拓团，除了在麻山集体自决的妇女儿童以外，从麻山峪逃出来，三五成群，爬山越岭，露宿风餐，经过五十多天的跋涉，有的投到各地的难民营和收容所，有的继续南逃。在逃亡途中，得各种传染病死亡的不计其数，挣扎活过来的只有一半人。许多人没有越冬棉衣，把麻袋穿成三个洞，中间的洞，钻出脑袋，两边的洞，伸出两支手，就当棉衣过冬。人们称这些人是“麻袋部队”。从麻山的先头队伍中逃离死地的上野柘枝（上野胜的女儿）到长春时，身体衰弱到极点，声音嘶哑，说不出话来，估计也只能再活一、二天。这时“满拓”（即满洲拓植株式会社）发给开拓民救济资金，只是不给个人，得由团体派代表领

取。当时在长春各地收容所居留的哈达河开拓团难民二十五人份的现金，都由上野胜代为领取。上野胜是在长春难民营与他的家属相逢的，但欢喜之余，他的女儿柘枝患病，眼看着面临死亡的孩子无能为力，但又不忍看着开拓团人们挨饿受冻，就急忙去领取救济金。救济金每人三十元伪币。上野胜在回来的路上，被收容日本俘虏的苏军捉住，带到南岭伪大同学院进行收容。他从那以后，就和关东军的俘虏以及一般俘虏一起，渡过黑龙江，经海兰泡到西伯利亚，去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劳动中他的脚被砸伤，被送回黑河，在那里给八路军做工。一九四六年十月从哈尔滨回国。上野胜被抓走的第二天，他的女儿柘枝病死。上野胜的妻子菊枝，到处寻找没有回来的丈夫，怀孕的身体，背着岭雄，随着人们继续南下，在沈阳失掉了岭雄，最后她也死于沈阳。

北条年枝住在哈达河开拓团的北大营部落。丈夫北条博被征入伍。她在先头队伍受到苏军袭击时隐藏在深草中，得以逃出麻山。她谈到逃难时的遭遇时说：“我和少年队安食君的夫人还有五名军人等一共七个人，用了五天时间，按着指南针的方向，往南走到一个小寺院，乞求给点吃的，和尚们马上做了小米粥，并亲切地告诉我们，不要叫别人看见，隐藏在山里，我们又用大锅做了饭，我们七个人吃了东西，然后向他们表示感谢又出发了。和尚们还为我们祈祷，祝愿我们平安无事回国。这种告别语的言，到现在我也没有忘记。我们不知道日本已经失败，还相信日本军再整旗鼓必定战而胜之。军人们一直拿着枪，有时方向走错，在一个山里转来转去，走了四天，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路上经常不断地出现病倒。也经常吃不上东西，日积月累，身体都累垮了，雨天在大树下挺着身子从头一直淋到下边……。日复一日的前进，在避难路上又集合了五十多军人，领着我们继续南下，路上曾七次被包围，又在弹雨纷飞中逃出，也曾在中国人的老房子里睡觉，被偷袭的子弹打伤头部。所幸未打中要害，经简单治

疗就好了，在被追捕的山路上，看见许多宪兵队和老少人等自杀后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孩子凄惨的喊叫“妈妈妈妈”，我们不顾一切的逃跑，跑呀跑呀也记不得日程，走了五十多天到了五常，才知道八月十五日就结束了战争，军人们一边哭泣，一边把拼命保存的武器，向当地保安队交了枪，这才成了避难民，从五常车站，坐上马车好容易到了哈尔滨西本愿寺的收容所……”。北条年技在哈尔滨收容所生活了一周时间，以后经人介绍，当了邮政局长家的女厨师，这个邮政局长曾于一九二九年在日本东京留学四年，而且他的孩子也在新京的大学毕业，加上老太太共五口人，完全是亲日派。北条不必使用中国话，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才从哈尔滨回国。

深渡濑正直全家九口人全部死在麻山，只剩下十岁的正纪。他当时在麻山的岗上，下了马车和三个小朋友离开家属队伍五十多米远，向前走去。突然日本兵从前方跑来，警告他们说“苏联的战车来了快逃”他们就往右边的山上跑去，不顾一切的往草丛中躲藏，炮声在头上响着，子弹带着臭味在近处飞来飞去。他在一片小橡树林的掩护下，看到一位老太太和男孩子，老太太用短刀把小孩刺死，然后自己也自杀。他吓的也想用书包的小刀切自己的脖子，但没有成功而流了血。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三个苏联兵，用枪对着他好象说什么就走开了。他在那里呆了很长时候，起来急忙寻找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在一个小山坡的苞米地里，突然看到妈妈的尸体，妈妈抱着小弟弟，前后胸被子弹打穿，小弟弟已死，在附近，静子妹妹肠子都淌出来，三岁的妹妹也倒在地上，但详细一看是睡着了，把她叫起来，她开始哭喊叫妈妈，正纪望着周围，在远处苞米地里，鲜血染红了爸爸的尸体。正纪把扔掉的罐头拣起来，送给幼小的妹妹吃，这夜就睡在他母亲的尸体旁，在鬼哭狼嚎的夜里，小妹妹怀念妈妈而哭泣，第二天苏联军队又来袭击，正纪就和妹妹分开，以后妹妹不知去向。他曾叙述述在逃跑路上的情况“……八

月十三日天明，我看到苏联军队，吓的扔下妹妹就跑，在铁道线路上，三位妇女也往前走，对面又来了苏联兵，妇女们慌忙把孩子扔到河里，自己过河逃走。在那天午后，有八名日本兵和十几个开拓团的人，结伴在一起，我就跟着这些人上路，白天在山里隐藏，夜间行动，终于走进长白山。开拓团的人们商量“这个孩子太小，不能进山里长期走路怎么办？”当时没有一个妇女带着累赘的孩子，想把我扔下，八个军人提出要单独领我走路。我从军人那里拿过食盐背着走路，可能有七、八公斤重，觉得很沉重。听说这盐是为了生存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我感到责任重大。士兵们除了背着枪以外，还扛着许多大米、毛毯、天幕等物品，白天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没有道路，摸索着前进，夜间士兵们抱着我睡觉，二十多天吃大米饭，大米没了就吃树籽，山里有熊，有一次士兵们用枪打死熊吃肉，有时在河里捞鱼虾吃，在长白山里跋涉中，沿途看到死了不少的士兵和开拓团的人们。一路上有的病死，也有的饿死，飘荡着难闻的死尸腥臭味，使人难以忍受。由于下雨和中暑，我也几次患病，士兵们把保存下来的贵重药品给我吃，没有把我扔掉，在长白山的雪夜里，士兵们用枯草做成窝，给我温暖。在山中徘徊了两个多月，好容易看到了村落。可能是十月中旬，九个人头发都长了，衣服鞋子都破了，看看原满洲国的地图，是在蛟河县周围。十月下旬，我们正在河边吃早饭，突然遭到地方保安队的袭击，当时打死了七名士兵，只剩下一个士兵，领着我渡过没腰深的河逃走，我记得这位士兵是伍长、二十六岁。我们两个人到一个很大的朝鲜村庄，买了朝鲜衣服，那位士兵付了款……”。后来，那个剩下的士兵，在这个屯里，把正纪放在一个叫崔方万的朝鲜人家里，立即走开。正纪在这个没有小孩的家里住了三个半月，这家人移居他乡，又把正纪送给现在的养父——中国人罗秀夫妇。正纪来到这家，就改名叫罗景祥。罗家夫妇之外，还有两个男孩和祖母的五口家庭。罗家把正纪当

亲生儿子同样对待。祖母也是个好人，对正纪象孙子一样爱护。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养父罗秀被赶出这个地方，逃到昌图‘去了。他又被中国人宇德泉收养，在这个家的三年里，是痛苦的，半截袖上衣和半截裤子一条，替换着用，也不给鞋子穿，每天只给点吃的。十五岁的时候，在昌图居住的罗家的祖母前来接他。到十八岁给木匠师傅当徒弟，二十二岁进了木工厂，同时与十七岁的王秀珍结了婚。这次结婚，祖母帮了很大的忙。正纪也享受了和平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他又把祖母接来供养了八年，一直照顾到死。他上了一年夜校，二十三岁又进了汽车修配厂，有了修理汽车的技术并当了组长。现在长子正明十九岁，次子正辉十六岁、长女丽华十三岁，家里共有五口人。一九七七年，为了纪念先人，曾领着大女儿丽华去日本一次，到第二年六月五日，由大阪乘飞机返回中国。后来深渡赖正纪，也就是罗景祥，谈起他被遗弃的悲惨命运，一直没有忘记帮助他逃难的人，他返回中国后，在笛田道雄和日本《朝日新闻》熊本支局的帮助下，寻找那位救命恩人。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山口县茨市居住的沼博美，笛田送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国的罗景祥，他立即向笛田写信，同时在给沼博美的感谢信中装上他全家照片，感谢他挽救了他的生命，才有今天的幸福。

在幸存者中，还有一位传奇式的女性。由于她本人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所以就叫她“K”。K出身于静冈县磐田市。八月十二日在麻山后尾队伍，从高粱地随着福地医师入山。开始与他丈夫各背一个孩子，她还抱一个孩子，跟着逃难队伍一起走，这三个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和四岁的女孩，怀里抱的仅四个月的婴儿，在逃难途中，遭到苏军的包围，她眼看着在前面的丈夫被抓走，以后一直没有回来。她顾不得一切、跟着几名妇女，继续逃命，晚间睡在无人的马棚里，白天吃日本军剩下的马肉维持生命，有时没有吃的、就在山上拣野果，或到地里吃生土豆子维持

活命。由于迷路，又与伙伴失散了，在茫茫的旷野中奔走。饥饿中四岁的孩子饿死，背着的四个月婴儿，由于没有奶水也活活的饿死了。最后，好不容易带着没有死掉的儿子进到村里，饿着肚子走进一家乞食。她来的这家，据说过去是个大地主，现在是个土匪头子的家庭，用他的话说：“象日本的侠义道一样，主持道义，在一望千里的旷野上纵横奔驰，叫作游击队，又叫什么中央军的军长，有的时候他们杀人放火，比过去的土匪还厉害、头目叫谢文东”。这个谢文东曾攻打过日本开拓团，后来归顺日本帮着日本军作事。日本战败后，他又拉起了一伙人，干起土匪的勾当。他手下有二千多人，有两三个老婆，还收K当了压寨夫人。K在土匪谢文东的倍加照顾下，过了十多个月的压寨夫人生活。谢文东被处决后，这个压寨夫人毛骨悚然的在佳木斯十字街头与谢文东的头卢告别，默默地离开佳木斯前往哈尔滨。以前，她由日本高等小学校毕业后，曾在东京滨松医院当过护士，来满洲之前，又作过医务工作，特别是她学会了助产技术，成了就业的资本，取得了正式助产士的资格。她在哈尔滨又与中国的建筑技术员结了婚，这个技术员家里有三个女孩，相互关系处理的很好，所以过了一段平安的家庭生活。先是与她生活相关的亲生儿子达男，因水灾事故死去，使她大为失望。在她悲痛欲绝的时候，她的丈夫——建筑技术员也因病死去，这更使她去失生活的希望，好在她丈夫留下的三个孩子在她身边，给她带来一定的安慰。她在悲痛之余，提出了回归日本的要求，经过很长时期，于一九七五年批准前去日本，回到故乡探望久别的兄嫂，她在磐田市的母家住了六个月，又回到中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在日本定居，她回答：“这里条件虽舒适，但根据我的经历，我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很深的，那个地方眼下虽然没有这里繁华，但那里有比亲生骨肉还亲的三个孩子，她们渴望我和她们一起生活，这次回来看看，再也不想回日本了”。她戏剧性的颠簸半生中，不知流

了多少眼泪，从而也从眼泪中锻炼了她那坚强而有毅力的生活目的，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定居中国的道路，把自己的后半生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很早就听说哈达河开拓团日本遗留妇女白岩登喜和中国农民赵玉挖结婚的事，本文作者于一九八七年秋赴鸡西市滴道区，访问了白岩登喜和她的丈夫赵玉杰。赵玉杰是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农民，光复前打了半辈子光棍，以卖另工和当长工维持生活，十八岁就到哈达河开拓团官岛种地赶车，干了二年，又在屯长李魁一家扛活，以后到白岩登家喜家当长工，一直到光复。白岩登喜是静冈县小笠郡人，十九岁时以“开拓之妻”的名号，同在哈达河开拓团的榎林保一结婚，来到东北，准备在满洲这块“王道乐土”上建立新的美满家庭。不料他的新婚丈夫在第一个女儿一岁因病死去，一年以后，根据日本的风俗，与她丈夫的兄弟保吉结了婚。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晚上，遵照开拓团本部传来的“向鸡宁撤退”的命令，在苏军飞机的轰炸下开始逃难。当马车队伍在黑夜里走到城子河的时候，保吉被流弹打死，无奈她拖着怀孕的身子，带着九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随着开拓团逃难队伍奔跑。由于日夜奔走，使脸和腿都肿起来，就在这种紧张逃命时刻，又要临产，行动非常不便，在去麻山的路上，渐渐的脱离了逃难队伍，只好在一间空房子里生了孩子，多亏附近中国妇女照料，恢复了体力，但因开拓团逃难队伍已走远，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母女本想一死了之，恰巧在青龙屯遇到一个中国的好心人，把她母女领到家里，在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谈话中，得知这家正是过去在她家当长工的赵玉杰的亲属。白岩登喜想回哈达河找赵玉杰，这家亲属亲自把她娘俩送到哈达河，她们在赵玉杰的照顾得以生存下来。赵玉杰出于同情她们的困境，热心照顾她们母女生活，白岩登喜从内心感激。当时赵玉杰还是个单身汉，在生产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和体贴，逐渐有了感情，在周围人们的帮

助下，他们建立了新的家庭。土改后，赵玉杰参军一去十年，白岩登喜虽然看到其他日本人纷纷回国，但她毫不动摇，一直等到赵玉杰转业，夫妻共同努力，家庭生活逐渐好转，现在他家有四个孩子，儿子和孙子都在鸡东县永安焦化厂工作。赵玉杰虽然退休，仍在滴道电池厂干活。老太太除了搞家务，还为中日友好作些工作。老俩口过着愉快的晚年生活，当作者访问白岩登喜时，她高兴的说：“中国是我第二个老家，中国人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八、一车孩子的新生

在麻山谷，中央队伍自决的现场。在尸横遍野、血肉模糊的死者当中，有七个孩子奇迹般的幸存下来，现将这些活着的日本弃儿姓名写出来，作为集体自杀中幸免于难的活的见证人。

姓 名	年 令	居住部落	当 时 情 况
佐佐木良	七 岁	北海区	父被应征，祖父母、母姐妹八人在麻山死亡。
渡边满昭	七 岁	福岛区	父被应征，母姐妹五人在麻山死亡。
泷泽丽子	七 岁	新泻区	父被应征，祖母兄弟六人在麻山死亡。
中川又礼子	七 岁	新泻区	父被应征，母弟妹三人在麻山死亡。
马场周子	七 岁	新泻区	父在牡丹江死亡，母兄弟姐妹五人在麻山死亡。
高桥幸子	十 岁	团本部	父在后尾队伍，母兄弟六人在麻山死亡。
高桥政子	七 岁	团本部	父在后尾队伍，母兄弟六人在麻山死亡。

其中马场周子，她的中国名字叫吕桂芳，她在给日本居住的老师信中讲到她们幸存下来的情况，她说：我们跑了不知多少

天，在麻山这个地方遇到苏联兵的包围，我们就隐藏在山中的公路旁边，撤退的日本兵从汽车上给我们投下饼干、罐头、糖果等食品，我们吃这些东西，边吃边看妈妈，她们一点也不吃。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止不住的流泪，抚摸着我的脑袋，又照顾姐姐妹妹们。我问妈妈是不是病了，妈妈摇摇头说：“我没有病，你们吃得饱饱的。”对妈妈什么也不吃，我们都感到担心。这时枪声越来越紧，我们都捂着耳朵，藏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大声说：“我们宁死不应俘虏，不管生和死，大家在一起。”只见母亲们从包袱里拿出白毛巾，把孩子们的眼睛蒙住，小声叨念着，不知道你们的父亲是活着还是死了。当时我觉得奇怪，取下毛巾一看，母亲用双手把我们五个孩子都搂在怀里。不久听到一阵枪声，各处人们都在呼喊，吓的我们都爬在母亲的腿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听不见声音，觉得全身被很重的东西压着，嘴里也说不出话来。移动身子时，感到非常疼痛，原来左腕上中了子弹还在流血。用尽全身力量把压在我身上很重的东西推开，爬了出来，原来是母亲的尸体，吓的我哭喊着，精神紧张地遥望周围，同时还有几个孩子都在哭喊着，身上沾满了血迹。随后又有一个脚被打伤的男学生。我紧张的看到母亲抱着小妹妹，两个人已经死了。我恐惧地摇动着母亲大声喊叫，可是母亲和小妹妹一点没有回音。姐姐和妹妹都在母亲周围死去。这时还活着的我们七个人，大家都认识，其中中川又礼子是和我们一起坐马车从家里出来的。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三个苏联兵，我们马上倒下闭上眼睛装死。可是苏联兵看到我们还活着，就一个一个的拉起来。我们吓得浑身不住的打战。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拣东西的张学政，看到了他们。他要把他们领到坡道的时候、被苏联兵叫住，打手势象在说什么，可是张学政一点也不懂，恰巧，一个苏联兵赶着一辆马车来到这里，叫往车上装东西，我们也帮着送东西，苏联兵叫我们上车、并把鞭子交给张学政。张

学政才开始明白苏联兵说话的意思，笑着登上马车挥着鞭子，向苏联兵不住地点头，驾着车向前跑去。苏联兵大笑起来。七个孩子坐上张学政的马车，拉回到青龙屯。到村子里的时候，张学政高高兴兴地从车上跳下来，大声的喊叫：“谁要日本孩子，男的女的都有。”一会儿，村里的人集聚上来，吵吵嚷嚷地活跃起来，张学政本来是去麻山拣东西的，但回来却拉了一车孩子。

当时，在公路上逃难的开拓团和撤退的日本兵的衣物扔得到处都是，附近农民都出来拣东西，叫“拣洋货”。张学政没拣东西却拉回来七个孩子。这对那些家里没有小孩的农民们，也是难得的宝贝。特别是那些老年人，非常可怜这些失掉父母的小孩子。年岁大的吕奶奶，看到孩子们满身是血，心疼的直咧嘴，所以就把马场周子领回家去。吕奶奶家里有十三岁和六岁的孙子。她家是这个村里最穷的一户，家里破破乱乱什么也没有，每天两顿饭都混不上吃。马场周子成了这家的一员，并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吕桂琴。她十四岁的时候，吕老太太和弟弟都死了，从那以后，经过种种曲折，到她丈夫王世清家当童养媳。这家人对她非常好，十七岁就结了婚，并移居到鸡西市内居住。

张学政拉回来的七个孩子，不到半天就被人领去五个，最后剩下高桥幸子和政子姐妹俩。张学政就把这姐妹俩领回家去，这样，这些孩子都有了安身之处。张学政是个铁路工人，家里没有小孩，高桥姐妹俩到他家后，他给起了中国名字，姐姐叫张桂兰，妹妹叫张桂珍。开始的时候，村里谣传各地杀日本人，她们很害怕，都说是中国人，不说日本话，所以三年多时间，把日本话都忘掉了。解放军进村时，知道她们是日本孤儿很可怜她们，有时给她们东西吃。他们的日本父亲在哈尔滨难民收容所，听说有些小孩没有死，回想在麻山自决时，自己没有忍心亲自下手，结果叫别人杀死，总不甘心，认为留一个也算对得起六个孩子。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抱着很大的希望想回来找一找。日本战败后人

们已开始陆续回国，他却在哈尔滨卖零工混活，准备再到麻山寻找他的亲人。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来到牡丹江，经过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找到张学政家。当时张学政夫妇外出，幸子和政子看家，幸子穿着拣来的衣服，一看就认出来了，他高兴的 了 不得。可是两个孩子却跑到里屋不出来。说日本话她们也不回答，只是用中国话说“不认识”。高桥秀雄万没想到二年多时间孩子会把日本话忘得这么干净。原来这两个孩子怕说日本话杀头，所以他们拚命牢记中国话，但脑子里也忘不掉麻山的悲剧。什么“日本鬼子”日本是“杀人魔王”等等，所以一听到日本话就害怕。这时幸子还对父亲有印象，幼小的政子却完全忘掉。高桥秀雄请求张学政夫妇把孩子还给他，但遭到张的拒绝，说等他家生小孩后再说。他无奈返回牡丹江，第二年六月又来到青龙屯，经过反复商量，张学政说必须留一个。后来张学政想姐妹俩分开也怪可怜的，还是同意让他把两个孩子都领走。可是政子哭喊着拒绝跟日本父亲走，幸子用毛巾盖在脸上哭泣，“回去吧，舍不得相处多年的中国父母，不回去吧，又觉得日本父亲也很可怜”。

“由于日本父亲的迫切要求，她们还是同意跟日本父亲走，她们与中国养父母分离的时候，哭得泪人一样，在火车里还不断地遥望生活多年的青龙屯。一九七七年，在日本高桥秀雄家里，《麻山事件》作者访问她们时，幸子和政子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在那个地方一（集体自决现场麻山峪），实在可怕。母亲抱着最小的弟弟，眼睛都红了，大家把贵重东西都烧掉，用白毛巾蒙上眼睛，都坐在地上，许多人开枪射击，但不能瞄准每个人的心脏，所以我们就生存下来。吓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心都跳出来了，不知多长时间，我们醒过来，五岁的妹妹脑袋都被炸开，妈妈还紧紧的抱着小弟弟死去，实在太痛心。虽然三十多年过去，现在也忘不掉。当时在中国养父家里，离那个地方约有二公里，政子最怕到那里去，不管黑天白日，经常看到绿色的磷火，

人们都说是“鬼火”。高桥秀雄去青龙寻找女儿，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从汽车的窗子往外遥望，还是白骨成堆，散落各处，以后再去访问麻山峪，到处野草丛生，还有几处黑黑的遗迹。一九八一年六月组织的原开拓团回归日本的表敬参观团前来中国，在大雨滂沱中乘汽车特意到鸡西的新华乡（即原哈达河开拓团所在地和密山县的信浓村原开拓团地址），访问他们的故居，他们叫作“访问第二故乡”。

九、逃归日本的开拓团员们

在麻山谷，哈达河开拓团的四百多名妇女儿童遭到集体屠杀以后，一些男人们揩干了手上的血迹，纷纷逃离这个杀人现场，以本村辰二为首的所谓敢死队的人们，也都回归日本。也有的人虽说要集体自决，却偷偷离开队伍而逃之夭夭，还有的人处置了亲人以后，自寻活命，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儿老小，虽然活着回到本国，但在良心上实在是有愧死者，特别是当麻山事件被揭露以后，他们也不敢把真情实事向他们祖国人民交待，所以他们忌讳人们议论麻山的屠杀行为，更不愿向他们亲人谈论麻山的事情，成日的缄口不言，苟且偷生，过着忏悔莫及的日子。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正巧是在麻山遭难的一周年忌辰。及川濑治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宫城县远田郡三乡村。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感到回家对父母没法交代，也想到回乡一死了之。但又想到还得等一等，自己是麻山事件全过程的见证人，是得向国人讲清楚。因此，心事重重的环视着故乡，白天不敢见乡间父老，好容易挨到黄昏时刻，才到自己的家门前，昔日的茅屋迎接了他。当他出现在父母面前，父母显出吃惊的神色：“啊！回来了，可把你们盼回来了，你妻子呢？孩子们好吗？”他没有敢说是他处置了她们，痛苦的难以回答。只是吞吞吐吐地说，在回来

途中失散了。可怜的双亲怀念着家人，在太平洋战争中，应征的哥哥于硫磺岛“玉碎”，弟弟在菲律宾战死，家里只剩下七十岁手脚迟纯的父亲和母亲，领着嫂嫂以及最大的十二岁和七岁、三岁的三个孩子，维持家庭生活并非容易，战争时期耕马又被军队征用，耕地只靠双手来干，打下粮食交国家，剩下的仅够家吃。耕地靠一头瘦牛。父母在诉说着。望着声泪俱下的双亲，及川赖治没有把麻山的真实情况讲出来。思索着回家以后怎么生活，在战后的日本，一切都是破乱不堪，是垦荒种地，还是到矿山干活，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决定在家替换老父种地吧。不久，请了亲友根据老年父母的意见，“为了继承及川家业，抚育哥哥遗留下来的孩子”，决定和嫂子结了婚。这是日本农村流行“嫂嫁弟”的习惯，在哈达河开拓团回国的男人以及战争结束后复员军人中，这种作法确实不少。及川赖治的新妻子千代实，也是他在麻山死去的前妻良实的姐姐。夫妻之间很长时间在苦恼中生活。丈夫不吸烟，不饮酒，掩饰着内心的痛苦埋头苦干。妻子千代实对丈夫苦恼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丈夫向来不谈妹妹的死因，所以妻子对丈夫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日益加深。及川赖治把心里积压的苦恼和麻山情况，倾诉给亲友H，说出了埋在心里的话。这位朋友，就把麻山的情况泄露给千代实，说出了妹妹的死因。千代实知道了妹妹是被亲人、她的丈夫杀死的，原来象佛一样的及川，却是杀害妹妹的凶手，向及川疯狂的哭闹，弄的家庭不安。他近年来耳聋情况严重，在仙台市经专门医师用X光检查，这是由于在麻山敢死队战斗时，被迫击炮震聋的粘膜炎性两耳高度耳聋。所以妻子的吵闹，对他也就无所谓。

当人们逐渐了解麻山大屠杀之后，对麻山事件有关的归国人员，更处于苦恼的四面楚歌之中，有的人甚至忧郁而死。笛田道雄也是因为麻山问题，妻子对他隐瞒这段丑事而认为对她不忠实，怨恨笛田还在留恋过去的妻子而弄的家庭不得安宁。最后

得了半身不遂，在病床辗转中，还受精神上的折磨。

木村辰二和远藤久义等人，都是在麻山失去妻子的，虽然他们又娶妻生子，但在生活中，麻山的影子也不断的出现，他们尽量避免在新的妻子和孩子面前谈论麻山的事情，可是遇事又避免不了，涉及到麻山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亲手杀死自己前妻和孩子的不可告人的蠢事。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生活，是多么苦恼。在麻山死去的前妻和孩子的可怜的影子，时常浮现。而新的妻子往往认为男人有隐私而感到不快，对他们的杀妻灭子的行为感到鄙视和可耻，这样家庭中常出现裂痕折磨他们。笛田道雄 曾 说：

“麻山的事情对我来说是罪过，不得不终身负罪，这是由于卷入战争漩涡造成的孽。”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号称“开拓之父”的加藤完治，曾经动员别人“埋骨满洲”，而他自己日本垮台以后，并没有实现他宣扬的“征服大海、以水葬身，征服高山，以草裹尸”的诺言、也没有自杀，而偷偷溜回日本，跑到他的老家福岛县的市外数里的僻静处隐居起来。在日本战败当时，担任伪鸡宁县长的日本人久保田丰，丢下他属下的开拓民，伙同他的部下，打开银行的金库，私分大量的所谓“避难金”，坐上第一批避难火车逃之夭夭。回到日本后，在他的原籍静冈县田方郡韭山村，又当起村长来了。日本开拓团在中国彻底消灭了，但是它给我们留下的遗痕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却是永远不能消失的。让我们牢记过去，振奋精神，努力创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吧。

附 记

日本侵华大事年表

1895年8月：中日战争，十一月占领旅顺口

1895年4月：签订中日条约，割让我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十一月归还辽东半岛。

1905年1月：日本占领旅顺。12月：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得我东北地区的铁路，矿山经营权。

1906年11月：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建立“关东州”为日本的侵华飞地。

1909年7月：日本在东北铁路沿线成立独立守备队。

1915年4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侵华二十一条。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未得实现。

1919年4月：日军在我东北设置关东军司令部。

1928年6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1931年7月：日军发动万宝山事件。

1931年9月：日军借口柳条沟事件进攻北大营，掀起“九一八”事件

1931年11月：日军占领齐齐哈尔。

1932年3月：日本一手操纵成立伪满洲国。

1932年4月：马占山发起“反满抗日”宣言，从此东北抗日烽火燃烧起来。

1932年5月：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长春。

1932年10月：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四百二十人**来东北入植**，（首批弥荣开拓团）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日本政府退出国联。

4月：土龙山农民暴动，打死日本政府称之为“开拓之父”的饭冢大佐。

1935年4月：伪满皇帝溥仪第一次赴日“访问”

5月：日本派出第四期集体开拓团来鸡西的城子河、哈达河地区入植。

1937年7月：日军进攻宛平发动芦沟桥事件，我国开展全民族抗日运动。

1937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

1937年9月：日本在我东北成立“满洲拓植公社”

1937年10月：日本提出二十年内向满蒙移民一百万，人口五百万的方案。并向满洲输送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约八万六千人，掠夺我农业资源。

1937年12月：日军野蛮屠杀三十万中国人，即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掠夺我工矿资源。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

1938年7月：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文磨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

1939年5月：日军挑起诺门汗国境纠纷。

1940年6月：日本制定“满洲农业开发十年计划纲要”。

1940年10月：日本在我东北实行了满洲第一回国势调查，人口为四千三百二十二万人

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发动特种演习，即所谓“关特演”

1941年8月：日本在我东北实行“生活物资配给制”，实行

物资统制。

1942年 1 月：日本决定在满洲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1944年 2 月：由于太平洋战争紧张，抽调关东军兵力开赴南方战线。

1945年 8 月12日：哈达河开拓团集体屠杀日本妇女儿童的“麻山事件”

1945年 8 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1945年 8 月18日：溥仪举行退位式，伪满洲国经过十三年零五个月，宣布彻底垮台。

封面设计：石生金

封底篆刻：石生金

封面照片：高伟毅

梁凯琳

特邀编辑：王金礼

周 喆

王德林

责任编辑：余河江

于迎春

• 内部资料 •



鸡西文史资料 第四辑

鸡西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鸡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11月 第一次印刷 字数: 130000

业经黑龙江省出版总社(88)黑新出图字第174号备案

